

[主持人语]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都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用九个“学习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向马克思学习什么及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他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刻反思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深刻根源、通过大力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人与自然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着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组合体。将长期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态度转化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解,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出路。为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将目光返回到人自身,将注重加强生态物理环境的建设与加强生态人文环境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培育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实践能力的现代化新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这组论文就是从不同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做的思考。(方世南)

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政治哲学意蕴*

方世南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人与自然是人类的永恒关系,只有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才能把握其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内在价值和发展趋势。在生态政治哲学的视野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着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组合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形成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态政治关系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社会历史性关系,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社会。

[关键词] 人与自然; 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01-04

人与自然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但是,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人与自然这两个方面单一关系的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不能简单

地将其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系统,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2019 年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TB032)。

[收稿日期] 2020-02-25

[作者简介] 方世南,男,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时形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态政治关系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有着多种多样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人与自然关系还是一种社会历史性关系,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全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重大价值,从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关系执政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及上升到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的高度,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社会。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必然具有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生态兴盛,则文明兴盛,生态衰亡,则文明衰亡,这个客观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对社会发展予以的不同影响。

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经形成就必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关联,形成“人—自然—社会—人”紧密关联并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复合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作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关系。要求人们对这两大关系的认识必须上升到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全面地把握其内在联系、深层本质以及基本规律。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关系,又由此派生出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

文化关系等诸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是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存在物,“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560}。人在自然面前固然可以自称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但是,人又必须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因为,人既是具有能动性的动物,同时又是具有受动性的动物,一句话,人是具有能动性、受动性辩证统一双重特性的动物。因此,人必须进行两大提升,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2]422}。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最终达到两大和解的目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63},人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两大和解充分体现了“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1]209}。

二、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诉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有着深刻价值意蕴、价值诉求、价值目标的价值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对于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生态安全促进国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推动人们在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意义,都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价值诉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最为根本、最为首要,也最为显性的价值诉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两者不是独立的价值体,而是有机统一的价值共同体,如果只是注重人的价值,而不顾及自然的价值,人的价值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根本无法实现人的价值。而没有人的价值,也无从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自然的价值。人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值,都必须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3]48}人民健康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健康为根本前提和必要保证。生态不健康绝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人类。在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灾难、生态危机、生态矛盾面前,如在病毒肆虐、沙漠蝗虫爆发、臭氧层稀薄、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土壤侵蚀、热带雨林减少等状态下,根本无法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以生态安全促进国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是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又一重大价值诉求。生态安全是对传统安全观的补充和超越。生态安全是指具有能持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保障人民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受或少来自资源环境的制约的较为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具有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灾难、生态风险、生态危机的能力水平。一般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人类安全生产、安心生活并确保身体健康,对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程度就是生态安全,具体而言,生态安全包括对人类饮用水、土壤、居住环境、食品、空气、声音等的安全保障程度。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04年12月29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一次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入我国法律。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全球安全等重大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3]24}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文明,实质上就体现为在生态安全状态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广泛联系的情况下,生态安全和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具有全球性。就以病毒为例,它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其传播没有国界,进攻对象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地位、民族、种

族、强国、弱国。在生态安全问题上,要以国际生态安全理念代替地方保护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义等狭隘的生态安全理念,倡导同一个地球和同一个健康的全球生态安全理念。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大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对于在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中推进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生态政治哲学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学问,规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将规律称为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规律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违背客观规律必定会遭到辩证法的惩罚。孟子提出“顺时应物”的生产发展观点,就是体现了对于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体现的是以遵循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适度发展和稳态发展,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以实现自然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人的价值为内容的协调发展,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小康和绿色生产力增长的创新发展,以实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安全发展。

三、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展望人与自然关系的愿景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经过人类早期特别是在长期的农业文明阶段,即人对自然的臣服、膜拜阶段,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文明阶段,即人为自然立法和对自然大肆征服改造阶段,必定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阶段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在双向构建、双向创价中推动人类永续发展的关系。

生态政治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持乐观态度。生态危机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末

日,人类必定会在是死路一条还是寻找到新出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实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崩溃的时代或突破的时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球环境去继续遭受蹂躏,直到它有朝一日再也不具备可供人类居住的功能。或者,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只有能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4]²⁹人类面临的共同严峻的生态危机,催生了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文明已经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普适性的文明模式和文明选择。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世界各国都要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安全型和人口均衡型这紧密联系的四型社会的新理念、新实践、新趋势。即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特征的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尽量减少资源环境赤字,达到环境友好。必定会大力建设将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首位的生态健康型社会。生态健康型社会是对生态病态、生态矛盾、生态不安全提出的总体要求,生态健康体现出资源环境的优质增长和人的身体健康。必定会大力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对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发展处于相平衡的要求,需要实现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要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按照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要求的通过全球生态合作达到的全球生态文明的新机遇、新格局、新图景。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全球最为普适性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全球携手合作,才能构建地球美好生态新家园。鸡蛋可以挑选,地球别无选择,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从个体的“我”进入到群体的“我们”;从代表个体、群体的“人”,进入到代表全球的“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基础的是人类生命

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共生带来的是希望,而人与自然的共亡带来的则是绝望。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关系新的构建必定会催生出具有尊重自然、呵护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文明现代人。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都是人不能善待自然的恶性结果,反映了人文矛盾、人文危机、人文灾难。同时,呼唤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主体性和具有动力性的生态文明现代人的出场。生态文明现代人懂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能够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来阻遏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使人与自然关系能够始终朝着有益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健康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现代化还能把协调人与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推进到协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将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态环境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指向人所处的一切关系上,在建设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推动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光 翟)

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反思*

孔 川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新冠疫情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解这一重大命题的时代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深邃性和彻底性。疫情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和解的重大命题提供了现代性检视的契机,同样也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解这一重大命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更要从政治高度对待生态问题,从社会制度层面开展生态实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关键词] 和解; 自然解放; 社会解放; 生态反思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05-0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流行”,成为全球性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面对这场突发的疫情危机,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层次反思,尤其是要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再次认真检视“人与自然和解”的重大命题,重新理性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一、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反思

人与自然的和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必由之路。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针对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恩格斯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603}。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个重大命题,涉及如何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环境的本身价值。目前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命题依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从现实来看,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解,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主张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属性就是指人来自于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中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中能动的一部分。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也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劳动是人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中介,劳动者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也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第一源泉。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人始终离不开自然界,人必须依靠自然界进行生产和再生产。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早期阶段由于人的力量相对弱小,人对自然最初是敬畏和恐惧。随着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和从事劳动实践,人们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人的力量开始逐步影响自然、控制自然、干预自然,而自然界本身对人的约束却越来越弱。但是,人的物质欲望并不满足于从自然界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品,更多的则是按照人类的想法和意愿开始肆无忌惮地改造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过程。自然界中人的观念、意志、烙印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产生以后,伴随社会生产力的飞速提升,科学技术革命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2019 年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TB032)。

[收稿日期] 2020-02-25

[作者简介] 孔 川,男,山东曲阜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形势与政策教研部副主任。

的进步以及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人类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进步。此刻,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失衡,自然在人类面前变得无比渺小和卑微,自然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自然界存在的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处于首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开始蔓延。

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们普遍认同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忽略或者不考虑自然的利益。人在世界万物中处于首要的位置,人类是第一位的,自然是第二位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肆无忌惮地使用资源、破坏资源、污染资源和浪费资源。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满足欲望,不惜损害自然、破坏自然、污染自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当然,人类在发展的初期,并没有预见到自身行为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也没有考虑过自然的生态承载力问题。这是人类发展所不可避免的阶段。由于人类在大自然界中不受控制和约束的改造和征服活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丧失平衡,生态矛盾一步步被激化,大自然开始对人类实施报复。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60}

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的破坏和伤害,最后都会伤及人类自身,因为人自始至终都是大自然界的一分子。如何看待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就是和解。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真正学会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树立环境保护的生态理念和生态自觉,践行绿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和解状态。人与自然的和解,并不是使自然复原到最初原始、未开发的状态,也不是拒绝和否定人类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大自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更不是拒绝和否定人类对大自然的变革和改造。人与自然的和解状态应该达到的就是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的本质的相互统一。简单来讲,人与自然的和解所要实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既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也确保自

然界的自我修复力和生态承载力。

其实,人无法离开自然界,因为人类只有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和谐,人类必须依存于自然界。但是,自然界仍然需要人类的保护、爱护和珍惜,因为自然界在人类面前处于弱势,是人类开发、开采和利用的对象,需要人类给予人道主义的考虑和反思,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持久、融合的关系。

二、人与自然和解的基本路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走向和解之路,但是如何和解却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实现人与自然和解,要在社会中思考这个重大命题,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结合,把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同人与社会的和解问题统一起来。从“自然—人—社会”的整体逻辑出发,人与自然和解的难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大命题。“从绿色政治学的视野看,绿色发展问题是基于环境领域但又超越于环境领域而与政治理念、政治决策、政治行为等关联的重大政治问题。”^[3]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解,必须以政治的视角进行考量,实现人与社会制度的和解,实现制度上的升级和变革,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才能够得以去除。

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自然危机的各种现象,深刻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资本的唯一逻辑就是追逐利润。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人类不断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正当需要,而是要无限制地激发人类的物质占有欲,通过不断刺激人类的消费欲望,实现资本的增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它必然超越生态所能承受的极限,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4]68}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生态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只能是暂时性的缓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批判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在。

生态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是人类如何从政治的角度和高度思考生态。生态不单纯是保护环境,更是政治上如何看待生态,如何对待生态,如何发展生态,是关系到人民环境权益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政治上对生态的高度重视,不仅仅是

因为优美的环境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美好目标,更是因为生态权益是人民群众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铲除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但是在公民生态素质和政府生态责任两个方面还存在不足。目前公民的生态文明素养还有待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有待增强,生态文化、生态道德还有待培育,生态文明教育还有待深入,绿色消费方式、绿色生活方式还有待完善。此次疫情凸显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更凸显了公民生态文明教育的紧迫性。此外,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错误的政绩导向和发展导向,生态责任的缺失、生态意识的淡薄、过度追求经济发展及忽视生态建设,从而导致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危机事件层出不穷。

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人与社会的和解,都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整体性逻辑。人与自然的和解,可以理解为自然解放,人与社会的和解,可以理解为社会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7}马克思揭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条件,同时也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症结所在。当我们在谈论生态问题时,一定不是为了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了不发展,而是发展要树立生态理念,发展要体现生态导向,发展要实现生态价值。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生态论述,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因为生态是不可逆的,一旦生态遭到破坏,那么生态危机的影响将跨越几代人。我们所要注重的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之间的兼顾问题,处理好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利

益之间的兼顾问题,为人类解放奠定物质生产基础,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载体,牢固树立生态意识,预防生态危机,共筑人类生态共同体。

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一定是人与社会的最终和解。人与社会的最终和解,将使我们共同走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两大和解的必由之路——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不仅是每个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同样是生态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保护自然环境,共同维护自然资源,共同呼吸新鲜空气,共同畅饮安全用水,共同享受清新世界,共同构成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和解这个重大的生态命题,要求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必须始终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搞过度开发,不能搞竭泽而渔,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反思生态建设,树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自觉意识。生态文明的建设始终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化的工程,我们要充分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平衡性,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共同促进生态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方世南.领悟绿色发展理念亟待拓展五大视野[J].学习论坛,2016(4):38-42.
- [4] 方世南.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责任编辑 光 翟)

疫情敲响人与自然关系警钟*

周 心 欣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6)

[摘 要]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敲响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警钟,值得人类深刻反思和总结。在此次疫情面前,“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论断不是空谈,更加需要人类从身份、理念、行动上实现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的转变、从“人支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

[关键词] 人; 自然; 疫情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08-0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559-560}这句经典语录为人类敲响了一味征服和改造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警钟,迅猛爆发并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严厉地报复了人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2]历史上发生的很多重大灾难,无不印证了人类追求自身利益,违背自然发展规律而受到惩罚的深刻性和远见性,也印证了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这一论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此,面对疫情,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三转变”。

一、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

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溯源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其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对自

然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反思疫情,人类首先需要在身份上实现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

人类的发展随着历史文明的变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主要表现为“自然人”,人类对自身的定位主要基于自然,对自然充满崇拜,正如卡洛琳·麦希特指出的,古代人以母亲比喻地球,将地球看作是活动的有机体,人类活动受制于自然,自然是世界的源头,为人类创造生存和生活条件。亚里士多德曾说,“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如果自然无所不有,必求物尽其用”^{[3]23}。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和自然处于和谐相处的状态。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逐渐从“自然人”转变为“主体人”,具有代表性的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4]53}的提出,强调人的理性能力,认识的主体是人,自然界则是客体,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更加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自身物欲的膨胀,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索取,人类主宰着自然。虽然工业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2019 年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TB032),2019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研究”(项目编号:KYCX19_1939)。

[收稿日期] 2020-02-25

[作者简介] 周心欣,女,河南新乡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明时期,人类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倒逼人类进行变革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表现为对物质、精神的追求,也扩展到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追求,而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主体人”,其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不平等不均衡的,因此生态文明呼唤“生态文明人”的产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更是唤醒民众要成为“生态文明人”。所谓“生态文明人”不仅具有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性意识,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也能尊重每个人的生态权益,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新时代,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一方面,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对野生动物及大自然心生敬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人类将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举措落到实处。

二、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的转变

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不对等、人与自然的非正常互动,促进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伤害和沉痛教训。通过这场战役,更加凸显了以往人类单纯以人作为唯一目的和以单一的工具价值把握自然价值观念的不合理性,呼唤人类要在理念上实现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的转变。

价值反映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只重视人的价值”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其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性存在,自然则是客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自然中的植物、动物等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存在,人要脱离自然,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洛克认为“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5],将人与自然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个体,自然价值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主体性的利益需要,人类通过统治、主宰自然,获得幸福和满足。而此次疫情的爆发则警示人类必须反思并纠正将自然仅作为工具价值的片面性。一方面,自然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完全不同于其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自然界

一切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仅促进生态系统的运转,也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他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6]19}。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对人类产生重要的影响,与人的价值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自然的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人的价值并不矛盾,人的价值的实现依赖于自然价值,而自然工具价值的实现往往又反映和体现着自然的内在价值,正如马克思认为的人靠自然界生存发展,“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55}。人类需要自然界,也离不开自然界。因此,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我们要摒弃过去“只重视人的价值”的单一价值取向,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从“人支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

历史上的非典、埃博拉、天花、黑死病等疫情都曾给人类社会带来惨痛代价,新冠肺炎再次以类似的形式向人类发出大自然的警告,可以看出,人类早就认识到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性,但是悲剧依然在发生,提醒人类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8]50}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从行动上实现从“人支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支配和改造自然,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发展规律,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不顾自然规律地不合理开发自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首先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9]137-138}。强调人与自然是互利互生的关系,人类善待自然,自然必将回报人类,否则,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也会伤及人类自身。因此,疫情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蕴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自然的一分子,人类不能孤独的存在于自然之中,必须与万物共生共存,

(下转第59页)

新时代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

——基于名教师和师范生观点的调查比较

韩典荣¹ 王 高² 万东升³ 李 佶 莲¹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师干训中心, 江苏南京 210013;

3.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 运用德尔菲研究方法,整理总结16名基础教育名教师的观点,得出教师教育中师范生培养的13项主要素养内容。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名教师和师范生进行调查,最终确定13项内容中的10项为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涉及教育理念与师德、学科知识与能力、教育理论与应用以及教学技能与实践4个领域。调查也揭示了师范生和名教师对师范生核心素养理解的差异性:师范生更注重培养知识素养,而名教师则更关注教学能力素养。

[关键词] 教师教育; 核心素养; 名教师; 师范生;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10-07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基于“核心素养”理念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时俱进,这给教师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师范院校在修订学生培养方案时,不断将新理念、新技术引入教师教育课程中,这些理念和课程的加入,在丰富了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教师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不但关乎教师教育的基础,同时直接影响着我国教师培养的方向和质量。构建师范生核心素养,使其具备适应现代和未来基础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然而,师范生核心素养涉及内容纷繁复杂,是关系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

体,目前对其进行全面论述的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从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采用德尔菲法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师范生教育的“核心素养”内容,深入分析了“培养学生未来成为一名合格教师,师范教育阶段应注重培养师范生哪些关键能力和价值观念”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给这类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结论为有效提高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效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研究方法

1. 德尔菲法简介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是指由研究者拟定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当代师范生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编号:J-b/2016/27),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互联网+’背景下有效培养中学生科学素养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539),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三五”科研课题“当代师范生核心素养研究”(项目编号:JSNU2016YB04)。

[收稿日期] 2019-11-08

[作者简介] 韩典荣,女,江苏沛县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讲师。

王 高,男,江苏阜宁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师干训中心教授。

万东升,男,安徽无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教授,博士。

李佶莲,女,江苏江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讲师。

调查表,按照指定程序通过函件和电话征询专家组成员意见,专家组成员之间通过研究者的反馈材料匿名地交流意见,经过若干轮的反馈(一般三到四轮),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逐渐集中,最后通过对每位专家个人观点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建立共识,从而获得统计意义上的专家集体判断结果。德尔菲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对未来做出主观推测时,几个人的智慧要胜过一个人”^{[1][2]}。德尔菲法能够很好地整合专家的观点,建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集合,解决特定的、复杂的、真实世界的问题。

在应用德尔菲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用“共识度”和“稳定性”作为研究完成的判断目标。由于师范生素养的内容十分丰富,为了使师范生核心素养的研究更突出“核心”二字,在我们进行的三轮调研中,每轮的“共识度”和“稳定性”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但价值取向是一定的,下文会做具体介绍。

2. 专家组构成

专家组提供观点和数据来源,对整个研究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对于专家组的最佳人数设定没有公认的标准,通常可接受的人数范围在 15~25 人之间。

由于研究对象是师范生“核心素养”,为此我们确定专家组选择的范围为:(1)中学在职且具有正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2)从事教师教育且具有教授职称的高校教师,最终 16 名符合要求的专家同意参加本次德尔菲研究,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中学教师 14 名,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高校教授 2 名。这 16 名专家非常关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对我们的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有效性。

二、研究过程

研究共进行了三轮问卷调查,持续时间约为 6 个月。前两轮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进行,以专家参与为主,属于德尔菲法。第三轮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人数超过两百人,包括师范生和有 10 年及以上工作经

验的中学高级教师(包括专家组成员),属于普通问卷调查法。所有调研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被调查者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信息,以保证被调查者可以自由地、无压力地、无影响地发表意见。

1. 第一轮德尔菲调研——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初始建构

“核心素养”概念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各地区和国家对其还没有统一的概念和解释,但对核心素养本质的理解几乎达到了一致,我国的林崇德教授将核心素养定义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体”^[3]。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核心素养的本质。师范生核心素养属于核心素养下的一个分支,套用核心素养的定义,可以将其理解为:师范生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教师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合教师终身发展和教育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是关于教师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要求的结合体。为了能够准确地体现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专家对于师范生核心素养的理解,初始调查问卷采用的是开放式的主观题形式,具体问卷问题如下:(1)引言:简单介绍在当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形势下师范生面临的挑战,引导被调查者从核心素养的角度思考教师教育的目标和任务。(2)提出问题:结合工作经历,谈一谈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所需要的核心素养。

2018 年 9 月 16 日,我们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 16 名专家发放了第一轮德尔菲研究的调查问卷。10 月 20 日得到了所有专家的回复。16 位专家分别提出了 3~10 项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内容。经过整理,按照提及次数进行统计,我们认为提及两次及以上的内容应该是专家较为重视的因素,代表了第一轮调研的“共识度”和“稳定度”,整理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家视角下的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统计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1	教师职业道德(敬业、关爱学生、品德高尚)	12	11	文史知识	3
2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9	12	创新精神	3
3	沟通交流能力	8	13	教学管理能力	3
4	学科知识	8	14	合作能力	3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5	信息(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6	15	教学研究能力	3
6	自学能力	6	16	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2
7	实践能力	5	17	钻研精神	2
8	科学思维	5	18	科研意识	2
9	信息技术知识	4	19	课程意识	2
10	教学能力	4	20	实验能力	2

由于调查问题具有开放性,调研得到的观点比较分散,为了使调研结果的描述更具准确性,分类更为科学,我们查阅了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关于教师教育的相关文件,主要包括:2011年10月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2014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

2017年10月份颁布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参考这些文件中对教师教育内容的分类和描述,通过整合专家观点概括了11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这11项内容与专家组调研结果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参考国家教师教育要求的专家意见分类

对相关文件中教师教育内容要求的提炼	专家观点
理解教育的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教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
具有德育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教师职业道德(品德高尚)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关爱学生)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自学能力、合作能力、钻研精神
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教学能力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实践能力、教学管理能力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沟通交流能力、信息(媒体技术)应用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关注学科发展,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课程意识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学科知识、科学思维、信息技术知识、文史知识、实验能力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创新精神、教学研究能力、科研意识

这11项内容涵盖了专家提及两次及以上的所有观点,并对其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对于专家提及一次的观点,如:人格魅力、乐观、身心健康、人文(科学)素养、信息素养等内容则需要在第二轮调研中予以论证。

2. 第二轮德尔菲研究——意见的集中和整合

2018年12月4日,我们将整理出的11项内容和专家在第一轮调研中提及一次的内容编订成第二轮的问卷内容,发放给专家进行讨论。2019年1月26日问卷收回,16名专家都参与了第二轮的研究,问卷回收率为100%。第二轮问卷内容包

含两个部分:(1)第一轮11项内容的评议。要求专家对第一轮观点提炼出来的11项内容进行等级评分。评分采用的是五点式李克特量表的形式。(2)对第一轮11项内容进行增减建议。我们将第一轮中提及一次的内容提供给专家,请他们进一步确定其重要性,决定是否纳入师范生的核心素养体系。

对于评议内容,结果显示,没有专家提出删减的意见且11项内容的平均分都超过了4分,标准差小于1(如表3所示),这说明80%以上的专家认同这11项内容作为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内容,尤其是对“教师职业道德”这一项,专家组全部认同,意见统一。

表3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调查统计表

序号	内容	平均分	标准差
1	理解教育的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5	0
2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4.86	0.35
3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4.86	0.35
4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4.54	0.50
5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4.5	0.50
6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4.43	0.49
7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4.29	0.26
8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关注学科发展,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4.29	0.45
9	掌握教育理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4.14	0.35
10	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4.07	0.64
11	具有德育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4.07	0.26
*	具备信息素养,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	4.21	0.41
*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4.43	0.49

注: * 内容为后期增加内容

对于增添内容,我们认为超过半数的专家认可即可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中。有8位专家认为前面提及一次的人文(科学)素养也应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理由是不论理科师范生还是文科师范生都应具备较为全面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才能胜任未来教师的工作;有9位专家认为信息素养也应是师范生必备的素养之一,理由是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作为未来教师应具备较高的信息收集、处理、应用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教学效率。除了人文(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两项内容,其他第一轮调查提及一次的内容且没有达到半数及以上专家的认可,因此不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中。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我们将“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具备信息素养,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两项内容加入表1中,并将调查分析结果再次发给专家,请他们对新增的两项内容进行打分,两项平均得分分别为4.21和4.43,标准差也小于1,这说明新增的两项内容也得到了专家组成员的认同。

整合专家组成员以上意见形成了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的13项内容,并将以此作为第三轮调研的内容。

3.第三轮问卷调研——名教师^①与师范生观点的比较

考虑到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主体,他们对

师范生核心素养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为此第三轮问卷调研,扩大了调研范围,邀请了在职教师和师范生共同参与,利用网络问卷的形式,题目由打分式改为排序式,这样更能显示各项调研内容被关注程度的差别。2019年寒假期间,我们将前两轮调研提炼出的13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编辑成网络调查问卷,发放给在校的大学三、四年级师范专业学生和具有10年以上教学经验、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包括前期参与调研的16名专家)进行填写,要求他们从13项师范生素养内容中选取至少1项、最多10项教师教育必需的内容,并依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在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中共有104名名教师和108名在校高年级师范生参与了问卷调查。在数据处理上我们采取了记分法的方式,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选项平均综合得分=($\sum$ 频数 $\times$ 权值)/本题填写人数

权值设置规则由选项排列的位置决定,因为有13个选项,排在第一位的权值为13,第二位权值为12,第三位权值为11,依此类推,未参与排序的选项得0分。平均综合得分反映了综合排名的情况,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

调研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参与排序比例是指被选入10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的次数与总人数的比值,即表示认同该项为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人数的百分比。

^① 为了区别于一般教师概念的使用,本文对第三轮问卷调研中邀请的具有10年以上教学经验、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包括前期参与调研的16名专家)称为“名教师”。

表 4 名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统计

内容	综合得分	名教师		综合得分	师范生	
		参与排序比例	排序名次		参与排序比例	排序名次
理解教育的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12.06	91.35%	1	11.49	87.97%	1
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9.13	76.92%	3	9.04	75.09%	2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8.25	75.00%	4	8.75	82.40%	4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关注学科发展,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6.88	64.42%	7	6.71	64.80%	7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9.17	87.50%	2	8.85	85.20%	3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7.24	75.96%	6	7.00	73.10%	6
具备信息素养,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	4.11	50.96%	10	3.78	48.10%	11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7.65	86.54%	5	7.36	77.80%	5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6.13	75.00%	8	5.08	63.00%	8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3.30	47.12%	13	4.19	56.50%	10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3.92	46.15%	11	3.07	38.00%	12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3.63	48.08%	12	2.92	38.00%	13
具有德育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4.90	59.62%	9	4.67	52.80%	9

我们对 13 项内容的平均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13 项综合得分的 $|t| < t_{0.05}(df=200)$,表明名教师和师范生对这 13 项的关注程度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从分值、排序和参与排序的百分比上可以看出名教师和师范生对这 13 项内容的理解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

(1) 分值上,除“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项外,其余 11 项名教师给出的分数均高于师范生。分值差异最多的有两项,一项是“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名教师给出了 6.13 分高出师范生给出的 5.08 分,另一项“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选项上,师范生给出了 4.19 分高于名教师给出的 3.30 分。

(2) 排序上,差异最大的一项是“具备综合的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名教师将其排在最后一位,而师范生将其排在第 10 位。除此之外,名教师对“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具备信息素养,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这四项目的排序都先于师范生。而师范生对“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项内容的排序先于名教师。

(3) 从参与排序比例来看,虽然名教师和师范生都有 10 项内容参与排序的比例超过了 50%,但主要差异表现在“具备信息素养,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被 50.96% 的名教师选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中,而师范生将其纳入核心素养内

容的比率只有 48.1%；“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被 56.5%的师范生选入师范生核心素养的范围内,只有 47.12%的名教师认为该项应为师范生的核心素养。

综合名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的差异可以总结出,名教师比较注重“教学能力”“尊重学生”“信息素养”“教学创新”等与实际教学相关的内容,而师范生则更注重“自我发展”“综合素养”等与知识能力培养有关的内容。

表 4 中有 9 项内容同时被超过半数的名教师和师范生选择参与到排序中,分别为“理解教育的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关注学科发展,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具有教学组织能力,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具有德育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说明名教师和师范生对这 9 项内容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中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

值得深思的是,在所有选项中,名教师和师范生都将“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这两项内容排在了后面且低于半数的被调查者将其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中。

我们将调查结果整理后发给专家组成员,请他们针对名教师和师范生的调研结果差异以及师

范生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发表意见。16 位专家中的 14 位进行了回复,他们一致认同将选择超过半数的 9 项内容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对于名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的差异,14 位专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具体整理如下:

(1)“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选项没有得到重视并不是说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不重要,而是被调查者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教育学与心理学理论是进行教育教学的基础知识,隐含在实际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的过程中,应该被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的体系中。

(2)“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这一内容排在后面,这是因为进行教学创新和促进教学改革是教育教学中较高层次的活动,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作为基础,在教师职前教育阶段提出教改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有些超前,但要注重对师范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3)名教师关注与实际教学相关的内容,而师范生关注知识能力发展的内容,这是因为两者站的角度不同,师范生处在教育理论积累、教学技能养成的阶段,自然对知识的重视高于对教学实际的重视,而名教师与实际教学接触较多,其对教学的关注程度相对高于师范生。

通过进一步与两位专家面谈,与 6 位专家进行电话沟通,最后确定参与排序比例超过半数的 9 项内容,加上“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一项内容,共 10 项作为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内容。达成一致的 10 项核心素养内容具体描述了师范生培养的关键,我们将其进一步归类为四大领域,并对 10 项内容进行了高度概括,如表 5 所示:

表 5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

领域	素养	内容
教育理念与师德	热爱教育	理解教育的意义,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自我发展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关爱学生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德育能力	具有德育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领域	素养	内容
学科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能力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学科理念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关注学科发展,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教育理论与应用	教育理论与应用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教学设计能力	理解课程标准,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教学技能与实践	教学组织能力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教学实施能力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三、结论与讨论

本次研究运用了德尔菲调查法和普通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名教师和师范生对师范生核心素养的观点,并得出了具有共识性和权威性的研究结论。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了名教师和师范生对“师范生核心素养”这一问题达成共识的观点,具体内容见表5。这10项内容与国家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同时考虑到时代的特点,更突出了师范生培养的核心内容,为师范生培养的高效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

2. 研究启示

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两种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师范生核心素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直接影响着未来教育的面貌,应使研究结果能够对教师教育的现在及未来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尽可能地具备权威性,克服主观性,德尔菲法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专家经验集合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此外,德尔菲法与普通问卷调查法结合可以将专家的观点放在更为广阔的范围进行检验,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性。这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形式可以为很多教育问题的探索提供参考,尤其是那些具有未来性、发展性、主观性以及结论要求具备权威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研究结论上,利用德尔菲法和普通问卷调查法得出的涉及四大领域的10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是经过专家反复考量和评判得出的,并且经过

了名教师和在校师范生的认可,丰富了我国教育体系中核心素养的内容。这10项内容构成了一个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整体(如图1所示),可以通过相关课程与专业培养和职业培训结合起来,指导和引领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实践,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 [1]袁勤俭,宗乾进,沈洪洲.德尔菲法在我国的发展及应用研究——南京大学知识图谱研究组系列论文[J].现代情报,2011(5):3-7.
- [2]毕华林,万延岚.核心素养:基于理科课程的一个实证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6(9):34-41.
- [3]林崇德.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晨 晓)

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实践教学的视角

吴 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处, 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 实践教学在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达成中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实践教学面临着执行不到位、经费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与基础教育一线脱节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从强化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平台建设,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估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探索。

[关键词] 师范生; 教师专业素养;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17-04

师范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具有先导性、基础性的战略地位。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同年 3 月教育部等五部委也随之联合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由此可见,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力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在政策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师范院校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倾斜。在此背景下,作为师范教育的培养对象、拥有当下“学生”和未来“教师”双重属性的师范生,其预期培养要求进一步提高,师范生将来走上教师工作岗位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尤其是决定应用型人才达成度的实践教学问题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从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的角度,对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尝试探索解决途径。

一、实践教学对发展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意义

师范生的教师专业素养是对其将来走上教师岗位的从业要求。素养本身是一个类概念,教师专业素养可以理解为教师拥有的有关教学的专业能力、专业品德、专业情感和专业理念的集合。专业能力,反映着教师的教学水平;专业品德,对应着教师的师德修养,决定着将来其从教的努力程度;专业情感,对应着教师从教的自我感受和可持续性;专业理念,反映着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实践教学对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意义在于,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纯粹理论知识的习得。所有的知识,只有成为学习者探究和实践对象的时候,其学习过程才有可能成为素养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教学是教师专业素养之母。现代教育

^{*}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的立体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SJZD1174)。

[收稿日期] 2020-02-12

[作者简介] 吴 晋,男,江西大余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处副研究员。

学创始人之一、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做中学”这个基本原则。杜威认为,“从做中学”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它使得学校里知识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他说:“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不论对学习者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教育都必须以经验为基础。”^{[1] 297}经验从何而来?很显然,这种直接的经验只能从实践中、从活动中、从知识与实践的联合中而来。通过实践教学的真实情境,让师范生不断摸索尝试,直至最终解决问题,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实践来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过程。实践教学不仅对在校师范生意义重大,即便对入职多年的教师来说,不断的实践操练仍然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不二法门。顾明远先生认为:“成熟的教师也需要长期的培养和训练,除了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和技能外,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际操练。”^{[2] 112-113}“无论师德养成抑或教师气质涵养,无论是教育教学的基本能力的提高抑或教育智慧的生成,皆离不开实践教学的设计与实施。”^[3]

二、实践教学在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中的现实困境

基于实践教学对发展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意义,教育部在发布的系列文件中均强调师范生的教育实践时间累计不得少于一个学期,并对实践教学的形式做了具体的规定。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实践教学却面临着种种困境。

1. 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比,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实践教学从属于课堂理论教学的观念根深蒂固。其一,主要表现在师范生培养院校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不足,如经笔者调查后发现,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的师范生培养院校,其给予师范生的实习、见习经费与十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这显然不能满足当下实践教学经费的增长需要;其二,不少院校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力量薄弱,高职称、高学历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尤其是学科与课程教学论专业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许多学校为了弥补这一师资缺口让辅导员、实验技术员或者教学行政人员等没有任何实践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担任教学实践指导教师,其指导效果可想而知;其三是实践教学条件较为简陋。某些师范生培养院校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缺乏专门用于师范生实践教学的实验实训室;

其四是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对实践教学的参与度还较低,学习态度不端正,应付了事者有之,弄虚作假者也有之,以各种原因如考研考编请假者更不在少数。

2. 实践教学依然是师范生培养的薄弱环节,实际教学效果不如人意

出于接受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绝大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都纷纷把凸显实践教学作为其办学特色,如大幅增加实践教学的学时学分,在课程理论教学之外还加入实践模块等。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实践教学的效果却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在:许多课程的实践教学操作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或缺乏可模仿的先例,导致课程实践教学“换汤不换药”,流于形式者居多;师范生的教育实习缺乏集中统一管理,高校指导教师到教育实习基地的次数极为有限,缺乏对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现场指导;担任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埋头于理论研究,缺乏对基础教育一线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情况的了解和掌握。针对这种窘况,《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教师[2016]2号)指出,“师范生教育实践依然是教师培养的薄弱环节,师范毕业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小学的需要”。另外,有学者专门对某校实习的师范生们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实习的学生中83.5%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学校所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实习中完全用不上,51%的师范生认为所学的很多教育理念早已过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需要”。“据调查,在实习过程中,实习学生登台授课次数在8次以上的占26%,大多数次数在2—3次,远远没有达到相应要求。”^[4]

3. 实践教学中心或基地建设不能充分满足当前师范生教学专业素养发展的需要

其一是有的师范院校校内实训条件简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量不足,如此导致师范生培养院校难以集中统一安排所有的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难免会有一部分师范生处于“分散放羊式”实习,教育实习效果得不到保证;其二是教育实践基地数量虽充足但是缺乏互惠共赢关系和稳定的机制纽带。高校与校外基地联系的纽带不紧密,更多是“熟人社会”的人情,常会因各种情况处于变化中;其三是师范生培养院校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人才培养信息沟通不畅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校闭门办学的惯性导致其培养的师范生不了解

基础教育一线的真实需求,基础教育教学一线也无法发挥职后反哺的功能,如此便有可能导致学生在实习中参与度不够,实践锻炼机会少。最后,从了解到的现实情况来看,师范生的校外实践教学尤其是教育实习的指导工作,主要由教育实习基地的教师来完成。师范生培养院校实践教学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是否到位,工作成效如何,师范生的实习效果如何等,这些都缺乏有效的评价和监控机制。上述种种情况的存在,对师范生的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和发展极为不利。

三、改进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

针对当下实践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应该在政策层面确保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参与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尤其要根据新时代教师专业素养发展趋势,结合师范类专业认证评估要求,共同构建实践取向鲜明的人才培养方案,做好师范生人才培养的上层架构。同时通过改革实践教学课程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的学分学时比重等措施,形成与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当然,体系构建得再好,如果不加以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话,依然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所以,重在落实和落实到位,这是改进实践教学、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不二选择。

1. 正确认识和真正重视师范生实践教学

改善师范生实践教学的现状,不管是高校、教师还是师范生本人,首先,必须对师范生实践教学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能盲目地把它归类于哪一种教学形式,或是认为它从属于哪一类教学形式。实践教学是和理论教学相对等的一种教学形式,它不是理论教学的衍生物或者附属品,它依赖的基础虽然是理论,但它又高于理论,理论知识最终还要依赖于实践来检验校正。因此,师范生实践教学培养体系中的任何一员,首先都必须对实践教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不能把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附属品或者衍生物,也不能让实践教学代替理论教学。教育教学人员对师范生实践教学树立正确的认识是做好实践教学工作的第一步。其次,应对实践教学高度重视。对高校来说,就是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实践教学给予保障甚至进行适当的倾斜。如确保师范生实践教学特别是教育实习合理的经费投入、改善实践教学的硬件设施条件、为实践教学配备质量合格的师资

队伍并给予其不低于理论教学的课时费等,即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条件;对高校教师而言,就是要把师范生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认真备课,精心指导,严格考核,完成好每一个教学环节;对师范生而言,则是要保质保量认真完成每一项实践教学活动。

2. 以“协同育人”为机制,强化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平台建设

校内外实践中心和基地是实践教学的主要场所,是锻炼师范生实践能力、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平台。做好师范生实践教学工作,实现其培养目标,除了加强校内教师教学技能实训场所的建设之外,更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用人单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即努力贯彻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师〔2018〕13号)的最新理念,打造“协同制定培养方案、协同建设教(导)师团队、协同建设实践基地”合作育人平台,打通大学、政府和中小学(幼儿园)之间相互隔离的壁垒。具体做法是与中小学(幼儿园)共同实施综合实践课程的探索与实践,与基础教育用人单位供需对接,构建“订单培养”就业模式;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优势资源,深度合作,开展基础教育一线用人单位教师职后培训、教育科研课题合作立项等活动;形成“U-G-S”三方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打造人才培养共同体。推动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的成长、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使人才培养的三方协同机制真正落到实处。

当然,从目前师范生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和“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情况来看,当前推进情况不尽如人意,高校“一头热”的情况普遍存在。要改变这种窘境,在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使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一线用人单位协同师范生培养成为一种常规责任和义务,这需要一个过程。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培养院校为给师范生的实践教学提供良好条件,还组建了实体化的附属幼儿园和中小学,甚至组建了教育集团,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值得大力推广。

3. 多措并举,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能否得到有效提升的另一关键因素。一支业务水平高、德才兼备的指导教师队伍是实践教学得以顺利、高效

开展的重要保障,师范生培养院校要高度重视师资的引进和培养。综合近年来比较好的经验和做法,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大力引进基础教育名师,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发挥一线名师、教育科研专家对师范生培养的引领作用。这种“引进”可以是刚性的,即从基础教育一线招聘优秀的专职教师,直接为我所用;二是通过实施双导师制,柔性聘请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师为师范专业实习生的校外导师;三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专任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如积极选派教师赴中小学(幼儿园)实践学习,通过与基础教育一线的亲密接触,了解其需求,提高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培养的针对性。对新入职教师的岗前培训进行强化,以教研室为单位定期进行教学观摩和研讨等;四是要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确保配齐配足配好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同时在制度上确保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工同酬,对在实践教学中工作成绩突出的教师,可以在职务职称晋升和评优评奖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五是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引导教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的要求,建立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实践教学教师队伍。

4. 多方参与,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价机制

实践教学评价机制对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具有导向作用。“在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多方参与的评价机制,不仅有助于调动相关各方参与培养的积极性和有助于提升实践教学评价的准确性,促进教师教学的实效性。”^[5]师范生培养受到多方关注与参与,师范生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教师专业素养不是师范院校单方面决定的,培养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教育行政部门甚至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利益相关方。因此,参与实践教学评价的主体理应由上述成员组成,在参与评价活动时,包括教学质量目标的确定、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的确定、信息的收集与评估、信息的反馈与调控各方面均应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在师范生实践教学评价机制的建立上,一是

要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如可以采取校领导及二级学院领导定期走访实习基地制、师范生教育实习达成度调查、基础教育一线指导教师满意度调查等。二要建立及时反馈机制。不能虎头蛇尾,光评价不整改,必须强调纪律的严肃性,将评价结果作为师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并纳入学院教师年度绩效考核。三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手段。实践教学弱化或者说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教学场地在空间上远离了培养高校。但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可以有效补足空间上的短板。有条件的师范生培养院校可以建设自己的远程教育教学管理平台,条件暂时不成熟的,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性能可靠的网络平台进行教育实践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加强师范生信息技术能力培养。“从评估反馈情况来看,不少人谈到了现代教育技术问题,客观地讲师范院校目前信息化水平是比较滞后的。”^[6]因此现代教育技术的掌握与应用水平,无疑是当代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学科基础的同时,要重视对师范生进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训练,并将此内化到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 [1]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2]顾明远.中国教育路在何方:顾明远教育漫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 [3]郭翠菊.对教师教育课程实践教学设计必要性的省考[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1):115-118.
- [4]冀运鲁.构建师范生“学研用”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J].绥化学院学报,2019(12):109-112.
- [5]闫江涛.以卓越教师培养为指向的小学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8(6):100-104.
- [6]沈忠华.师范生实践教学标准构建与质量评价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3):111-117.

(责任编辑 晨 晓)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

宋雅¹ 章飞²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江苏南京 211200;
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以往的教师专业素养结构没有区分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在成分与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要素,如,常将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并列作为教师专业素养,且内容描述多有重复。在调研、反思的基础上,分析认为教师专业素养包括专业能力、专业理念、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4个相互独立的维度,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构成支撑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3个方面,这3个方面各有侧重,同时协同作用,共同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高校在设计有关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课程时,应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注重以实践性任务为载体,协同发展学生的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

[关键词] 教师专业素养;教师教育;师范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21-06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1],教师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素养的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对教学质量有很大影响。20世纪末,叶澜提出教师专业素养包含教育理念、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2];21世纪初,不少学者提出对照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指标,设计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时代发展对教师专业素养内涵结构有了新的要求。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体系如何重构?支撑教师专业素养的系统如何建构?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展开探讨,以期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目标指向。

一、教师专业素养现有结构及问题分析

1. 国外观点

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都对教师专业素养结构进行了划分。美国发布《共同核心教学标准》提出,内容和基本技能、营造课堂环境能力、规划学生学

习能力、开展教学活动能力、评价教学成果能力、教育领导力,是教师专业素养的6个组成部分^[3];英国发布的《英国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将教师专业标准分为专业知识和理解、专业素质及专业技能3个维度^[4];欧盟逐步建立起教师核心素养模型或框架,包括与他人合作,充分运用知识、技术和信息,紧密联系社会3个维度;澳大利亚的教师专业标准中,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成为教师专业素养的主旨^[5];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制定的“21世纪教师教育模型”强调了学习者中心、教师身份认同、服务专业和团体三方面的价值维度^[5]。

2. 国内观点

国内研究多以思辨分析为主,采用三分、四分和五分结构对教师专业素养进行建构。三分结构一般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意;四分结构一般包括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五分结构一般包括专业精神、专业理念、专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的立体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SJDH17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美卓越教师职前培养质量评价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0526)。

[收稿日期] 2019-12-20

[作者简介] 宋雅,女,河南安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硕士。

[通讯作者] 章飞,男,江苏如皋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处长,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智慧。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素养构成和表现;采用质性研究工具对政策文件和问卷调查进行分析,构建教师专业素养框架;从关注教师专业素养向关注职前教师核心素养迈进,如柯勤飞、张益提出的 SCIL 师范生核心能力素养模型^[6]。

3. 共性及问题分析

国内外有关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体系的研究有很多,大多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构建教师专业素养的结构框架,基于不同的视角,研究者对教师所应具备的专业素养也有不同的解读,但所得要素数量众多,要素所属层级及隶属关系尚不明晰,内涵结构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中。如国内各种框架中都具有知识、能力、精神 3 个维度,但在具体内容描述中多有重复,特别是有关知识和能力的部分。为此,在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过程中,应力求各一级指标处于同一层次,应相互独立,互不交叉。同时,需构建教师专业素养实现的支撑系统,支持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与提升。

二、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

无论是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还是测评,都需要了解其内在结构。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邀请高校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相关学科专家,中小学一线教师,师范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等,就教师专业素养结构进行多次研讨和修正。在研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下列共识: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完成教学任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完善自

我发展的相关能力;其次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保证其教育教学方向的正确性;还要认同教育教学工作,愿意终身为其奉献,以上几方面都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个人修养来作为做保障。因此,我们认为,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体系应包括专业能力、专业理念、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这 4 个一级指标,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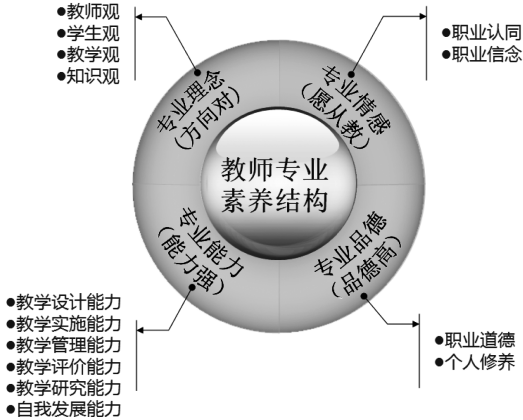


图 1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图

1. 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反映了教师的教学、育人和自我发展水平,包括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 6 个二级指标,其中,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能力直接指向教学过程,教学研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指向教师自身专业发展,详细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业能力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能力	教学设计能力	1.能结合学科要求和学生认知特点,确定适切的教学目标; 2.能根据学习任务的特征,设计合理的学习流程; 3.能基于教学环节的需要,选择适切的教学素材; 4.能基于教学目标和教学素材,灵活选择适切的教学方式,包括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方式等; 5.能基于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合理设计教学评价方案; 6.能基于阶段性教育教学现状,合理设计丰富多彩的班队活动
	教学实施能力	1.能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激发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2.能灵活运用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发挥学生主体性,引发学生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究; 3.能判断学生的学习状态,用科学的方法阻止、矫正不良行为; 4.能合理处理课堂偶发事件,监控和调整学生学习过程,并根据学生反应调整教学活动; 5.能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到教育教学中,为学生学习发展和教学过程评价、结果反馈提供支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能力	教学管理能力	1.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2.能采用多样化策略,了解情况不同的学生,组织管理好课堂; 3.能了解班级管理的基本方法,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形成集体观念; 4.能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共同开展家校合作,促进学生发展; 5.能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积极进行处理并及时控制局势
	教学评价能力	1.能基于不同的评价方法,设计相应的评价量表; 2.能了解并使用多元教学评价方式方法,给予学生恰当的评价和指导; 3.能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并给予学生相应指导; 4.能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反思,不断改进教学行为
	教学研究能力	1.具有研究意识,善于从教学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 2.了解教育研究的常规方法,能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3.善于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提升,能够组织实施教学研究课题,撰写教学研究论文; 4.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检验、完善
	自我发展能力	1.能认识自我,并制定专业发展与自我发展规划; 2.能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如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专业培训研修等

2. 专业理念

专业理念决定了教师教育教学努力的方向,包括教师的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和知识观 4 个二级指标,教师观和学生观着眼于教育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教学观和知识观着眼于教育活动中的内容和过程,详细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专业理念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理念	教师观	1.认识到教师是学习环境的营造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2.认识到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3.认识到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 4.认识到教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反思性实践者; 5.认识到教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处处可开展教育活动
	学生观	1.相信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力,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学生; 2.认识到学生的独特性和个体差异性,能公正地给予所有学生关心与支持; 3.相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教学观	1.相信教育教学对学生成长、教师自身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2.相信教学是一门科学,具有自身的规律,教学活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教学过程需要严谨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3.相信教学是一门艺术,教学活动不拘泥于法则,充满了创造的乐趣
	知识观	1.相信所教授知识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欣赏所教授知识的智慧之美; 2.相信知识具有动态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的; 3.相信知识具有主观性,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面对新事物、新现象和新问题做出的暂时性假设和解释; 4.认识到知识获取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学生学习是个体知识的建构过程

3. 专业情感

教师的专业情感对应着其从教的自我感受和可持续性,决定着教师从教的愿望,包括职业认同

和职业信念这两个二级指标,职业认同是专业情感形成的基础,职业信念决定了专业情感的深厚程度,详细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专业情感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情感	职业认同	1.具有职业理想、敬业精神,热爱教育教学事业,理解教育教学工作的意义; 2.注重自身专业发展,认同教师专业性和独特性,愿意从教
	职业信念	1.接纳、肯定自身的工作,乐于成为教师; 2.相信自己能够提供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教学

4. 专业品德

专业品德对应着职业道德和个人修养这两个二级指标,教师的师德和个人修养是隐性的,对学

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职业道德指向教师从事这一职业所特有的品德,个人修养指向教师作为个体所应具备的素质,详细内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专业品德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品德	职业道德	1.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 2.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为人师表,关爱学生,具有责任意识
	个人修养	1.富有三心,即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2.富有亲和力,性格热情开朗; 3.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能力,能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 4.具有不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 5.穿衣得体整洁,语言健康规范,举止礼貌文明

三、教师专业素养支撑系统的构建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为教师专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认为,要实现教师需要达到的目标性素养,应构建以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为底盘的支撑系统,如图 2 所示。

通用能力指一个优秀公民应该具备的通用的能力,包括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思维能力;专业知识指作为教师应掌握的知识,包括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知识、教育教学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生发展知识和自我发展知识;教师职业技能指教师职业特有的一些技能,包括口语技能、书写技能和信息技术技能等,具体内容如表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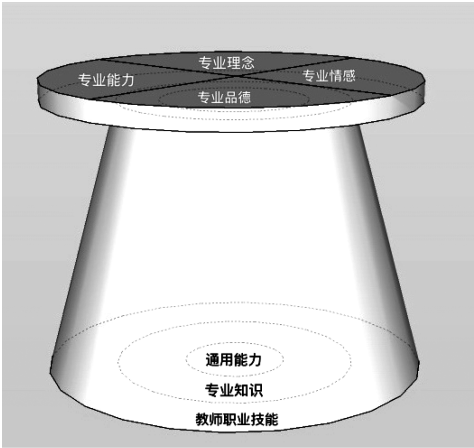


图 2 教师专业素养的支撑系统

表5 教师专业素养支撑系统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通用能力	学习能力	1.具备终身学习观; 2.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3.依据社会发展和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
	表达能力	1.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2.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能艺术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3.能较好地使用肢体语言,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动作和身体姿势等辅助有声语言传达有效信息
	合作能力	1.具有合作的意识,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2.能与他人通力协作完成工作,具有乐于分享、善于沟通、协同互助等方面的特质
	思维能力	1.具有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归纳、推理等常规思维方法; 2.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善于冲破思维定式,敢于质疑,善于释疑
	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知识	1.具有相应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艺术素养、人类社会发展、全球和环境意识等跨学科知识
专业知识	教育教学知识	1.了解相关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划等方面的知识; 2.掌握师德修养方面的知识; 3.掌握多种教学方法,并能根据具体教学任务加以选择; 4.掌握教育的基础知识,包括教育基本理论、学生和教师发展知识、学校组织与运行等; 5.掌握教学设计的基础知识,包括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学习内容选择、综合实践活动等; 6.掌握教学实施的基础知识,包括教学组织、教学监控等; 7.掌握教学管理的基础知识,包括课堂管理、班级管理,与学生、家长、社区等沟通的知识; 8.掌握教学评价的基础知识,包括评价方法、评价量表的制定、评价工具的运用、反思方法等; 9.掌握教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包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研究论文撰写方法等
	学科知识	1.掌握所教学科的基本思想、知识、技能和方法; 2.能从体系上把握所教学科知识,了解所教学科知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 3.了解所教学科的文化价值与认知价值,以及对学生素质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4.了解所教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学科教学知识	1.掌握所教学科的课程指标、教学要求等各类标准; 2.了解学生在学习学科内容时的认知特点; 3.掌握学习具体学科内容时,具体的方法与策略; 4.掌握学科课程资源开发、校本课程开发的方法与策略
	学生发展知识	1.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2.了解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掌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知识与方法; 3.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掌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知识和方法; 4.了解学生安全防护的知识,以及预防与应对方法
	自我发展知识	1.明确自我专业发展的重点,了解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 2.了解自我发展的阶段与途径,熟悉设计发展规划的方法; 3.了解影响自我发展的因素,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提升自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教师职业技能	口语技能	1.普通话语音标准,语法规范,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并获得所教授学科相应等级证书; 2.能使用符合学生特点的语言进行教育教学,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
	书写技能	1.能规范书写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 2.能基于学科特点,进行板书、板画、作图等; 3.能进行板书、板画、图表等的设计与布局
	教师职业技能	1.具有适应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信息技术技能,娴熟地将信息技术与学习、教学充分结合; 2.具有技术平台下资源的检索、搜集、评估与整合等技能;
	信息技术技能	3.了解并能熟练应用与教学相关软硬件,如熟练掌握课件制作,在线课程录制等技能; 4.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数字教育资源,掌握相应的工具与方法; 5.能借助技术工具收集学生学习的过程信息,并加以整理分析; 6.能利用技术工具进行学习测评,并基于测评结果及时调整教学

通用能力、专业知识、教师职业技能,三者从不同的维度共同支撑着教师的专业能力、专业理念等专业素养。通用能力保障教师成为一个优秀的善于不断学习的公民;专业知识保障教师具有从教相应的专业知识基础;教师职业技能确保教师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显出来。三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与教师专业素养之间并非单一的对应关系,而是三者协同作用共同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例如,良好的教学实施能力,既需要教师具有教学实施的相关知识(如学科知识、教育教学知识等),保证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正确性,通俗地讲,就是保证“自己肚子里有货”;也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通用能力(如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确保能和学生进行沟通,通俗地讲,就是保证“能将肚子里的货倒出来”;还需要特定的职业技能,从而保证师生的交流更为专业化、艺术化,达成更高的效果,通俗地讲,就是保证“货倒得更漂亮”。

为此,师范院校在设计有关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课程时,务必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注重以实践性任务为载体,协同发展学生的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例如,可在师范生学习过有关教学理论之后,布置实践性任务:制作教学微视频并进行交流评议。在微视频制作过程中,首先需要根据有关学科知识和教学理论进行相对完善的教学设计,这是对其相关知识掌握情况的一次检阅;同时需要将教学设计转化为微视频设计,需要制作精美、流畅、体现过程性的演示文稿等教学文件,是对师范生信息技术相关技能的一次考察;当然,还需要师范生录制微视频,又是对其口语表达技能的一次全面检阅;在微视频的交流评议过程中,同样考察了师范生的表达能

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等通用能力。总之,一个任务,力图将有关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很好地融合起来,协同发展。

四、反思与展望

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在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迭和丰富。为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当然,教师专业素养不同维度之间有何关系,职前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现状如何,教师专业素养各构成要素发展有无敏感期,如何从敏感期视角构建一个发展性的体系,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 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1):12-16.
- [3] 郑孝梅.具身认知理论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9(2):83-85.
- [4] 王美君,顾鑫斋.论国际视野中的教师核心素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44-49.
- [5] 曾文茜,罗生全.国外中小学教师核心素养的价值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7):9-16.
- [6] 柯勤飞,张益.基于SCIL核心能力素养的教师教育模式改革探索——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7(20):61-67.

(责任编辑 秋雨)

论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

——来自融合幼儿园教师及幼儿的声音

郭文斌^{1,2} 苏蒙¹

(1.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伊宁 835000;

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为深入探究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通过对3位融合幼儿园教师和2名融合班级幼儿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发现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到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因素影响。直接影响因素由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两方面构成;间接影响因素由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接纳程度、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构成。为了提升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特建议:国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完善康复设施配备;社会提高宣传力度并建立早期融合教育区域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家庭注重教育方式,创设有爱家庭氛围,培养幼儿亲社会能力;幼儿教师提升专业化水平,采用多种干预方式合理引导。

[关键词] 普通幼儿; 特殊幼儿; 接纳态度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27-09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学前融合教育是将3—6岁具有发展障碍的特殊幼儿安置在普通班级中,同普通幼儿共同学习和生活,并为特殊幼儿提供适合其发展的特殊教育服务,使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相互融合,成为一体^[1]。1975年,美国颁布了《全体障碍儿童教育法》(P.L.94-142公法),强调为特殊儿童提供一个正常化的教育环境而非隔离的教育环境。此法的颁布标志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开端,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2]。1994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召开世界特殊教育大会并提出了“全纳教育”思想。此后,融合教育的思想和理念便在世界各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我国在此背景下形成了

“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大量附设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融合教育发展格局”^[3]。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4]。2013年,《残疾人教育条例》指出:要建立与保育、康复相结合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制度,教育机构要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人员^[5]。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指出:各地要将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纳入当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支持普通幼儿园创造条件接受特殊儿童等。2017年,《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

*[基金项目] “十四五”残疾人事业规划前期研究重点课题暨2019年中国残联研究课题“普通儿童对特殊儿童接纳度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9ZC017)。

[收稿日期] 2020-02-01

[作者简介] 郭文斌,男,陕西渭南人,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副院长;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蒙,女,河北定州人,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再次表明支持普通幼儿园接收残疾儿童,并为学前教育机构中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功能评估、训练、康复辅助器具,提供半日制、小时制、亲子同训等早期教育服务^[6]。上述教育政策文件表明学前融合教育已慢慢转向实践应用。2018 年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以融合形式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 332 384 人,占有在校残疾学生的 49.91%^[7]。可见,融合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特殊儿童的主要安置形式。随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学前融合教育从关注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是否共处(即物理融合),转向关注特殊幼儿是否被普通幼儿接纳与尊重(即心理融合)以及特殊幼儿是否接受了适宜的教育(即教学融合)^[8]。但目前现状主要是物理融合,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仍处于一个消极被动状态,并未实现真正的接纳^[9]。基于此,研究拟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融合幼儿教师及普通幼儿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转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提供思路。

二、研究目的和动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前融合教育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主要是从学前融合教育理论、教师接纳态度以及从国外获得的融合教育启示、经验等方面进行探讨,有关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而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直接影响融合教育的质量及儿童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研究通过对 3 位融合幼儿园教师和 2 名融合班普通幼儿进行访谈,深入探寻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

态度的影响因素,以期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科学的应对手段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的转变。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

1. 研究方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 3 位融合幼儿园教师及 2 名普通幼儿进行深度访谈,选取质的研究方式,深入探寻和挖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一方面,通过教师日常生活中对幼儿的观察与了解获得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教师为研究者选取的 2 名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的普通幼儿进行访谈获得相关信息。访谈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对残疾的认识,包括残疾的定义及致残成因等;第二,对残疾幼儿的接纳态度,包括是否喜欢与特殊幼儿做好朋友及原因。

2. 研究对象

选择 3 位具有 3 年以上从事融合教育的幼儿教师及 2 名融合班普通幼儿作为研究访谈对象,详情见表 1。选择从事融合教育 3 年以上的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有两点原因:第一,他们比新手融合幼儿教师经验丰富,对不同障碍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幼儿的性格、身心发展特征等更为了解;第二,3 年也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一个周期,有 3 年从事融合教育经验的教师就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转变过程也更为了解。选取 2 名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的普通幼儿有 3 个标准:第一,语言表达能力好,可以进行访谈;第二,与特殊幼儿接触时间较多,有过合作与交往;第三,智力正常,无视力、听力、肢体障碍等。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专业背景	任教班级	特殊幼儿障碍类型	是否班主任
A 教师	女	29	5	本科	学前教育	大班	唐氏综合征儿童	是
B 教师	男	35	10	本科	特殊教育	大班	智力障碍儿童、多动症儿童	是
C 教师	女	25	3	本科	美术设计	大班	听力障碍儿童	否
A 幼儿(来自 A 教师班级)	女	6						
B 幼儿(来自 C 教师班级)	男	6						

3. 访谈过程

首先,与当地特殊教育研究权威人士取得联系,向其表明研究意愿并说明研究目的和内容,取得支持和帮助;其次,在权威人士帮助下,联系了 3 所融合幼儿园的园长并与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

愿;再次,在园长的允许和支持下,仔细挑选了 3 位符合条件的幼儿教师,教师的姓名对园长保密;最后,和任课教师约好访谈的时间和方式,并就访谈目的、情况及交谈规则、保密措施达成一致。对 3 位融合幼儿教师均采用线上语音方式进行了两次

访谈,每次长达1个小时左右。第一次访谈基于访谈提纲,根据实际情况,秉承尊重、倾听、开放的原则,保证研究对象能在轻松的氛围中坦诚交谈。第二次访谈就第一次访谈的问题进行深入与完善。每次与教师访谈结束后,由教师为研究者挑选2名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的普通幼儿进行访谈,并约好访谈时间与地点,时间大约为30分钟,地点为幼儿园的会议室。访谈时间开始于2019年6月13日,结束于2019年8月30日。

表2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影响因素

直接影响因素		间接影响因素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	幼儿自身特征品质	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接纳程度	社会资源支持
认知特点	普通幼儿特征品质	普通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融合观	人员投入
能力判断	特殊幼儿特征品质	特殊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经验量	设施配备
			教师干预法	宣传力度

五、讨论分析

1.影响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直接因素

同伴关系主要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10]。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接纳的前提,同伴关系的形成受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与幼儿双方自身特点两方面影响。

(1)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

第一,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特点

当被问到“什么是残疾”时,A 幼儿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应该就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可能是坐轮椅的人、戴眼镜的人、需要我们当小老师的人。”B 幼儿说:“他们可能听不见,戴着助听器,可能看不见,也可能是少一条腿或者是没有胳膊的人。”C 教师说:“当我给他们讲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小朋友的助听器时,提醒他们在和小朋友说话要大点声时,他们会问,为什么他听不清,为什么他要戴助听器,他是不是生病了。”当再次被问及“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A 幼儿说:“他们可能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B 幼儿说:“他们可能被别人打残了,或者是被车撞了,要不然就是耳屎把耳朵堵住了,所以听不见。”C 教师说:“孩子们对残疾的认知理解及致残成因并不清楚,以为他们生病了或者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

4.材料整理

首先,进行录音材料的文字转录;其次,核对整理转录的文字材料,请被访谈者确认并加以修改;第三,编码文字材料;第四,归类分析编码材料并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读。

四、研究结果

根据编码结果,研究得出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方面,详情见表2。

可见,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大多停留在直观形象层面。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普通幼儿的发展水平处于前运算阶段,主要是直观形象思维的发展,根据事物的表象进行思维,思维受到感知经验和行动的约束,缺乏观点采择能力^[11],因而,他们对特殊幼儿的残疾认知较多停留在外形象这一直观、浅显的层面。关于致残原因,普通幼儿大多将其归因于出生时所带来的内部原因或将其归因于外部环境致残等浅层次原因,对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尚不清楚。

第二,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能力判断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能力判断决定着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与认可程度。听障幼儿和普通幼儿各方面发展差距甚微,尤其是在有先天语言的基础上,由疾病等后天因素致残的听障幼儿在配戴助听器后,便可得到很好的听力补偿,虽然在听力和理解上相较于普通幼儿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通过后天培养可以弥补不足并能够与普通幼儿达到同等水平。

A 幼儿说:“亮亮总是需要别人提醒与帮助,该去排队了,该去做操了,好多东西老师讲很多遍都学不会,很少有小朋友愿意和他一起玩。”B 幼儿说:“博博和我一样,只是需要我对他说话时声音大一点。我们经常一起玩。”B 教师说:“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会说‘他怎么这么笨呀’,不喜欢和他们玩,我会提醒普通幼儿,他们只是慢了一点,然后引导普通幼儿去帮助他们。”

可见,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能力的判断会影响其同伴关系,普通幼儿常常会挑选与其能力水平相似的小朋友一起玩,特殊幼儿的障碍类型、残疾程度直接影响着普通幼儿对他们的接纳态度。

(2) 幼儿自身特征品质

第一,普通幼儿特征品质

普通幼儿的特征品质主要包括性格特点、语言互动能力、亲社会行为等方面。

在性格特点上,A 教师说:“乐于助人、温和善良的孩子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更好,被家里溺爱的孩子对这些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相对差一些。”C 教师说:“本身比较听话的、心智比较成熟的孩子比性格蛮横、霸道的孩子接纳度要高。”在语言互动能力上,B 教师说:“活泼的、乐于助人的、热情的、善于表现自己的小朋友对特殊小朋友接纳度比较高,性格稍微内向的、不太喜欢与人交流的小朋友接纳度比较低。”在亲社会行为上,A 幼儿说:“妈妈总是告诉我在学校要好好和小朋友们相处,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帮助他们。我经常帮助亮亮,做他的小老师,提醒他不要捣乱,玩游戏的时候叫他一起玩。老师每次都会夸我,称我为小老师,我很开心。”B 幼儿说:“博博是我的好朋友,我很喜欢和他一起玩。当他听不清的时候,我就大声叫他,他就听见了。”

普通幼儿的特征品质直接影响着其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如果普通幼儿自身有良好的同理心、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性格特点,他们就会积极转变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这与已有研究一致^[12]。但是,受生活经验的局限、认知思维的发展水平影响及家长引导的缺失常常会使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态度。

第二,特殊幼儿特征品质

特殊幼儿的特征品质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幼儿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主要涉及性格、情绪及问题行为等层面。

在性格特点上,B 幼儿说:“博博很可爱,他经常会带好吃的给我们,下课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做游戏,成绩也很好,经常借给我们东西,就是有时候他听不到我们叫他,我们要叫他很多次他才可能听到。”在情绪上,A 教师说:“情绪稳定、性情温和的小朋友更容易被接纳。”在问题行为上,A 幼儿说:“亮亮有

时候不好好听课,总是东张西望,还爱哭,有时候脾气很暴躁,还会在班上乱跑乱跳,惹老师生气。”C 教师说:“之前有名中度自闭症幼儿,经常尖叫,上课乱跑,自言自语,对别的小朋友有攻击性行为,在玩区域角活动的时候,毁掉小朋友刚搭好的积木,导致小朋友们都不喜欢和他玩,即使他去主动和别的小朋友说话,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可见,特殊幼儿自身的特征品质也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幼儿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一般情况下,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和无破坏行为的特殊幼儿更容易被接纳。有研究表明,有较多攻击行为、不合群行为以及沟通互动困难的特殊幼儿较不容易被普通幼儿接纳^{[13]87-90}。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到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的影响,目前接纳态度仍不容乐观。为改变此状况,首先,在符合普通幼儿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加以正确的认识,可以从对肢体残疾、视力障碍、听觉障碍等外显性障碍儿童的认识过渡到对智力落后、自闭症等内隐性障碍儿童的认识;其次,可以通过绘本、角色扮演等游戏活动介绍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幼儿,引导普通幼儿更加了解与关注他们;再次,要帮助普通幼儿发现他们和特殊幼儿的相似点,并亲身体验和感知特殊幼儿的生活,从特殊幼儿的需求角度以及普通幼儿的积极自我价值归因去提高普通幼儿帮助特殊幼儿的自觉性^[14];最后,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中增加特殊幼儿的正面形象,提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了解与认识度,增加接纳度与认可度;通过上述举措不仅可以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与尊重,而且可以通过早期融合教育为后续衔接教育阶段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影响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间接因素

(1) 家庭教育方式

第一,普通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普通幼儿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接纳态度是顺利开展融合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有研究表明,只有 18.7% 的普通家长赞同招收特殊幼儿入园^[15],和特殊幼儿家长相比,大多数普通幼儿家长不了解融合教育,担心孩子的学习质量会因此受

到影响,因而反对招收特殊幼儿入园。普通幼儿家长的教育方式、态度及家长对特殊幼儿的关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普通幼儿的性格养成及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

B 教师说:“融合班成立之初,家长要求进班听课,不太接纳特殊孩子在我们班中。后来,经过几次在家长会上的宣传和共同亲子活动的举办,家长也就不再反对了,还是挺支持的。”A 教师说:“据我了解,家长们很少在家向幼儿普及特殊教育方面的知识,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对特殊幼儿加以关注。”A 幼儿说:“妈妈是一名志愿者,经常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小朋友。”

可见,父母的榜样力量及父母对特殊幼儿的态度会间接影响普通幼儿的行为。一方面,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并将这种理念传授给幼儿;另一方面,孩子的亲社会能力是需要体验、积累的,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幼儿并帮助其建立这种亲社会情感,激发孩子内心帮助他人的欲望,使其体验帮助他人后获得的快乐,对他们良好行为给予正向强化。

第二,特殊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特殊幼儿家长在态度、行动上更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融合教育,期望孩子能够在融合幼儿园中被接纳,与小朋友们和睦相处并收获友情,但是,一部分特殊幼儿家长由于自己孩子的不良状况经常处于低落消极的情绪状态,致使家庭氛围紧张、压抑而缺少爱。有研究表明,父母消极悲观的心态会使特殊幼儿在其性格养成中产生一定的缺陷,从而间接影响他们在园中的被接纳程度。

C 教师说:“博博妈妈为了更好地照顾博博的生活起居辞掉了工作。妈妈很乐观,经常会为博博做各种爱心甜点并让博博带到学校和小朋友们分享;当有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会和博博一起为小朋友制作礼物;节假日会带博博出去旅行,感受大自然,开阔视野。”C 教师还提道:“之前班上有一名中度自闭症幼儿,幼儿的母亲是一个单身妈妈,忙于生计,对孩子的陪伴很少。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就不闻不问。我当时还没有任何融合幼儿经验,而且孩子问题行为很严重,上课闹起来时我总是感到束手无策,外加没有助教辅助,教学压力很大,孩子们接纳度也很低。”A 教师说:“我和特殊幼儿的妈妈每周五下午都会抽

出半个小时进行线上交流,反馈孩子本周的情况、所学的内容,实行家园一体化,家长也很配合。有时,特殊幼儿的家长还会邀请一些普通小朋友去家里做客。孩子在幼儿园和父母帮助下有了明显的进步。”

家长不仅是儿童生活中的照料者,还是特殊儿童干预和康复中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实施者^[16]。因此,特殊幼儿的家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殊幼儿家长一方面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营造有爱的家庭氛围,向幼儿积极地传播正能量;另一方面,特殊幼儿家长应多和老师交流沟通,只有家园合作,才会更好地促进特殊幼儿的成长。

(2)教师接纳程度

第一,教师的经验量

教师丰富的融合教育支持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度,还会使特殊幼儿无论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还是人际交往沟通能力上取得很大的进步。

A 教师说:“我在本科期间很少接触特殊幼儿,遇到的多为调皮、淘气的孩子,学校也没有开过特殊教育相关课程,我刚工作时幼儿园也没有开展相关的特殊幼儿培训工作。班里来了一位唐氏综合征宝宝,我心理压力很大,害怕自己无法掌控这个局面。后来我在网上查阅资料深入了解融合教育,并向特殊教育教师请教相关专业知识,吸取经验,尽可能多地找教学方法帮助特殊幼儿适应在普通班级的学习和生活。”B 教师说:“我会经常出差参加培训,不仅学习学前技能培训、蒙氏教学、班级日常管理、一日行为规范,而且学习有关问题行为、正向行为支持、VB-MAPPE 评估等特殊教育专业知识。我们园所会邀请专家对新入职的融合幼儿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园所内部也会经常举行专题讨论会。”C 教师说:“我本科学的是美术设计,工作后很少接受培训,到目前为止只参加过两次培训,主要是有关普通幼儿的教学教法。关于特殊幼儿教育教学的培训大多为理论知识,实操性内容很少。特殊幼儿进我们班的时候,我有些担心教不好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教。”

3 位教师只有 B 教师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特殊教育及培训,另外两位教师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特殊教育,工作后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在融

合教育的过程中,因为缺乏知识,面临各种各样的教学及管理压力。总体来看,当前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方面存在特教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缺少专业训练、无法同时处理教学与其他班务等问题,难以兼顾特殊幼儿和一般幼儿。融合教育并不只是将特殊幼儿安置于普通班级中,也需要相关资源的融合,而课程与教学的调整是实现真正融合的关键^[17],幼儿教师缺乏融合教育经验间接影响了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

第二,教师的融合观

教师融合观是实现特殊幼儿被接纳的前提,如果教师有积极的融合观,便会主动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想方设法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帮助特殊幼儿在班级里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获得来自班级的关爱;反之,便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A 教师说:“融合会让普通幼儿接受差异、接受多元化,幼儿长大后也会更容易接受这个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她同时也提道:“好多特殊幼儿的家长存有一定的理念误区,认为只要孩子进入普通幼儿园就是好的。融合教育并非适合所有特殊幼儿,家长应该摆正心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找寻适合孩子的受教育方式。幼儿园应该灵活安排,可以开设一个小时的融合班级,为特殊幼儿提供机会,保证康复与教学相融合。”B 教师说:“融合教育是让特殊幼儿加入普通班级中,但并不是随班就座、随班就读,而是去真正融合,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真正接纳,使双方都能身心健康发展。但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会存在很大的压力,不仅要照顾好普通幼儿,还要考虑特殊幼儿的适应能力。在座位安排、课程设置、内容讲解、方式方法上都需要注意。”C 教师说:“我认为融合教育适合在幼儿园开展。幼儿园班级中同伴中介影响比较大。同时,幼儿园小朋友无论是向师性还是模仿性都比较强,在老师的引领与教导下,他们会逐渐接纳特殊幼儿。”

可见,大多数教师持有积极的融合观念,他们认为融合教育不仅能培养特殊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且能提高普通幼儿对差异化、多元化社会的认知,同时能促进普通幼儿自尊感、自我效能感、怡情能力等社会性的发展。于此同时,教师也承担着一定的心理压力。A 教师提到了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安置方式,在当前的社会

背景下,融合教育是否适合所有的特殊幼儿,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第三,教师的干预法

研究表明,学前融合教育虽为特殊幼儿提供了未来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发展经验,但融合环境并不会自发地引起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的互动甚至是接纳特殊幼儿^[18],因此,教育工作者的引领至关重要。幼儿教师应创设一个强调积极性、关注相似性、包容差异性、接受多样性的环境氛围,实施系统的、有目的的干预措施。

A 教师说:“首先,我引导亮亮去参加集体活动,鼓励孩子们主动和他交朋友,上课时,会让他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其次,举办了两个专题活动,一个是每周挑选关于唐宝宝的绘本讲给孩子们听,促进其内部转化;另一个是举行了一场‘拥抱亮亮小朋友’的活动,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他,并且让亮亮体会到小朋友们对他的关爱,促进其外部转化。最后,我有意识寻找活泼的、乐于助人的小朋友充当他的小老师,并且定期为小老师颁发小红花和奖品。小朋友们和亮亮相处得还是比较愉快的,接纳度比较高。”B 教师说:“首先,特殊幼儿除了有固定的影子教师外,还会为他寻找一个小老师。其次,举行亲子融合互动活动,邀请普通幼儿家长和特殊幼儿家长一起陪伴幼儿玩游戏。再次,积极宣传融合教育理念。家长和幼儿在经过几次亲子活动后,接纳度和支持度都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在幼儿园课上的合作活动中渗透融合教育。当教师发现普通幼儿嘲笑特殊幼儿时,常常采取冷处理方式,慢慢引导普通幼儿帮助特殊幼儿一起完成任务,提升普通幼儿成就感的同时也促进了两者的互动交往。”

经过教师们有效干预,大多数普通幼儿转变了对特殊幼儿的态度,不仅变得更加自信,而且愿意主动去帮助特殊幼儿完成一些任务。特殊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也不断得以提升,主动性语言慢慢增多,生活自理能力也逐渐提高。台湾研究者发现,如果缺乏成人有效、系统的指导,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的同伴互动会低于师幼互动,并出现忽视、拒绝、难以维持的特点,使特殊幼儿处于被动、不被理睬的地位^{[19]28}。众多学者提出,教师干预引导有助于促进儿童间的积极交往,更有学者指出若未给予适当的引导,不仅特殊儿童难以

和普通儿童建立友谊,发展人际关系^[20],而且会令普通儿童缺乏对人类差异的理解,“同理心”及人文关怀欠缺。因此,教师不仅应加强对普通幼儿的正确引导,减少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错误认知,而且应密切关注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的互动,并适当给予介入,转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

(3) 社会资源支持

第一,投入人员

人员投入决定着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团队合作对特殊幼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A 教师说:“我认为应该成立融合幼儿园小组,要有专家指导,并进行合适的评估,同时应该有足够的师资来管理课堂,或者缩小班额,一个班 25 个孩子实在不好管。”B 教师说:“我们会给每个孩子做课堂记录表并且每周开展教师研讨活动,我们会给特殊教育康复教师讲特殊幼儿在普通课堂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针对孩子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个别化训练,而且会定期开展家长课堂,帮助家长获得相关的育儿知识,家园合作,促进幼儿成长。”

当前我国大陆地区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特殊教育师资不足、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缺失等问题。幼儿教育融合素养的缺失,使得教师在面对班里特殊幼儿时不能采取有效的教育手段,影响了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21]。《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中明确指出:“促进医教结合,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加强专业人员的配备与合作,提高残疾学生评估鉴定、入学安置、教育教学、康复训练的有效性。”^[6]学前融合教育是需要幼儿园、家庭、社会通力合作的工程,一个好的融合教育团队应该包括学前融合教育专家、园长、学前融合幼儿教师、幼儿家长及特殊教育教师、语言康复师、物理治疗师等。目前我国学前融合教育团队支持体系的建构仍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大多数幼儿园尚未组建团队,不仅给融合幼儿教师带来了巨大压力,也阻碍了特殊幼儿的成长。为改变现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模式进行团队建设,加强团队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支持普通幼儿教师和特殊教育专业领域的康复教师进行合作,共同为特殊幼儿的需求做出反应,并持续参与特殊教育专业训练课程建设^[22]。家园、社会通力合作,共同为

特殊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第二,配备设施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指出:“加大力度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并为学前教育机构中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功能评估、训练、康复辅助器具等基本康复服务。”^[6]目前大多数幼儿园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融合对特殊幼儿的积极意义,但是,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建设康复设施、设置课程、建立相应评价体系都需要经费投入和大量的人员投入,管理者感到力不从心。

这 3 所融合幼儿园只有一所有专业的康复设备。B 教师说:“我们融合幼儿园有专业的康复师资和康复设备,融合幼儿除了在融合幼儿园学习之外,还会在这里进行康复训练。教师每周都会开展研讨活动,对每一个特殊幼儿制定教育计划,并针对其在课堂上出现的行为问题进行讨论,寻找解决方案。”A 教师说:“我们很需要建立资源教室,需要康复教师和康复仪器。我们幼儿园并没有相应的设备与教师,我们班特殊幼儿手脚无力,语言表达不清晰,没有受过相应的物理治疗和语言治疗。”C 教师说:“未来,可能会有多种类型的特殊儿童进入我们的融合幼儿园,不同类型的特殊孩子所需要的康复设备、个别化教育计划均不相同,因此,幼儿园应该尽可能完备这些措施或者是同康复机构进行合作。”

可见,完善康复设备很有必要,但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并没有配备相应的康复设施。就特殊幼儿而言,康复与学习缺一不可,应齐头并进,康复设备等硬件条件不足对特殊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未来会有不同障碍类型、不同程度的特殊幼儿进入融合幼儿园,不会仅局限于轻度障碍幼儿,融合教育应该是安置特殊幼儿的起点而并非终点,普通教育学校应该设置最少受限制环境,保障特殊幼儿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第三,加大宣传力度

社会的接纳与支持有助于特殊幼儿认知、情绪和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和补偿,并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融合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23]76-77}。美国从 20 世纪中叶便开始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的传播,并不断探索创新教育实践模式,从 2004 年开始使用 RTI 模式,为学业存在困难的学生提供有效的支持与服务,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良好的反响。

我国虽颁布了一系列保障特殊幼儿接受平等的受教育权的条例,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并未真正落实,社会宣传作用未有效发挥,学前融合教育理念未深入人心,特殊幼儿未得到平等的待遇与尊重。

A 教师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几乎没有接触过特殊幼儿,也没有听说过融合教育。”B 教师说:“普通幼儿的家长起初并不同意特殊幼儿进入班级,担心会影响到自家孩子的成长。”C 教师说:“家长们自身都不太了解融合教育,我起初也不太了解,更别说给孩子们树立正确的理念了。”

特殊教育工作者及残联人士应该担负起责任,倡导社会普遍树立一种包容、开放的教育和人权理念,将对特殊幼儿的接纳与支持视为社会发展的文明尺度,创设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可以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正面传播有关特殊幼儿的专业知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整个社会对特殊人群的接纳度。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到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接纳程度、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间接影响,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注意言谈举止,为幼儿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幼儿营造有爱的家庭氛围。在教师接纳程度方面,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帮助教师树立积极的融合观念。在社会资源支持方面,教育部应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统一部署,通过建立区域早期融合教育联盟并发挥联盟平台的功能,成立由学前特殊教育专家引领,园长、教师、家长等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发挥组织协调功能。建立特殊幼儿的个人数据档案,实现幼儿园资源共享。辐射核心幼儿园的融合教育经验,实现特色课程、优质教学案例、教学经验的线上线下共享。通过联盟,积累对儿童评估、干预、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的经验,并打造教师与家长之间相互理解、共同信任的新格局^[24]。

六、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第一,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包含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因素。

第二,直接影响因素由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两方面构成。

第三,间接影响因素由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接纳程度及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构成。

第四,通过访谈发现,在学前融合教育方面,

存在以下问题:幼儿教师对特殊幼儿接纳度低,幼儿教师教育特殊幼儿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缺失,幼儿教师对学前融合教育价值认可度较低,教育支持系统尚不完备,社会群体对融合教育理念认识不够,家庭教育方式有待优化,尚未组建学前融合专业团队。

2. 建议

第一,加大融合教育宣传力度,使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融合教育理念。

第二,提高国家经费投入力度,完善融合幼儿园康复设施,建立资源教室。

第三,注重融合幼儿教师职前职后培训,创设温馨和谐的园本环境,采用多种游戏活动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正确的认知理解。

第四,注重家庭教育方式,创设良好的环境,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实现家园共育。

第五,建立早期融合教育区域联盟,以区域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和教育康复中心为核心,建设由专家引领的团队,建立融合教育资源优秀案例库,实现教师交流互动、经验共享。

七、研究反思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融合学前教育理念、融合幼儿教师、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态度研究,较少有研究关注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主要从幼儿教师和普通幼儿的角度进行了深度访谈,挖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对如何改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只深度访谈了3位融合幼儿教师和2名普通幼儿,未来应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要处理好与一线教师的人际距离问题,通过采取更加合理有效的方法尽可能消除受访者的心理顾虑,以便更好地引导其与研究者深入交谈,从而获得可靠的信息和资料。

[参考文献]

- [1] BUY SEE V, BAILEY D B. Behavioral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integrated and specialized settings: A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J].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1993(4): 19-35.
- [2] 余强. 美国学前阶段特殊教育全纳安置模式述评[J]. 外国教育研究, 2008(8): 44-48.

- [3] 朴永馨.融合与随班就读[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4(4):37-40.
- [4]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中央编办,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EB/OL].(2009-05-07)[2020-01-20].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410/t20141021_180368.html.
- [5] 王家勤.《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理念创新与制度完善[J].人权,2018(2):36-43.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七部门关于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EB/OL].(2017-07-28)[2020-01-20].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8/content_5214071.htm.
- [7] 教育部.特殊教育基本情况[EB/OL].(2019-08-09)[2020-01-20].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8/qg/201908/t20190812_394169.html.
- [8] FUCHS D, FUCHS L S. Inclusive schools movement and radicaliz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Reform [J]. Exceptional children, 1994(4):294-309.
- [9] 宁亚飞,刘春玲.5~6岁普通幼儿对特殊需要幼儿的接纳状况[J].中国特殊教育,2018(4):3-9.
- [10] 邹泓.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2):39-44.
- [11] 王琳琳,韩文娟,邓猛.普通幼儿眼中的残疾:一项融合幼儿园的质性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9(7):8-14.
- [12] DYSON, L L. Kindergarte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05(2):95-104.
- [13] 钮文英.拥抱个别差异的新典范——融合教育[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8.
- [14] 刘颂,钱红,付传彩.北京市学前融合班级中普通幼儿对残疾的认识与接纳态度[J].中国特殊教育,2013(10):3-8.
- [15] 严冷.北京普通幼儿家长全纳教育观念的调查[J].中国特殊教育,2009(9):8-18.
- [16] 孙静雯.家庭中心模式在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的应用[J].现代特殊教育,2017(22):69-73.
- [17] 陈全银,魏燕荣.台湾学前融合教育现状及困境之探究[J].现代特殊教育,2017(8):53-58.
- [18] YU S Y, OSTROSKY M M, MEYER L E, et al. Using teacher impression journals to improve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J]. Topics in early children special education, 2016(4):245-255.
- [19] 周念丽.学前融合教育的比较与实证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0] 魏寿洪,王雁.自闭症儿童社会技能评估的研究进展[J].中国特殊教育,2010(10):51-56.
- [21] 赵鑫鑫,王庭照.我国台湾地区幼儿教师融合教育素养的培养特点及启示[J].现代特殊教育,2020(3):73-79.
- [22] 叶增编,吴春玉,廖梅芳.学前融合教育:理想与现实——基于一名自闭症幼儿融合教育的个案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9(12):7-11.
- [23] 杨楠.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系统的个案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 [24] 王瑶,张薇.区域早期融合教育联盟的建设与发展[J].现代特殊教育,2017(3):69-7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幼儿人际问题解决中教师的影响及教育策略

黄心彤 吴吉惠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 解决人际问题是当今世界个体社会化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从婴儿和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并随着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继续在幼儿园这个微型社会中进行。作为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发展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关于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认知、介入行为、师幼互动和师幼关系都深刻地影响着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倾向、认知与行为以及人际问题解决模式。教师可以通过丰富自身问题解决的知识与经验,转变教育思维,增强行为指导能力,把解决问题的权利移交给幼儿,改善与特定幼儿的关系,增加对幼儿的行为期望和情感支持等方式,提升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

[关键词] 幼儿; 问题解决; 人际问题; 教师影响; 冲突

[中图分类号] G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36-04

人际问题解决技能作为幼儿建立健康人际关系所必需的社会能力之一,从有效预测幼儿未来的社会适应以及外化行为问题层面上来说,学前教育中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幼儿理解问题的性质并解决人际问题的技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Shure和Spivack在人际问题解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提高幼儿的人际问题解决技能,Shure和Spivack最先设计出在幼儿园环境中实施的人际认知问题解决干预项目(ICPS)^[1]。在幼儿园环境中,幼儿教师是开展活动、进行干预的主要实施者,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及对幼儿的指导质量,对发展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具有显著作用。因此,本文从幼儿教师入手,深入分析幼儿人际问题解决中教师的影响,并为教师在培养和指导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发展方面提供思路。

一、教师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影响

1. 教师关于人际问题解决的认知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倾向的影响

幼儿正处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兴奋强于抑

制的自我控制困难年龄段,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他们常常因为想要快速表达想法容易将互动行为发展为冲突。幼儿发生与解决冲突最容易引起教师的关注,也是教师主动干预频率较多的问题情境。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平”的交往方式,因此,多数教师会对幼儿这种“特殊”的社会互动方式感到不安,从一定程度上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现象,甚至将冲突与攻击性画上等号。事实上,冲突在幼儿人际交往过程中是一种相当正常的社会现象。通常,这种行为背后并没有恶意,而是一种发现事物运作规律的方法^[2]。如果教师没有形成正确的冲突观,无法有效区分解决问题的冲突行为与纯粹的攻击行为,那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教师面对幼儿间出现较激烈冲突的情况时,他们的焦虑、紧张程度可能会随着幼儿情绪的高涨而加剧。研究显示,高度焦虑会通过干扰工作记忆的资源来阻碍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3]。在介入幼儿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当教师无法有效控制自身情绪时,教师的消极情绪水平就会变高,特别是面对那些试图解决问

[收稿日期] 2020-03-01

[作者简介] 黄心彤,女,四川德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吴吉惠,女,四川广安人,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题却又缺乏问题解决技能的孩子,教师会表现出更多非积极的态度。教师非积极的态度无益于引导幼儿积极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行为,幼儿也无法在这种情境下专注于问题解决,因为他们随时会陷入被打断的局面。教师的积极态度和反应会正面影响幼儿解决问题的后续行为以及教师自身的干预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教师不仅报告了与问题解决能力有限幼儿的冲突感,也报告了与提出多种不同解决策略幼儿的冲突感;从亲社会与攻击性两个维度评估幼儿的问题解决策略时,教师指出了与提供攻击性策略幼儿之间的冲突关系,但并没有指出与亲社会策略幼儿之间的亲密程度^[4]。由此看来,教师对提出不同数量和不同类型问题解决策略幼儿的冲突感知相差无几。如果幼儿为解决问题提出多种可替代解决策略或亲社会解决策略,那么,师幼亲密程度会增加。从幼儿角度分析,幼儿尽可能地提出更多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最优的解决方案,这类幼儿解决问题的导向更倾向于积极方向,比问题解决策略有限幼儿的认知灵活性更高。认知灵活性中的替代维度与问题解决技能中的坚持不懈、建设性问题解决的因素呈高度正相关^[5]。当幼儿问题解决策略越多时,最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产生的概率越大。尽管解决策略类型的社会可接受度还有待提升,幼儿可能只是缺乏解决问题的经验技巧以及缺乏对策略适用性和有效性的思考。鉴于此,我们似乎更应该将问题的焦点转向对待有着不同表现的幼儿却有相似感知的教师。教师是幼儿获取知识经验的主要信息源之一,研究显示,知识丰富信息源与儿童问题解决呈显著正相关,不知道信息源和错误信息源与儿童问题解决呈显著负相关^[6]。教师若储存了可能的问题解决知识经验,对问题内容和性质理解会更丰富,对幼儿问题解决线索也会更敏感,应对幼儿解决问题行为的表现就会很不一样。

2. 教师介入行为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自由玩耍时间、活动过渡间隙以及参加大型活动时幼儿人际问题发生最为频繁,材料和玩具共享、争夺领导地位、团体游戏中的角色分配、嫉妒等常常是引起幼儿人际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当这些人际问题出现时,教师的一些适当(如提供情绪安慰、推理和解释、目光接触、引导孩子解决

问题)和不当(责骂、忽视、嘲笑、惩罚等)的行为都被用于解决人际问题^[7]。教师对幼儿同伴冲突的介入行为研究中,教师以权威仲裁、单纯制止为主要介入行为^[8]。这样的介入行为反映出教师不恰当的问题解决示范和对人际问题的高度控制。由于幼儿认知理解和对合理社会行为的判断意识尚未发展稳定,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容易相信攻击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尤其是当教师作为一个权威影响源,以简单粗暴的制止、强制分开、责骂等消极行为应对幼儿攻击性行为时,幼儿可能会错误知觉教师的消极行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无疑会强化年幼孩子的错误认知和攻击性行为。

此外,当安全问题升级、教室秩序和教学计划被扰乱等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出现时,教师通常会控制问题解决的主导权,限制和减少幼儿尝试解决问题的机会。控制行为的实质是将幼儿间的问题呈现给教师自己,目的是让问题更快更容易地消失,教师甚至不使用语言或投入情感引导幼儿自主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提出建议,告诉幼儿“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幼儿可能会因为教师的要求而采取暂时服从的行为,但这并不能促进幼儿的自我控制、谈判、协商等问题解决技能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培养幼儿社会能力的长期目标的实施进程。研究表明,5岁幼儿面对问题情境时,很少主动提问或解释说明自己对问题的想法^[9]。教师适当提供指导能够有效帮助幼儿解决问题,教师的控制行为会让幼儿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求、感受,更不足以让幼儿真正明确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由于缺乏问题解决技能的有效锻炼,幼儿经常在短时间内再现同样的问题情境。另外,教师对幼儿解决问题的控制,也会让幼儿误以为解决问题是教师或者成人的工作,会在无意间鼓励或默许幼儿面临问题时不经自身努力就依赖教师的行为。

3. 师幼关系、师幼互动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模式的影响

早期的师幼关系对幼儿如何解决人际问题和处理同伴关系等问题解决技能的习得至关重要,幼儿很可能将师幼互动经历运用到其他关系中。根据交互作用理论的观点,师幼关系会在产生行为交换的师幼互动过程中受到影响,师幼互动也受到教师如何看待自身与孩子关系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问题解决策略思考能力有限的幼

儿可能会因为问题行为导致师幼之间的有效沟通中断,教师也最可能感知到这些幼儿的冲突^[4]。在与存在冲突关系的幼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教师更倾向于给幼儿贴上相处困难的标签,减弱对这类幼儿的耐心和理解,并可能进一步减少与他们的交往机会。尤其是对那些容易与自己产生冲突感的幼儿,教师可能常采用强制的方法处理自己和幼儿以及幼儿彼此之间的关系^[10]。教师采取的这种问题解决方式为幼儿提供了一种不适当的人际问题解决模式。低质量的师幼互动直接导致了低质量的师幼关系。师幼关系的亲密感与幼儿的同伴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10]。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也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会能力,能够进一步促进孩子情绪智力和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发展^[11]。对幼儿来说,教师与幼儿之间的积极人际关系经历促使幼儿对人际关系进行正面归因,而这些归因很可能会帮助幼儿形成对人际关系模式的正确认知。当以正确的认知去指导问题解决的行动时,幼儿可能就会更倾向于使用亲社会策略解决同龄人之间的人际问题。因此,师幼关系的质量影响着幼儿社交能力的发展,师幼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幼儿解决人际问题的互动起着重要示范作用。

二、优化教师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教育策略

1. 教师应丰富问题解决的知识与经验,转变教育思维

幼儿的人际交往网络随着从家庭向幼儿园、再向社会逐渐过渡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未知的事物给幼儿、教师带来更多的挑战,教师需要提升专业素养,转变教育思维模式。一是树立正确的冲突观。多数时候由于缺乏对幼儿自主解决人际冲突问题的价值认识,教师对幼儿间解决冲突的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反应。当教师了解了幼儿人际问题产生的基本原理,放下对幼儿间冲突的偏见,对幼儿解决问题的行为投入更多正向支持时,幼儿的人际问题解决能力可能会快速增长。教师也会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强化问题意识、机会意识,以及培养幼儿自主解决问题习惯的自觉意识。二是倾听幼儿的声音,正确认识幼儿。教师习惯代替幼儿解决问题,缺乏对幼儿本身问题解决能力的认识。教师需要静心聆听幼儿的声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处于问题情境中的幼儿,相信他们有能力以孩子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

而不是有意激化问题。事实上,那些首先选择向教师求助的幼儿中,大部分能够在教师不在场时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12]。三是丰富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善用典型案例与老教师或专家教师交流。老教师或专家教师拥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能灵活自如地应对幼儿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从而激发幼儿解决问题的潜能。通过探讨与分析幼儿问题解决案例或教师指导案例,教师能够学习到如何帮助幼儿获得人际交往的知识,指导幼儿更好地掌握情绪调节、自我控制等问题解决技能。

2. 教师应增强行为指导能力,把解决问题的权利移交给幼儿

教师把解决问题的权利移交到幼儿手中,让幼儿把握问题解决的发展方向,是促进幼儿人际问题解决能力快速成长的最好指导。幼儿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已有的经验,而经验中的信息是有限的,教师允许幼儿直接参与和体验问题解决过程远比口头说教的效果好。因此,教师只有增强自身行为指导能力,才能保障对幼儿的强有力支持。教师行为指导能力包括观察力、判断问题解决发展趋势能力、高水平提问能力与实践反思能力等,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教师提升自身的观察能力,当好幼儿人际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观察者。当教师发现幼儿间尝试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对幼儿造成伤害时就应耐心等待,放手给予幼儿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探索问题解决办法。第二,教师应增强对问题解决发展趋势的判断力,时刻保持专业敏感性。教师需要判断问题解决的走向和幼儿可能采取的问题解决策略,时刻注意幼儿间争端的轻重和可能会升级的危险,从而等待恰当的介入时机,为幼儿提供关键性指导。第三,教师应有意识地训练向幼儿提出高水平问题的能力。指导幼儿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提问,教师巧妙的提问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思考,从而帮助幼儿学会从多角度探究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同时,可在原有问题情境的基础上深化问题或者创设出新问题情境,制造更多发展幼儿语言沟通、观点采择和移情等社交技能的机会。第四,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实践反思能力。通过反思,教师可深度分析对幼儿指导行为的思维过程,明确指导行为中的可取之处,以及如何应对类似的情况。随着实践反思能力的提高,教师协助幼儿解

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更多变、更有效。

3.教师应改善与特定幼儿的关系,增加对幼儿的行为期望和情感支持

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与师幼关系,对幼儿在不伤害他人情感或身体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管理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那些与幼儿存在冲突关系的教师,幼儿更容易接受与自身关系亲密的教师的引导。当师幼出现关系问题时,教师需要通过人际问题解决模式来改善师幼关系,向幼儿示范正确的人际问题解决方式。

首先,教师可以设定一个特定时间,改善与特定幼儿的互动,增进师幼关系。教师需要认真思考与幼儿之间的关系,识别出自己对幼儿的感受,尽可能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正确归因,解决问题,改善师幼关系。同时,教师还应该了解幼儿的情感和需求,思考如何感知与回应幼儿的需要。教师厘清这一问题后,才能形成正确的问题解决思路来改善师幼关系。教师处理师幼人际问题的一系列改变之举,可以深刻影响幼儿问题解决的行为,进一步完善对幼儿间人际问题解决的指导策略。高质量的师幼关系与持续互动,能够促进教师为丰富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做出更多的努力与尝试。

其次,增加对幼儿行为的期望,给予幼儿更为积极的情感支持,可以成为促进幼儿解决人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教师的期望对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有直接的预测作用^[13]。当教师给予幼儿较高的期望和更为积极的情感支持时,幼儿对自己的认知往往也会变得更为积极,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进而调整解决问题的行为以符合教师和幼儿自我的期待,逐渐缩小行为与自我认知的距离。教师的行为也会随着对幼儿的期望和情感的改变而调整,幼儿通过教师的行为状态能感受到自己处于被信任和safe的环境。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幼儿不仅能够充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且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会得到发展。幼儿开始学习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逐渐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从而逐渐能够在与教师、同伴交往中处理好彼此间的人际问题。

[参考文献]

- [1] SHURE M B, SPIVACK G. Interpersonal problem-solving in young childre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reven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2(3): 341-356.
- [2] DA ROS D A, KOVACH B A. Assisting toddlers & caregivers during conflict resolutions: interactions that promote socialisation[J]. Childhood education, 1998(1): 25-30.
- [3] SUTTON R E, WHEATLEY K F. Teachers' emotions and teach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3(4): 327-358.
- [4] OCAK S. The effects of child-teacher relationships on interperson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of children[J]. Infants & young children, 2010(4): 312-322.
- [5] ESEN - AYGUN 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rvice teachers'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 solving skills[J]. Eur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77): 105-128.
- [6] 王梅, 邹晓燕. 不同信息源对4~5岁儿童问题解决的影响[J]. 学前教育研究, 2013(11): 14-19.
- [7] GLOECKLER L R, CASSELL J M, MALKUS A J. An analysis of teacher practices with toddlers during social conflicts[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014(5): 749-765.
- [8] 孙文杰. 幼儿同伴冲突中教师介入行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以泰安市某幼儿园为例[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9(4): 108-113.
- [9] 费广洪, 赵嘉茹, 汪文娟. 成人提问的认知水平与模式对5岁儿童问题解决的影响[J]. 学前教育研究, 2012(11): 20-25.
- [10] 莫书亮, 商冲晨, 陶莉莉, 等. 幼儿心理理论发展与师生关系和同伴交往能力: 一项纵向研究[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2(2): 84-88.
- [11] 张文娟, 程玉洁, 邹泓, 等. 中学生的情绪智力、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对其师生关系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12(3): 624-630.
- [12] 刘晓晔. 教师隐性控制对儿童社交技能发展的影响[J]. 学前教育研究, 2010(8): 39-42.
- [13] 杨丽珠, 徐敏. 教师期望对幼儿自我认知积极偏向的影响: 师生关系中介效应[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5): 621-626.

(责任编辑 师 语)

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迷失与回归

钟宜君 冯季林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 游戏精神贯穿集体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是幼儿教育的价值追求。当前,教师对游戏的理解抽离了游戏的精神内核,偏重于游戏的娱乐功能。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功利化取向剥夺了儿童的独立性,唯知识论取向侵占了儿童的愉悦性,浅层互动化掠夺了儿童的体验性,程序化取向禁锢了儿童的创造性,导致游戏精神偏离的现象。为使游戏精神复归,幼儿集体教学活动需要解放儿童,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返回本真,满足儿童的愉悦性;尊重儿童,培养儿童的体验性;理解儿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

[关键词] 幼儿; 幼儿教育; 游戏; 游戏精神; 儿童

[中图分类号] G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40-05

喜爱游戏是儿童的天性。《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游戏是儿童的生活方式,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即提倡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方式。游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指外显的游戏活动形式,还蕴含内在的游戏精神,两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游戏。目前,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异化现象严重,游戏成为一些教师向幼儿传授知识技能的工具性手段,成为一些功利性教学目标的附庸。在许多由教师导演的游戏教学活动中,幼儿对游戏的迫切需求逐渐消失,幼儿逐渐成为教师主导下的游戏附庸,规训意味下的幼儿集体教学活动更是徒有游戏形式。这些现象是游戏精神迷失与消亡的表现。游戏精神是游戏的本质,正是游戏精神散发的迷人魅力使游戏成了“生活的一个最根本的范畴”^{[1]23}。对游戏者而言,真正的游戏意味着蕴含抽象性的游戏精神,也包括具体的游戏活动方式。游戏的本真必须含游戏精神的本质。由此,复兴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游戏精神”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1. 何为游戏

对于“游戏”定义的诠释,学术界众说纷纭,它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词源学、哲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人士进行探讨。从词源学来看,“游戏”的基本含义是嬉戏与娱乐,表示一种逍遥自得的意思。而英文的“play”“game”和德语的“spiel”亦指娱乐的意思。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从哲学的角度将游戏与初级的艺术形式做比较,认为游戏是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娱乐活动^{[2]149}。加达默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游戏是艺术作品的存在,认为游戏应与存在结合起来。席勒从美学的角度认为,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桥梁,只有处于游戏状态之中,人才能实现内涵与形式的统一。因此,“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3]90}。赫伊津哈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了“人人都是游戏者”的观点,认为游戏提供了某种超出了生活直接需要并将意义赋予行为的东西,游戏的特征在于趣味性、自主性、秩序性及自称目

[收稿日期] 2019-12-29

[作者简介] 钟宜君,女,广西玉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冯季林,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

的性^[4]。本文将游戏理解为包括实体性的游戏活动和抽象性的游戏概念,即游戏精神,游戏的本质是游戏活动与游戏精神的高度融合。

2.何为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一种状态和趋势,是一种态度和境界,是一种激情和力量。”^[5]真正的游戏不是宣传,它的目的就在它自身之中,它那平易的精神是幸福的妙谛^{[6]235}。游戏精神是游戏的内核,游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希望摆脱外部压抑与强制,持守生命本有的生机与活力,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7]。胡伊青加曾在《人——游戏者》一书中提出游戏性为“趣味性、自愿性、自称目的性及开放性”^{[1]23}。从幼儿与教育的角度来审视游戏,本文所说的游戏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性

完整意义上的游戏包括了它的自由性。“游戏是自愿的行为,被迫游戏不再是游戏,它至多不过是一个强制模拟而已。”^{[6]8}这种自由的品质肯定了儿童的主体性。对儿童而言,满足当下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儿童可以自由地以此时此刻的需求来组织及开展游戏活动,不断通过自我活动来认识自我及发展自我,自我活动的过程就是游戏的表现。儿童是游戏活动的主体,相对于秩序化的集体教学活动来说,游戏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由此,教师要尊重儿童的想法,耐心倾听儿童的意见,尊重儿童自由的游戏权,避免过多地人为控制与干预儿童的游戏活动。

(2)愉悦性

愉悦是游戏的原有品质,游戏愉悦性的实现在于满足儿童生理与心理对游戏的需求,在于使儿童身心得到放松、自由发展智力、自由发展与释放情感。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可以满足内心的许多梦想,游戏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的愉悦与满足。但是,有些教师为了有效完成教学目标,常常人为地干预和控制儿童游戏,剥夺了儿童自由实现梦想的机会。这种做法不能给儿童带来愉悦感。当游戏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伪游戏时,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本质。

(3)体验性

“体验者,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之谓也。”^{[8]70}体验不仅是指参与过程,还指从参与中获得感受。由此,体验具有存在性。游戏虽是一种虚拟活动、

一种假想的情境,却有一种“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可见,游戏者的体验是真切的,通过活动来激发、唤起和沟通。幼儿自由地选择游戏、尽情地沉浸于游戏之中,没有任何目的,不知疲倦地享受游戏带来的感受,这一过程则是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体验的意义在于它是幼儿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幼儿通过游戏获得知识是一种顺应生命发展规律的事情。有的教师为了有效或快速完成教学目标,经常会人为改变或控制游戏的走向,使幼儿正沉浸于游戏中的体验突然终止,必然给幼儿带来一定的失落感。以游戏为工具的伪游戏不仅无法给幼儿带来愉悦的体验,还削弱了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热情,幼儿变成了教师导演游戏下的附庸,而不是富含灵性的生命。

(4)创造性

“游戏是创造性的源泉。”^{[9]23}创造是儿童游戏的最大收获,它可以促进幼儿心智的高度活跃、情感的高度自我肯定、动手能力的高度形成和团结氛围的高度融洽。创造力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也是游戏的核心与本质体现^[10]。儿童期是幼儿创造性思维萌发的时期,游戏能够激发和培养幼儿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自主的游戏活动、宽松的游戏环境可以满足幼儿自由创造、积极创造、享受创造的需求。教师预设和干预的次数越频繁,幼儿的心理就越烦躁,也就影响其参与游戏的热情。因为游戏具有自成目的性,没有任何功利性,无所谓成败,可见,游戏目的不在于要求得到怎样的效果。对幼儿而言,能在游戏中无拘无束地发挥想象力才是最终的目的。

二、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迷失

1.功利化的教学目标剥夺了幼儿的自由性

现实的幼儿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技能,注重传统知识的传授。幼儿教育目标更多的是追求教学效率,很多教师进行游戏教学主要是调节课堂气氛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集体教学活动虽看似形式多样,但缺乏实质,教师过于注重游戏的工具性。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对一些游戏情境的创设、游戏材料的选择、游戏活动的指导、游戏活动进程的控制暴露了“揠苗助长、循规

蹈矩”的痕迹。为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一些教师严格控制幼儿的游戏过程,力图将游戏过程导向自己预设的理想教学进程中,希望幼儿能在游戏教学中以最短的时间有效获得更多的知识技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由此,许多教师在幼儿园教育中过多干预和控制“游戏”,幼儿在“游戏”活动中难以自主,并不愉快。例如:在一次关于小蝌蚪如何变成青蛙的活动中,活动刚开始时,幼儿对小蝌蚪如何变成青蛙的过程充满期待,然而,教师多次对幼儿的惊叹、兴奋及活动形式加以干涉。为了让幼儿更快地“体验”小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在教师多次指导和干涉下,幼儿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师安排的游戏表演活动。在游戏教学的控制下,幼儿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幼儿成了教师的附属品,游戏成了教师宣示自己主权的形式,剥夺了儿童在游戏中的独立性,这样的教学活动异化了游戏的本质。

2. 唯知识论的教学内容侵占了儿童的愉悦性

唯知识论的教学内容偏向系统的学科逻辑知识的学习,无视幼儿独特的经验与爱好,忽视对幼儿人文素养的培养,抽象化、唯科学化的知识脱离幼儿的认知范畴,不利于幼儿内在意义的建构或生成。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预先指定教学设计,忽视幼儿接受水平及能力,让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被动地接受和消化知识,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例如:在一个“我们一起来认识花”的主题游戏活动中,教师拿着向日葵的图片问孩子们为什么它叫向日葵。一个孩子回答:“因为长得像向日葵。”另一个孩子说:“因为它的颜色和太阳一样。”教师听后直接加以否定,之后,讲解向日葵的自然知识:向日葵的花序是围着太阳转的,它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显而易见,教师设计游戏的目的就是传授知识,唯知识性的教学内容虽披着游戏外在的糖衣,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功利性,侵占了儿童游戏体验的愉悦性。

3. 集体教学活动的浅层互动掠夺了儿童的经验性

游戏体验是幼儿游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心理成分,也是游戏的魅力所在^[11]。幼儿往往通过手舞足蹈、挤眉弄眼、大喊大叫等兴奋夸张的表情与动作表现出在游戏中获得的愉悦体验,可以看到

最纯真的师幼关系、最真实的幼儿个性、幼儿最本真的自我。然而,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出于功利性的教学目的,教师往往频繁地干预幼儿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等行为,要求幼儿“认真”“正经”地游戏。例如安静地活动、有秩序地表演、有礼貌地交流、按顺序跳舞等。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过多的无效介入与负效干扰,实则是变相掠夺幼儿游戏体验的权利与机会,也就剥夺了幼儿游戏的愉悦感与积极性。

4. 程序化的教学过程禁锢了儿童的创造性

游戏结构充满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游戏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可能,会给游戏者带来无限创造的机会。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师幼双方可以将出现的有创见的问题及情境作为契机,互相交流,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即时生成课堂动态创生资源。然而,在现实的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大部分教师对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预设过多,儿童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例如:在一节美工课上,教师布置幼儿用橡皮泥完成作品,一个小朋友提前完成了任务,突发奇想,把红色、黄色、蓝色的橡皮泥放在一起搓成了另一种颜色的橡皮泥。小朋友特别有成就感,兴奋地探索着其中的奥秘,却遭到教师批评。教师一般都注重教学过程的预设性和规范性,也没有对孩子们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发生的“意外”做好充足的准备,往往以控制与干预的方式来解决发生的“意外”。教师未能及时有效捕捉课堂动态资源,容易禁锢幼儿随时迸发的创造性思维。

三、游戏精神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回归

1. 解放儿童,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

幼儿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游戏人”,使每个幼儿都喜欢游戏,都会游戏,都能在游戏中成为“真正的游戏者”。游戏的动机源于幼儿的内在推动力。游戏自主是其内在目的,也是幼儿教育本身的需求。游戏自主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要解放儿童,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让儿童依据自身需求去尝试挑战他们想做的任何有益的活动。其次,教师应为儿童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游戏氛围,把游戏活动时间和空间还给幼儿,让他们能在幼儿园教育中尽情地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此外,教师要相信儿童,儿童

自身具有珍贵的精神资源^[12]。教师要相信儿童是玩游戏的真正高手,相信儿童有能力在游戏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教师要尊重儿童游戏的自由权,尊重和理解儿童在游戏中独自创造的“成果”。笔者曾观摩过一节课。教师准备了蔬菜、水果及厨具,以为幼儿会穿上围裙,进行厨艺大赛,结果,幼儿利用教师准备的材料“演奏”了一场音乐会。他们自主扮演了不同的蔬菜、水果和厨具,教师因势利导,有效提问,领会了孩子们的意图后,即兴伴奏。随着音乐响起,不同的“蔬菜”“水果”“厨具”依次出场,表演了许多歌曲,孩子们玩得非常尽兴。在这节课上,幼儿从“音乐会”中认识了很多蔬菜、水果及厨具,同时也学会了哼唱一些儿童歌谣。由此可见,幼儿在游戏中应该是自得其乐的,教师应充分给予孩子自由,运用教育智慧,帮助幼儿达成心愿,让孩子在游戏中成为“真正的游戏者”,从而更好地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2. 返回本真,满足儿童的愉悦性

游戏是儿童的存在方式,愉悦是游戏的本质。幼儿在游戏过程中能够充分享受自由与快乐,并深深被这种愉悦体验所吸引,至于游戏结果,幼儿并不过于在意与关注^[13]。教学的本真在于让幼儿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丰富和多元的愉悦体验。为此,教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应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满足幼儿对游戏的需求。皮亚杰认为,儿童需要游戏,因为幼儿难以适应周围的现实世界。幼儿借助游戏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满足自我对情感的需要^[14]。比如,在角色游戏中,老师看见一名“护士”正往“病人”的背上打针,马上叫停,并且加以纠正:“打针一般是往病人的屁股上打的呀!”笔者认为,角色游戏的目的在于让孩子们学会如何给病人打针,而是在于让孩子们通过扮演“医生”“病人”角色的游戏,学会依据游戏角色与人沟通交流、合作交往和帮助他人,进而在游戏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愉悦体验。第二,教师应设置趣味性的游戏活动。教师可从幼儿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把握教学内容,创设教学情境,选择教学方法,激发儿童的兴趣。有趣的活动、有节奏的旋律、新奇故事情节、搞笑的歌词等都会激发幼儿极大的兴趣,并使其产生愉悦的体验。笔者曾观摩“我的厨艺我来现”的游戏活动。一个女孩套着围裙,用玩具厨具艰难地切着

橡皮泥,边切边兴奋地喊着“糖醋排骨、糖醋排骨”,时不时变换炒菜姿势,乐在其中,完全沉浸在“展示厨艺”的愉悦之中。可见,游戏具有自成目的性,游戏的目的在于愉悦儿童,给予儿童以儿童的生活,满足儿童的需求。

3. 尊重儿童,培养儿童的体验性

体验是个体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幼儿那里,“听到的不如看到的,看到的不如做到的,体验到的才是最深刻、最鲜活的”^{[15]44}。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得尊重幼儿的生活体验,尊重幼儿的个性与特点,有帮助每个幼儿从体验中获得成长的美好愿望。其次,营造真实可感的生活情境,深入了解孩子的特点,倾听孩子的想法,以便帮助孩子更好地体验生活。再次,创造丰富有趣的游戏情境,为孩子参加游戏提供更多的选择。最后,尊重孩子在游戏中创生新的游戏,仔细观察,合理引导。比如:教师给幼儿设计了“聚餐”的游戏,其间,突然发生变化,孩子们拿着水枪、电话、桶,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现场混乱。教师并没有立即干预,在一旁仔细观察。当孩子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停止后,教师才进一步询问缘由,孩子们七嘴八舌回答:“刚才我们打算一起做饭聚餐,不小心引起了火灾。我们赶紧联系消防员,和消防员叔叔一起接水灭火的。”教师表扬了孩子们的机智勇敢,赞扬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同时,教育幼儿火灾发生时必须第一时间逃离现场,然后设法和消防员取得联系,不能盲目救火。对幼儿而言,在玩“聚餐”游戏时生发出来的救火游戏是合情合理的。执教者有效观察,耐心倾听,并且能及时赞扬孩子们的行为,难能可贵的是,教师及时纠错,教会了幼儿应对火灾的正确处理方法,充分表现出她的教学智慧。正是在游戏体验后,孩子们明白了玩火是很危险的,同时学会了应对火灾的正确方法。

4. 理解儿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

“幼儿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者。”^{[15]45}幼儿是充满好奇心的“发明家”,对事物充满了疑问,对世界充满好奇。“你给他一个世界,他立刻可以创造出无数个世界还给你。”^[16]儿童期是幼儿创造性思维萌发时期。游戏是创造性的源泉,为了有效激发儿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设置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游戏活动。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还不够高的幼儿怎

么拿到桌子上的玩具;游戏中没有做饭的厨具怎么办;想什么办法在游戏中捉到别人自己避免被捉到,等等。游戏本身就是要求游戏者积极思考,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如:由于衣服太小,小女孩无法包住娃娃,经过思考,小女孩尝试了一种包娃娃的最佳办法,即用衣服的对角线作为长度来包娃娃。可见,游戏的魅力在于其对幼儿提供的挑战性,幼儿通过游戏过程,不仅能学会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能培养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其二,游戏活动自始至终需要保持神秘感。好奇心是幼儿的特性,神秘感对幼儿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教师应设置层层递进的游戏,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比如在“挑战你我他”的活动中,教师通过模拟不同动物的声音让幼儿辨别,并设置竞赛环节,要求幼儿又快又准地做出该动物的动作。在幼儿辨别并模拟出前一个动物的动作后,教师模拟下一个神秘动物的声音,激发孩子的创造性思维,让其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其三,有效把握预设与生成。预设为幼儿游戏提供了条件,生成为幼儿游戏提供了生命。预设与生成相辅相成,目的在于满足幼儿游戏的需求,为幼儿游戏提供条件,使幼儿既不受束缚又不感觉无从下手,这样才能实现幼儿游戏的真正“自由”。例如:大班韵律活动“小豆豆的舞蹈”中需要幼儿舞蹈表演,教师发现幼儿难以自行设计舞蹈动作,就给孩子们提供了几个动作示范,孩子们受到启发,很快编出富有童趣的舞蹈动作。可见,教师灵活地调整预设与生成,有效支持与适当放手可以激发幼儿的创造性。

游戏精神源于游戏又高于游戏。幼儿教育的宗旨是要求幼儿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始终体现并渗透游戏精神,游戏精神成为贯穿整个幼儿园教育的灵魂。只有这样,幼儿园教育才能满足幼儿冲动情绪的释放与情感欲望的表达,才能保证幼儿有足够的空间自由幻想与创造,满足幼儿享受自身感知世界的方式。幼儿集体教学活动要回归

游戏的本质,回归幼儿的天性,让他们能在和谐的游戏活动中健康快乐成长。

[参考文献]

- [1]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 [2]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4] 高洁.论学校教育的游戏精神[J].教育探索,2010(7):11-12.
- [5] 丁海东.论儿童的游戏精神[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8-81.
- [6]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 [7] 樊人利.游戏精神引领下幼儿行为习惯的养成[J].学前教育研究,2014(9):67-69.
- [8] 王一川.审美体验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 [9] 刘晓东.解放儿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 [10] 常莉俊,冯建国,申荷永.论儿童游戏精神的衰退与重拾[J].教育导刊,2013(7):18-20.
- [11] 黄进.体验为本的游戏——再论“游戏是一种学习”[J].学前教育研究,2003(6):8-11.
- [12] 刘晓东.我们为什么要解放儿童[N].中国教育报,2011-01-11(2).
- [13] 王小英.“无为而为”的游戏活动与幼儿创造力的发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49-154.
- [14] 潘月娟.西方角色游戏指导的理论与实践[J].教育导刊(下半月),2003(11):55-57.
- [15] 单晓晓.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游戏精神缺失的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 [16] 刘慧.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游戏精神的探寻与重塑[J].学前教育研究,2010(6):64-66.

(责任编辑 师 语)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视域下幼儿园挫折教育策略研究*

姜 晓 胥 兴 春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当前幼教界对挫折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方式方法处于简单的经验总结阶段,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基于博尔诺夫非连续性教育思想的相关概念,提出以“遭遇”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以“危机”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契机;以“告诫”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方式;以“唤醒”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支撑,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有效实施挫折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非连续性教育; 挫折教育; 抗挫力; 博尔诺夫

[中图分类号] G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45-04

国内外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造成当今青少年自杀率“低幼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幼儿教育中挫折教育的缺失^[1]。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将“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作为健康领域的重要目标。2016年修订实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明确提出“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等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但具体落实时,对幼儿教师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德国教育学家 O.F.博尔诺夫提出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为教育者提供了探讨挫折教育的新视角,对我国实施幼儿挫折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挫折教育意涵探析

“幼儿挫折教育”另有“逆境教育”“抗挫折教育”“磨难教育”等说法。幼儿挫折教育应重点培养幼儿的抗挫耐受力 and 挫折排解力^[2]。抗挫耐受力是指幼儿面对困难时的心理承受机制,勇于面对困难,能积极思考并探索解决困难的方式方法;挫折排解力即关注幼儿经历挫折后的心理调适机制。幼儿不会长时间沉浸在悲伤、难过的情绪中,

能够在成人帮助下或自主缓解情绪,增强抗挫能力,当他们再次面临挫折时能够具备良好的心态。笔者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幼儿挫折教育”应包括3点要素,即科学性、情境性、目的性。科学性主要强调挫折教育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幼儿发展规律;情境性主要强调挫折教育的教育途径和教育依托应与真实情境相联系;目的性强调挫折教育的实施结果,既包括形成应对困难的心理防御机制,又包括在困难和挫折出现后应对挫折和解决问题的抵抗力。基于上述要素,幼儿的挫折教育即指根据幼儿身心发展和教育的需要,创设或利用某种情境或难题,鼓励幼儿勇敢面对挫折,解决问题,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培养良好的自我心理调控能力及克服困难的能力。

不同学者对挫折教育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看法不同。多数研究者对幼儿的挫折教育持积极的态度,认为实施挫折教育是在幼儿自身发展和幼儿园教育功能双重要求下的选择^[3]。他们认为挫折教育对幼儿具有重要意义,如激发潜能,释放创新能力。有的研究者认为实施挫折教育能帮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依托儿童之家的婴幼儿社区托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9YBJJ103)。

[收稿日期] 2020-01-08

[作者简介] 姜 晓,女,山东青岛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胥兴春,男,四川广安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助幼儿认识自己,客观面对困难;增强信心,健康成长等^[4]。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侧重分析挫折教育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考虑到幼儿心理发育稚嫩,挫折教育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会使幼儿失去自信心等^[5]。

挫折教育对幼儿的发展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意义,学者已经意识到挫折教育中形成的过量的消极情绪对幼儿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培养将产生负面影响。如何衡量这个度,何种挫折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何种挫折可能超出幼儿心理承受范围,研究者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分析和解答。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探析

德国教育学家 O.F.博尔诺夫是教育人类学的杰出代表,他首次提出非连续性教育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教育存在连续性教育和非连续性教育两种形式。连续性教育即狭义的教育概念,认为教育是一种连续性的活动,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不断趋向完善的塑造过程。但是,仅仅把教育看作一种连续性的教育活动是不够全面的。在教育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无法避免的、阻碍教育进程的事件,这些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教育的干扰因素,应尽量避免,甚至认为这些事件的出现是教育的失败,是教育者的失职。这种观点在博尔诺夫看来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些事件是必然发生且无法避免的,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些“中断”事件以危机、遭遇、唤醒、告诫 4 种形式构成非连续性教育的重要素材,只有积极应对这些事件,才能使人向更高阶段迈进。

教育者越来越重视可能中断教学进程的对幼儿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的事件。挫折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落实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挫折作为可能会中断教学进程、会对幼儿生活产生影响的非连续性呈现形式,其实施的理论基础可以在非连续性教育的内涵中找到依托。

三、非连续性教育视域下幼儿挫折教育实施策略

1.“遭遇”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

博尔诺夫认为,突然闯入人的生活,中断人们的正常活动,能够冲击心灵的重大特定经验可以称作遭遇,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痛苦的体验,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件艺术品、一个重要他人^{[6]58}。“遭遇”具有不可预知性,它的出现也无法人为决定。基于博尔洛夫“遭遇”的意涵分析,幼儿教师在面对

对“遭遇”时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1)勇于接纳,面对幼儿可能会经历的“遭遇”。首先,幼儿教师要接纳“遭遇”的存在。“遭遇”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可能会以极具冲击的形式出现,教师应做好心理准备,运用教育智慧,引导幼儿度过遭遇期。比如,幼儿在遭遇父母离婚、亲人亡故、幼儿身体受伤等事件时,都会陷入恐慌,或压抑,或宣泄。教师在面对幼儿的“遭遇”时,应勇于担负责任,尽最大可能陪伴幼儿度过“遭遇”。

(2)厘清强度,关注幼儿个体差异。教师应充分意识到对成年人可能造成“遭遇”的经验强度与幼儿能够经受的强度是不同的,可能在成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首次经历的幼儿来说,却是一次心理成长的重要转折点。教育者应站在“儿童本位”的视角,理解并感受幼儿的情绪与承受能力。同样,差异不仅存在于成人与幼儿之间,相同年龄段的不同幼儿的心理发展也存在差异。相同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幼儿产生“遭遇”现象,全体幼儿也不会同一时间“遭遇”同一个对象。因此,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年龄阶段和个体差异,以敏锐的教育感知力及时发现幼儿的危机和遭遇,持续跟踪,关注和判断不同幼儿可能正在面临的“遭遇”,不可激发,也不消极回避,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幼儿实施行之有效的挫折教育。

(3)提前准备,帮助幼儿应对“遭遇”。幼儿的遭遇是不可预料的,出现的时间和强度也无法人为控制。教师应该做好应对“遭遇”到来的准备,包括经验的准备以及物质材料的准备。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经验以及与家长的互动交流,对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性格的幼儿可能会“遭遇”的挫折提前加以思考,做好应对的准备,如:随着中班竞争类体育活动增多,幼儿可能面临失败或受伤等问题;单亲家庭的幼儿在幼儿园参与母亲节、父亲节活动时可能会遭遇情感挫折等。根据幼儿遭遇的情况,教师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可以提前借助相应的绘本、影视作品、艺术品,进行集体教学活动,或借助区角活动相关材料,通过组织小组活动,或采取结对活动,发挥榜样力量,为幼儿提供有效的经验准备,提前做好幼儿的心理建设和认知建构。这样,当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时,幼儿会降低“陷入”的危险。幼儿在认识、探索、感性体验和强化的过程中受到榜样的引导,会不断实现认知中“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发展。

当然,由于幼儿教育具有广泛性和生活化等

特点,不是所有的教学问题都可以提前准备和预设的。当面临个别性的突发的“遭遇”时,教师要给予幼儿接受现实和发泄情绪的时间,使用适合幼儿个体的方式方法加以引导疏通,及时与家长沟通,形成教育合力。这既需要教师了解和熟悉不同幼儿的个性,也依赖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育机智的运用。

2.“危机”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契机

“危机”与“遭遇”具有相似性,表现在突发性、中断性和冲击性。博尔诺夫认为“向某个新的生命阶段的过渡、获得独立和成熟都只有通过危机才能实现”^{[6]63}。在幼儿的生活中,危机普遍存在,比如成长危机(生病、换牙)、信任危机(谎言)、交往危机(同伴选择和同伴冲突)、学习危机(升班和幼小衔接),等等。面对幼儿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危机,幼儿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1)理论认知,正视危机。教师普遍认为危机是令孩子感到害怕和矛盾的,因此,他们往往会在日常工作中选择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通过包办代替的方式帮助幼儿规避或处理危机,通过安慰幼儿或者责怪他人的形式缓解危机给幼儿带来的冲击和恐慌。幼儿随时可能处于危机中。教师可以通过对话讨论、绘本教育等方法,带领幼儿正视可能会出现危机。例如,当幼儿面临长牙等生理成熟危机和“去自我中心化”独立性发展等心理成熟危机时,若教师没有及时加以积极引导,幼儿就容易产生害怕、恐慌等情绪,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心理问题。教师可提前干预每个幼儿都会遇到长牙、换牙时产生的恐慌。在幼儿将要长牙时就开始对其进行健康领域的教育,让他们了解长牙是长大的表现,每个小朋友都会经历,属于正常现象,帮助幼儿提高认知能力。

(2)情感体验,理解危机。在幼儿了解到危机具有可克服性后,教师应以情绪体验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危机不一定全部是负面的和令人害怕的,有可能是充满挑战的,帮助幼儿勇敢面对“危机”。教师应在危机发生过程中掌握幼儿的具体情况,及时引导,使幼儿能够明白危机发生时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度过危机,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当面对感冒、发烧、肚子疼等生病危机时,幼儿可能会慌乱,情绪失控,教师可以在班级幼儿有生病或者流感等现象频发过后,开设集体教学活动,以角色扮演、绘本阅读等形式让幼儿了解细菌

会导致我们生病。向幼儿介绍多种办法避免或减少细菌入侵,赶走病菌,强壮身体,如:多吃水果蔬菜,勤洗手,多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等。整合各领域课程,让幼儿得到全方位的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知识。这样,幼儿不仅在科学、健康、语言多方面获得发展,更重要的是,幼儿能够积极勇敢地面对生病危机,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积极增强体质。理解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危机,也可以解决危机。在幼儿即将升班或升小学前,教师也可以带领孩子提前感受哥哥姐姐们的生活,通过“手拉手”活动、组织混龄教学活动、参观小学校园等方式,为幼儿面临即将到来的适应危机奠定心理基础。

(3)行为指导,转危为“机”。教师应把危机理解为开创新起点的机会。这就需要教师具备冷静的教育态度、丰富的教育教学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随机应变的教育教学机智,把每一次危机的发生当作教育契机,并不断强化指导幼儿的行为能力以解决危机,不断提高幼儿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幼儿一起探寻克服危机的方式方法,引导幼儿尝试独自安静思考,舒缓面临危机时的情绪,必要时寻求老师帮助,或者和同伴交流,而非单一采取哭泣的宣泄方式。

3.“告诫”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方式

博尔诺夫认为“人的发展经常会由于障碍和偏离,或者普遍地由于人的弱点而中断或误入歧途,这时就要借助外部的推动,使中断的发展重新走上正轨”^{[6]65}。幼儿的自我觉醒和纠偏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必须借助一些外力的推动,帮助其意识到当前所处状态的合理性。因此,博尔诺夫提出“告诫”这一教育措施,即对幼儿采取强化和惩罚的特殊表达方式。

(1)善用强化,慎用批评。通常情况下,教师对幼儿正确的行为予以奖励与鼓励的正强化,当幼儿做出正确行为时,应撤除先前给予他的厌恶刺激的负强化,幼儿在持续做错事情后给予其言语的批评,或采取冷却法惩罚方式,这些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对幼儿进行告诫,增强幼儿区分是非对错的判断力,提高幼儿的辨别力,也是通过他律的方式激发幼儿的自律意识。积极的告诫能够给予幼儿不断发展的内驱力和推动力,惩罚、批评类的告诫,则属于挫折教育的一种。两种形式的教育各有利弊,必须结合使用。法国心理学家高顿通过一项专题研究证实,那些难以接受批评的孩

子长大后,大多会对批评持“避而远之”或干脆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因此,对幼儿实施必要的批评和使用鼓励是同样重要的。在使用时,教师需要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注重告诫的强度。在幼儿面对危机时,若幼儿性格内向,教师教导时,可以采取温柔的鼓励、借助绘本加以启发等隐性方式;若幼儿活泼开朗,教师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发策略,在幼儿面对问题停滞不前时提供助推力。当然,也存在幼儿为博取关注夸大危机的情况,教师应了解幼儿行为蕴藏的原因,可以采取冷却的方式给予幼儿宣泄和释放的时间,观察幼儿的变化。无论采取何种告诫方式,切不可当着全体幼儿的面,使用给幼儿品格定性的方式,使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

(2)家园配合,巩固监督。家长需要积极配合教师的教育活动,以巩固幼儿良好的行为,纠正幼儿错误的行为。幼儿在发展过程中心智不成熟,会产生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需要我们教导和帮助,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但幼儿有时也需要经历试误的过程。教育者不应在幼儿还未做任何体验和探索时就给予幼儿说教式的教育,而是应该在幼儿面临无法前进的困难、始终没有进展时给予告诫和帮助,帮助其增强改变现状的信心,逐步掌握相关技能,并在日常生活中向幼儿描述积极的生活、学习和交往的方式。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建立日常规则体系,通过采取引导幼儿同伴监督、适当激励等强化手段以及大人自身的榜样示范等方式起到告诫和提醒的作用。

4.“唤醒”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支撑

博尔诺夫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一种所谓“本源性”的道德意识,教育的任务就应该是“帮助儿童回到本源形态中去”,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唤醒”强调的是教师对幼儿能动性的关照。“唤醒”的使用是伴随着“危机”“遭遇”“告诫”的,也应伴随教育的始终。正如存在主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并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而是人的灵魂的教育”^{[7]24}。根据博尔诺夫的“唤醒”观点,教师在进行挫折教育时,应关注幼儿的心灵层面,激发其面对挫折、克服挫折的主动性。

(1)以爱施教,良性互动。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中,情绪情感与社会性目标的达成比知识和技能目标的达成更重要,情感层面目标的达成首先

需要教师传达情感。教师应主动营造充满爱的教育氛围,形成良好的师幼互动关系,这样,当幼儿面对挫折或挑战时,教师充满爱的鼓励和引导会使幼儿获得安慰后增添勇气;当幼儿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或做出不当行为时,教师耐心的“唤醒”也会让幼儿感受到爱,促进教育力量的最大化发挥。

(2)平等唤醒,打破权威。教师在实施唤醒时应给予幼儿适当的引导和提示,而非包办代替幼儿解决问题或粗暴施以指令。在幼儿面临遭遇和危机时,教师应唤醒幼儿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以充满爱与信任的师幼关系,鼓励幼儿勇于面对挫折和挑战。我们应关注幼儿生理健康,也要关注其精神层面的需要,幼儿教师可采取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最佳唤醒方式。

当前较多幼儿教师和家长仍然致力于帮助幼儿打造完全脱离幼儿真实生活情境的“纯理想化”的环境,剥夺了幼儿面对挫折和克服挫折的机会,对幼儿未来的社会适应性、心理承受力、塑造坚毅勇敢的品质以及提高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挫折教育是一种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应是教育对生存困境中人的关照”^{[8]26}。教师应以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及科学的理论知识做支撑,将把挫折教育重点放在幼儿的心理上,为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坚强意志品质的形成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李晶. 幼儿挫折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3(12):226-227.
- [2]杨莉君. 学前儿童的挫折教育刍议[J]. 学前教育研究, 1997(2):4-6.
- [3]张帅. 幼儿园挫折教育实施的困境与突破[J]. 教育参考, 2016(4):45-49.
- [4]王永红. 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价值及对策[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32):17-18.
- [5]赵坤明. “挫折教育”与“挫折承受力教育”诘难[J]. 中国教育学刊, 1999(4):48-49.
- [6]O.F.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M]. 李其龙,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7]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8]陈选华. 挫折教育引论[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师 语)

客观与主观情绪标签的差异:来自 ERP 的证据*

邓 欢 李 振 兴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 要]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选择 34 名大学生被试,比较了客观情绪标签、主观情绪标签以及观看的时间进程差异。结果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下,LPP 波幅在 500—550ms 和 550—600ms 两个时间窗口内均大于观看;主观情绪标签下 LPP 波幅与观看没有显著差异;在 P3 波幅上,客观情绪标签大于主观情绪标签。这提示,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可能在情绪评价上存在差异,进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情绪调节效果。

[关键词]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事件相关电位

[中图分类号] B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49-06

情绪标签(affect labeling)是指个体将刺激的情绪特征或自己的情绪感受转换为语言的过程^[1]。研究已证实,情绪标签可以有效调节个体的情绪^[2];个体将情绪转换为语言后,与情绪体验相关的杏仁核活性减弱^[3-4],外周神经活动也降低^[5-7]。根据情绪来源的不同,情绪标签可分为指向刺激情绪的客观情绪标签和指向内在情绪的主观情绪标签^[8]。已有研究发现,与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相关的脑区有所不同^[9]:标签刺激情绪时更多地激活腹外侧前额叶,反映了知觉加工过程;而标签自己的情绪时,脑岛和前侧扣带回的激活指示对内在情绪体验的觉察过程。由此,对不同来源的情绪进行标签时所激活的脑区不同,相关的评价过程也不同,会不会进一步引起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这是本研究想重点探讨的问题。

Kircanski, Lieberman & Craske(2012)的研究虽然同时设置了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探讨标签不同来源的情绪是否存在差异^[10]。McRa, Taitano & Lane(2010)比较

了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后个体皮肤电随时间的变化,结果发现,标签完刺激的情绪后,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有所减弱,表现为皮肤电的降低,而将自己的情绪转换为语言后并没有呈现出这种效果,皮肤电反而有升高的情况,由此否定了主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作用^[11]。但 McRa 等的研究只是将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进行了比较,并没有设置观看等控制条件。有可能与控制条件相比,客观与主观情绪标签都显示出情绪调节的效果,只是主观情绪标签下情绪的减弱不如客观情绪标签显著,且皮肤电的变化并不能直接揭示情绪标签内在的加工过程。因此,本研究在比较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效果时,将增加观看作为控制条件,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深入分析两者的内在机制及其差异。

已有研究采用 ERP 技术探讨情绪标签的时间进程后发现,与观看条件相比,情绪标签下顶叶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先上升后下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特殊儿童家长的羞耻情绪及干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AHSKQ2019D03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留守儿童的羞耻情绪及干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SK2019A0389),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内疚与羞愧的产生机制:自我建构的视角”(项目编号: RUCPSY0018)。

[收稿日期] 2019-12-29

[作者简介] 邓 欢,女,江西抚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
李振兴,男,安徽亳州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

降,提示情绪标签对情绪的调节可能显示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12];且与性别标签相比,情绪标签会诱发更强的P3波幅,这可能体现了情绪标签独特的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Symbolic Processing of Affect, SPA)^[13]。这些研究中个体是将刺激的情绪转换为语言,属于客观情绪标签。如果进行标签自己所体验到的情绪感受这一主观情绪标签任务,会不会表现出与客观情绪标签不一样的时间进程?且标签任务的不同会不会体现在可能代表SPA过程的P3波幅上的差异?据此,本研究主要关注标签不同来源的情绪时个体的顶叶LPP和额叶P3的波幅变化,并假设:其一,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下LPP波幅均先大于观看,后与观看无显著差异;其二,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在P3波幅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一、研究方法

1. 被试

本实验共招募40名右利手大学生参与,(校正)视力正常,精神状态正常。有6名大学生因脑电数据质量不达标而被剔除,有效被试为34名(其中,男生16名;年龄范围为19—23岁;平均年龄为20.6岁)。本研究获伦理委员会同意,被试签署知情同意后自愿参加,实验后均获得相应的报酬。

2. 实验材料

为有效诱发个体的主观情绪,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中选择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因IAPS中悲伤的图片相对更多,只探讨个体对悲伤这种负性情绪的标签过程。为了减少个体对悲伤的习惯性反应,加入少量的愉快和中性图片作为填充材料,个体也需要对这些图片进行反应,但不纳入数据分析中。共从IAPS中挑选了160张图片,其中,100张悲伤图片、30张愉快图片以及30张中性图片。再经预实验选择情绪认同度大于80%的图片,最终确定实验所用材料,包括70张悲伤图片(效价 3.11 ± 0.69 ,唤醒度 6.31 ± 0.79),10张愉快图片,以及10张中性图片。

3. 实验设备

采用64导电极帽(Brain Products, Germany)记录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 EEG)数据,并使用软件E-prime1.0设计实验程序和记录行为反应数据。

4. 实验程序

给被试安装好实验设备后,主试向其说明实验要求,之后,被试开始进入练习阶段(9个trial)和正式实验阶段。实验任务主要分为3种,客观情

绪标签、主观情绪标签和观看(见图1)。客观情绪标签下,被试要从图片下文的情绪词中选择能表达图片情绪的标签词;主观情绪标签下,被试要从图片下文的情绪词中选择能表达自己情绪的标签词;观看下,被试只静静地观看图片。

每个block以说明任务要求的提示语(如客观情绪标签)开始。注视点随机呈现300—500ms,之后,屏幕中央显示图片(2500ms),被试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实验任务。出现空屏后进入下一个实验流程(见图2)。正式实验包括3个block,分别对应3种实验任务,采用不完全被试内设计平衡block的顺序。每个block内被试需要完成90个trial,共计270个。被试完成实验后,摘除其设备并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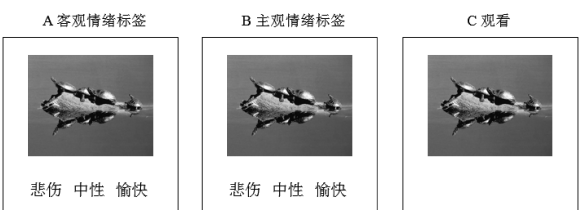


图1 实验任务示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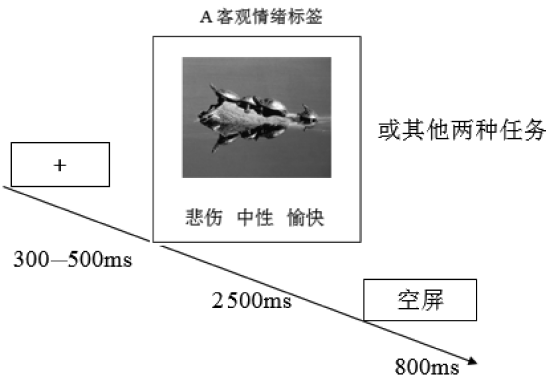


图2 实验流程示意图

5. 数据采集与分析

记录脑电数据时,参考电极放置在左乳突,接地点(Ground)在FPz和Fz中点。垂直眼电(Vertical Electrooculogram, VEOG)和水平眼电(Horizontal Electrooculogram, HEOG)分别贴在右眼上下和两眼外侧。A/D采样率为500Hz。保证所有的头皮电阻均小于5k Ω 后才开始采集数据。脑电数据的离线处理流程如下:以双侧乳突的平均重置参考电极,校正眼动,滤波的低通为30Hz,大于 $\pm 100\mu V$ 的波幅被视为伪迹排除。以刺激前200ms作为基线,分析刺激出现后1000ms内的波幅。叠加每种实验条件下的脑电数据并进行平均。

根据总波形图和已有文献,本研究采用平均波幅法分析两个脑电成分:500—1000ms内的晚期正成分LPP,以及350—500ms内正波P3。其中,

LPP 的记录电极为 POz、Pz、P2, P3 的记录电极为 Fz、FCz、Cz。

采用 SPSS21.0 完成以下数据分析过程: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比较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以及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下 LPP 波幅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下 P3 波幅的差异;分别统计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二、结果

1. 行为数据

分别统计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正确率以及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结果见表 1。经检验,客观情绪标签正确率比主观情绪标签高, $t(33)=2.94, p<0.01, d=0.38$;且客观情绪标签反应时比主观情绪标签短, $t(33)=-2.47, p<0.05, d=0.30$ 。

表 1 两种任务下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统计指标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i>M</i>	<i>SD</i>	<i>M</i>	<i>SD</i>
正确率	0.85	0.12	0.80	0.14
反应时(ms)	1131.70	288.90	1226.10	330.00

2. ERP 数据

观看下不涉及 P3 波幅,其余各实验条件下被试的 LPP 波幅和 P3 波幅的描述统计见表 2。

表 2 各条件下被试的 ERP 数据 (*M*±*SD*) (单位:μV)

统计指标	时间窗口(ms)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观看
LPP	500—1000	4.78±2.87	5.05±3.19	4.59±2.87
P3	350—500	4.39±2.35	3.48±2.27	

(1)LPP 波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事前比较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下 LPP 波幅不存在显著差异,

$F(1,33)=0.09, p>0.05, \eta^2=0.07$;主观情绪标签和观看下 LPP 波幅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F(1,33)=0.42, p>0.05, \eta^2=0.15$ 。相应的波形图详见图 3、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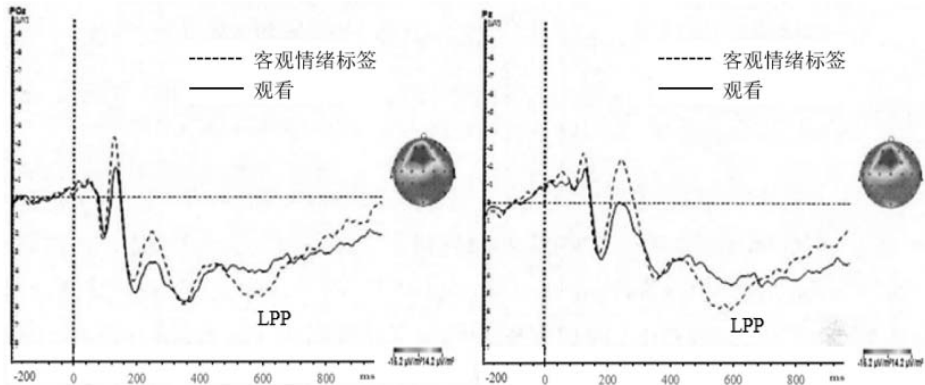


图 3 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POz 和 Pz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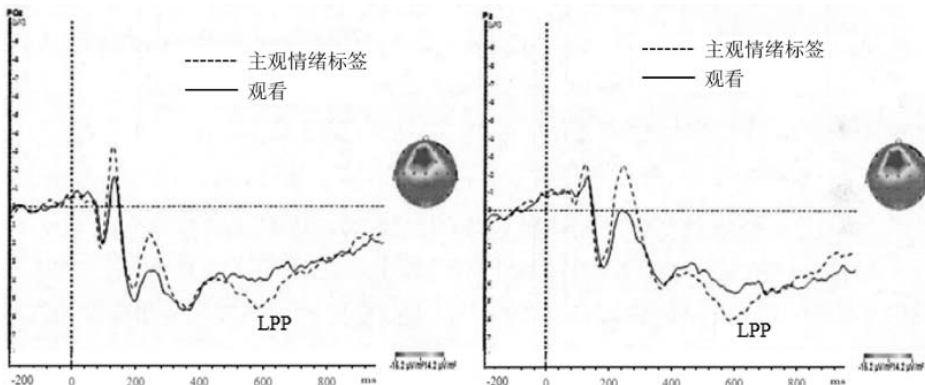


图 4 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POz 和 Pz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虽然整体上并未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以及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LPP 波幅上的差异,但从其波形图中可知,两种情绪标签下的 LPP 波幅

均在 500—700ms 有所增加。因此,进一步将 LPP 波幅的时间窗口细分,以 50ms 为间隔分段统计,具体见表 3。

表 3 各条件下被试的分段 LPP 数据 ($M \pm SD$) (单位: μV)

统计指标	时间窗口 (ms)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观看
LPP	500—700	5.78 $\pm$ 3.80	5.58 $\pm$ 3.53	4.75 $\pm$ 2.99
LPP	500—550	5.61 $\pm$ 3.82	4.92 $\pm$ 3.67	4.40 $\pm$ 3.14
LPP	550—600	6.19 $\pm$ 4.00	5.88 $\pm$ 3.59	4.86 $\pm$ 3.25
LPP	600—650	6.05 $\pm$ 4.12	6.03 $\pm$ 3.80	4.97 $\pm$ 3.02
LPP	650—700	5.26 $\pm$ 3.63	5.48 $\pm$ 3.69	4.76 $\pm$ 3.06

再次进行各时间窗口内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下 LPP 波幅在 500—550ms [$F(1,33) = 3.03, p = 0.09, \eta^2 = 0.35$] 和 550—600ms [$F(1,33) = 2.22, p = 0.09, \eta^2 = 0.36$] 这两个时间窗口内大于观看;其余时间窗口内情绪标签与观看均没有显著差异。

(2) P3 波幅

已发现,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在 LPP

波幅上的变化趋势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在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上存在差异,使得情绪调节的效果表现出不同^[12]。因而,进一步探讨两者在代表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的额叶 P3 波幅上的可能差异。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下的 P3 波幅大于主观情绪标签, $t(33) = 2.69, p < 0.05, d = 0.39$ 。相应的波形图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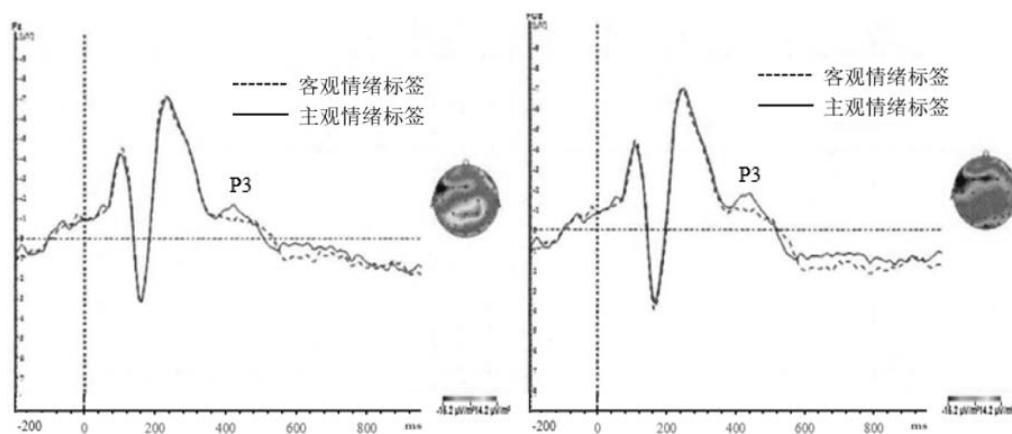


图 5 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在 Fz 和 FCz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三、讨论

已有研究发现情绪标签对情绪的调节可能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13],但这一结果针对的是客观情绪标签,主观情绪标签是否也表现出这种动态过程?如果标签客观刺激的情绪和标签自身所体验到的情绪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会表现在哪种脑电波上?

本研究中,被试同时进行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结果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下 LPP 波幅在 500—550ms 和 550—600ms 两个时间窗口内均大于观看,其他时间窗口未发现与观看的显著差异;而主观情绪标签下 LPP 波幅的这种变化趋势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支持。这提示,标签客观刺激的情绪和标签自身所体验到的情绪可能确实存在差异,使得两者的情绪调节效果表现出不同。为进一步探明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可能差异,比较两者的 P3 波幅,结果发现,两者的 P3 波幅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中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可能不同,使得表征情绪调节效果的 LPP 波幅也体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1. 情绪调节作用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客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作用,而未证实主观情绪标签对个体情绪体验的调节。

这结果一方面与已有研究一致^[11],说明个体用语言描述刺激的情绪属性这一标签任务可以有效地降低情绪刺激给个体带来的情绪反应。这进一步证实了阻断理论的主张,即有意识的加工情绪刺激能有效地抑制情绪,从而降低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14]。但另一方面,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阻断理论对主观情绪标签的预测,这可能与主观情绪标签相较于客观情绪标签所具有的自身特点有关。主观情绪标签下,个体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之前,需要先对其进行系统的加工。这可能因为这对内在情绪的自我反省,使得主观情绪标签与客观情绪标签呈现出不同的情绪调节效果。也就是说,主观情绪标签中同时涉及对自身情绪的内省和标签过程。Lane 等人的情绪意识的认知发展模型指出,个体对自身情绪的内省涉及躯体反应、行为倾向、情绪识别等不同层级的加工过程,内省层级越高,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越强烈^[15, 16]。据此,主观情绪标签下对内在情绪的反省应该产生更大波幅的 LPP,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可能是由于主观情绪标签中 LPP 波幅的变化是对情绪内省与标签的综合作用,但何时体现为内省,何时体现为标签,则应进一步分析主观情绪标签中所涉及的情绪加工过程。

2. 情绪评价过程的分析

理论上,主观情绪标签涉及个体对自己情绪的内省,并进一步通过标签过程将情绪体验转换为语言,内省和标签的综合作用将使个体的情绪也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但这一理论分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支持。这说明,与客观情绪标签相比,主观情绪标签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情绪加工过程,使得其呈现出不一样的 LPP 波幅变化。已有研究证实,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差异也可体现在皮肤电反应的变化上^[10]。为更直接分析两者内在的情绪加工过程,比较两者在表征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的 P3 波幅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两者的 P3 波幅存在显著差异。这更说明主观情绪标签存在与客观情绪标签不同的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这种不同有可能是加工程度的差异,也有可能是相关脑区的差异,使得两者的 P3 波幅显示出不同。

Lee 等人的情绪评价的相互作用模型认为,情绪评价涉及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根据情绪的来源,情绪评价可分为评价刺激的情绪和评价自己的情绪^[9]。两种评价任务均涉及情绪、认知以

及整合情绪与认知相关的脑区,如杏仁核、外侧前额叶和背内侧前额叶。但这两种指向不同来源情绪的评价过程,也会激活一些特异的脑区。大脑在评价刺激的情绪时,首先由感觉皮层分析刺激的物理属性,之后,由腹外侧前额叶进行更高水平的加工,主要涉及调用关于刺激的概念来解释当前的感觉信息;而在评价自己的情绪时,个体在脑岛处有意识地加工内在状态,并进一步将其与已有经验进行整合,最后在前侧扣带回处形成相应的情绪体验。根据 Lee 等人的模型,客观情绪标签中个体主要评价刺激的情绪,相应的脑区主要涉及感觉皮层和腹外侧前额叶,而主观情绪标签中个体需要评价的是自己的情绪,经由脑岛和前侧扣带回完成情绪的加工过程。由此,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虽都涉及将情绪转换为语言的标签过程,但其标签的情绪来源不同,与此相关的脑区也不同,产生的情绪反应也会有所不同,表现为本研究中所发现的不同的 LPP 波幅变化。

[参 考 文 献]

- [1] LIEBERMAN MD, EISENBERGER NI, CROCKETT MJ, et al. Putting feelings into words: Affect labeling disrupts amygdala activity in response to affective stimuli[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7(5): 421-428.
- [2] TORRE JB, LIEBERMAN MD. Putting feelings into words: Affect labeling as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J]. *Emotion review*, 2018(2): 116-124.
- [3] BURKLUND LJ, CRESWELL JD, IRWIN MR, et al. The common and distinct neural bases of affect labeling and reappraisal in healthy adult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4.
- [4] PAYER DE, BAICY K., LIEBERMAN MD, et al. Overlapping neural substrates between intentional and incidental down-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 [J]. *Emotion*, 2012(2): 229-235.
- [5] LIEBERMAN MD, INAGAKI TK, TABIBNIA G, et al. Subjective responses to emotional stimuli during labeling,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J]. *Emotion*, 2011(3): 468-480.
- [6] 白学军, 岳鹏飞. 情绪标注对负性情绪的抑制: 来自自主神经活动的证据[J]. *心理学报*, 2013(7): 715-724.
- [7] NILES AN, CRASKE M, LIEBERMAN MD, et al. Affect labeling enhances exposure effectiveness for public speaking anxiety[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5, 68: 27-36. (下转第 80 页)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文献综述*

——基于 CNKI 数据知识图谱分析

蒋瑾 唐梦 王丹伊 涂颖莹

(安徽建筑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 以 2002—2019 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期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 20 年国内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发展历程。运用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 绘制图谱进行阶段性分析和多维度综述。在 CiteSpace 软件中得出涵盖文献时间分布、主题分布、期刊分布和著者关系等知识图谱,并用软件对近年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了近年研究热点的 4 个主要内容: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价值观的影响、网络消费安全性、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大学生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与探究。网络消费研究受全国高校广泛关注,更多的社会机构应加入该课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应当不断扩展思维,多维度多层次掌握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的网络消费观。

[关键词] 大学生; 网络消费; 心理;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54-06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网络消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1],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1%,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6.39 亿^[1]。10—39 岁群体占总体网民的 65.1%,其中 20—29 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 24.6%。大学生作为接受和学习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之一,现已成为网络消费的主力军之一。研究者虽然对大学生网络消费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仍不够。由数据可知,研究者的数量呈现出缺乏的

状态,并未出现核心的作者群体。理论研究及高质量论文明显不足,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深度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本文尝试通过对文献的时间分布、数量分布、作者分布及关键词的热点分析等,对文献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进行归纳总结,力求给后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2]。

一、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助陈超美^[3]教授开发的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此工具基于 JAVA 程序进行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等新型技术手段,将蕴含在整个研究领域的潜在知识、内在逻辑结构等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不仅增强了人们对某领域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工匠精神’视域下理工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SK2019JD2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00 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因素的调查分析研究”(项目编号:C19118),安徽建筑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资助工作运行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djs209)。

[收稿日期] 2020-01-02

[作者简介] 蒋瑾,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建筑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师,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知识理解的直观性,而且可以客观揭示某研究领域的动态发展态势。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中的关键路径算法 (Pathfinder),对 CNKI 检索到的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研究论文的高产机构合作关系进行分析;选择 Author(作者)、Institution(机构)、Keyword(关键词)、节点,对发文作者分布、发文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可视化定量分析;利用 Burstness(突现词)功能分析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现状,以期对未来高校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2.数据来源

在本次研究中,将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的检索平台,以“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和“大学生网络消费”为检索词进行检索。为保证检索文献的准确性,剔除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文献中作者或刊名不健全、重复的 13 篇文献,截至 2019 年 10 月 3 日,共获取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有效文献 814 篇。

二、文献计量分析

1.文献时间分布

本文以 CNKI 为检索源,检索词为“大学生网络消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检索到的文献年份最早为 2002 年,最晚为 2019 年。2001 年,中国移动通信的移动梦网正式开通。手机用户可通过移动梦网,运用移动游戏、信息点播、网上购物等多种功能。笔者以年份为横坐标,发表的文献数量为纵坐标,建“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折线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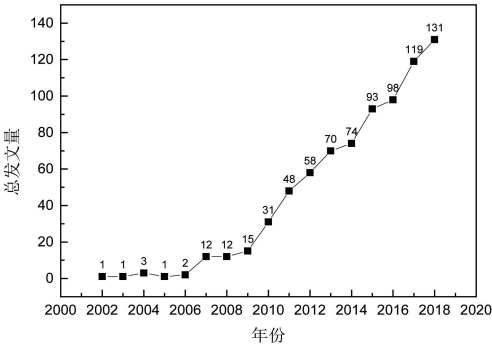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折线图(2002—2019)

由图 1 可知,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研究文献呈现出先波动后持续增加的总体趋势,清晰呈现出 3 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 2002 年至 2006 年 5 年间发文量较低且保持稳定,这一阶段共发文 8 篇,占总发文量的 1.040 3%;第二阶段

2007 年至 2009 年 3 年间发文量有小幅上涨,但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共发文 39 篇,占总发文量的 5.071 5%;第三阶段从 2010 年至 2018 年 9 年间持续增长,其中,2018 年达到峰值 131 篇,总体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第三阶段的发文量为 722 篇,占总发文量的 93.888 1%。从 2002 年到 2019 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自 2005 年网络消费全面兴起,文献数量更是直线式上升,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2.文献主题分布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精华所在,也是反映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的重要标志。利用 CiteSpace 将检索到的有效文献导入后得到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网络消费盛行这些年,在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研究中,“消费行为”“大学生”“网络购物”等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高频次出现足见研究课题的关注焦点。

通过多次的调试程序,设置适合本次研究的参数阈值,生成如图 2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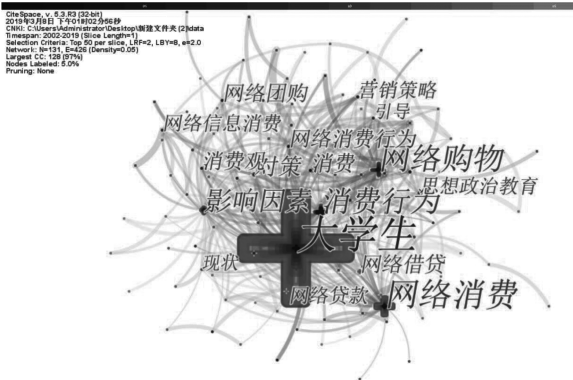


图 2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关键词知识图谱(2002—2019)

该图谱将检索到的信息可视化,将信息科学等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关键词词频共现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形象地表现了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核心结构,将检索到的众多文献加以融合,最终得出关键词^[4]。它将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相关领域进行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然后把得到的数据或以知识计量,或以图谱表现出来,对后期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价值。由该图谱可知,节点数为 131,连线数为 426,网络密度为 0.05。由此可得,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结构较为紧密。由此可知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热度一直呈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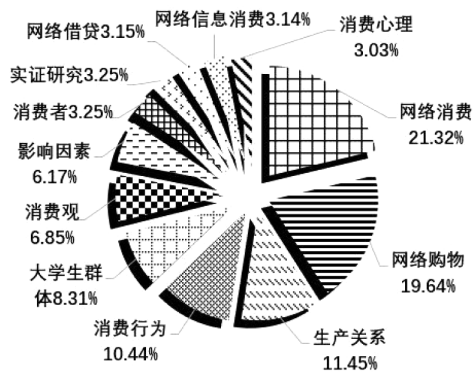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主题(2002—2019)

图3显示出研究的热点主题,其中,网络消费及其网络购物所占比例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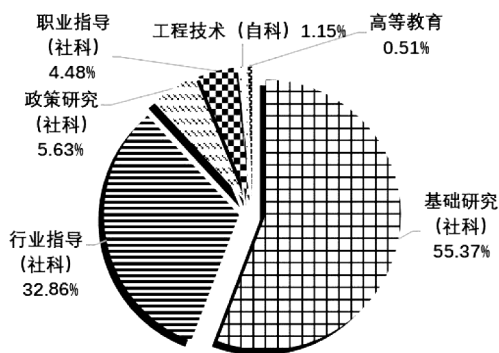


图4 “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层次(2002—2019)

图4显示出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研究层次及比例。由图4可得基础研究(社科)和行业指导(社科)在研究层次上所占比例较大,其他研究层次所占比例较小。

Brustness 突发性节点可以检索突发性关键词,指某些年份发表文献中骤增的专业术语,突变词可表征相关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5],通过整理被引用频次、梳理共现频次突现度增加的节点或者是在一段时间里文章的关键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领域内研究前沿的演变趋势,详见表1。

表1 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强度(2002—2019)

关键词	强度	高频年份
网络游戏	3.586 6	2007—2011
网络购物	10.436 3	2008—2011
网上购物	3.993 3	2012—2015
网络团购	4.809 2	2013—2014
影响	3.596 3	2014—2015
理性消费	3.240 9	2015—2016
消费信贷	3.159 7	2016—2017
网络借贷	7.314 4	2017—2019

由表1可知,国内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聚焦的热点为“网络游戏”“网络借贷”“网络购物”“影响”“理性消费”等,还可以得出其突变强度(Strength)和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呈现其突变特征。其中,突变强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出突变词的兴起和衰落情况。突变强度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说明这类突变词是较为成熟的研究热点,如“网络购物”的突变强度高达10.436 3,从2008年到2011年持续了3年。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如何做到合理网络购物也成了一个网络消费不可忽视的热点问题。突变强度较大但持续时间较短,说明突发性较强,如“网络团购”的突发强度为4.809 2,持续时间仅为1年,而“网络借贷”的持续时间为2017—2019两年,突变强度高达7.314 4,网络团购和网络借贷均为网络消费发展的中间产物,网络借贷更是因为大学生的经济情况特殊而兴起的一种网络产物,故而此类突变词为过渡性热点。突变强度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说明该类突变词是较为稳定的热点。如“网络游戏”的突变强度为3.586 6,但持续时间为2007—2011年。自2006年第四代网络游戏开始,网络游戏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网络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由于其为网络消费的细节之处,不能聚集成规模,故而突变强度较弱。

高频关键词的出现使我们可以从研究中看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消费的方式趋于复杂化、多样化,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3.文献作者分析

在本次检索到的文献中,作者共计1 291名,将文献导入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中,可以得出研究作者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



图5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研究作者共现图谱(2002—2019)

由图5可知,在本次研究检索的文献中出现了一些作者合著群体,其中,最大的群体由6人组成,

他们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理学院,于2017年在杂志《教育现代化》上发表相应论文。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出现5人组成的合著群体,在杂志《合作经济与科技》发文研究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虽图中含有较多的合著群体,但是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作者群体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图中连线较少代表着其联系并不密切,节点数为36,而连线数仅为33,合作密度较低。

成为该领域核心人物的关键点之一是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本研究发现发文1篇的作者有1169位,约占总数的90.550%,发文量为2篇的作者共121人,占总发文量的9.372%,发文量为3篇的只有一位,即黄祖辉教授。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祖辉教授的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理论研究,他在研究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曾发表论文《大学生网络消费文化取向反观》《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哲学反思》《大学生网络消费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探索》等。如何判断我国研究该领域文献的核心作者群成熟度,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根据普赖斯公式: $N = 0.749 \sqrt{\max}$ (N为可作为候选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 max为统计时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本研究中max的值为3,可以计算得出 $N \approx 1.297$,即规定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量为2篇或者2篇以上。

表2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发文量(2002—2019)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西南财经大学	11	10	浙江大学	6
2	郑州大学	10	11	南京邮电大学	6
3	福建师范大学	10	1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
4	西南交通大学	10	13	黑龙江大学	6
5	安徽大学	9	14	吉林大学	6
6	江西财经大学	8	15	山东大学	6
7	安徽财经大学	8	16	河北经贸大学	6
8	延安大学	7	17	华中师范大学	6
9	山西财经大学	7	18	中国人民大学	6

这些高校成为主要研究机构,占总量的3.846%,发文量为3—5篇的共有71个研究机构,占总量的15.170%,发文量为1—2篇的机构约占总量的80.982%。研究机构除各大高校,还有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等社会机构,凸显

本次研究中共有123位核心作者候选人,共发文249篇,被引频次771,再根据综合指数公式计算候选核心作者的综合指数。通过计算可知,候选核心作者的平均发文量约为2.024,平均被引频次为2.268。当综合指数大于100时,就可认为该著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经计算候选核心作者的综合指数可知,在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为黄祖辉教授,但由研究作者共现图谱可得,黄祖辉教授与其他研究者的合作较少,并未形成以黄祖辉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团队性研究可适当增加,加强该领域的研究。

4. 文献机构分析

文献的研究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机构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和重视程度。据统计可知,本次研究检索到的文献中,期刊共591篇(包含报纸1篇),学位论文共245篇(其中,硕士论文236篇,博士论文9篇),会议论文共5篇(包括国际会议2篇,中国会议3篇)。

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主要研究机构为各大高校,本研究中检索文献涉及468个研究机构,其中,以西南财经大学发文量最多,共11篇,发文量为6—11篇的如表2所示。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心理的热点性,具有一定的研究水平。

三、国内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热点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6]。大学生的网络消费及其心理在

一定角度折射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其研究热度近年来也在不断升高。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研究热点内容基本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价值观、生活等多方面的影响

电子科技大学的马天琛在博士论文中指出网络已成为高校学生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学生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与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7]6}。《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刊发的《网络文学消费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对策》探究了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其对策^[8]。探究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成长的影响,已成为研究大学生成长的热点。

2.大学生网络消费安全性的研究讨论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面向大学生的网络贷款平台迅速袭入高校校园。谭子鑫通过调查影响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的因素,如生活水平、生活费来源及网络贷款的用途等,科学分析,为政府职能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依据^[9]。厦门大学的王嘉琪从传播学角度对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进行研究,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新视角,研究结果对大学生今后的信贷消费行为具有指导意义^{[10]4}。

3.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

东华理工大学的张路易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类型和范围,就不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以剖析,概括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特征,探究了运用绿色消费观引导大学生网络消费的路径^{[11]4-5}。

4.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及相关方面的探究

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较少,研究方向也较为单一,大多为网络购物消费心理或网络文化消费心理等。吉林大学博士刘紫涵分析了大学生消费网络新闻时的需求和动机,并且透过心理特征探寻影响消费心理的因素,继而通过数据结果所表明的大学生网络新闻报道渠道、报道内容以及报道形式的选择倾向来总结大学生消费网络新闻的行为特征^{[12]4}。在网络购物消费心理上,学者发现大学生在网络购物中表现出趋我性、从众性和多元化等消费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受到消费需求、商品价格和品质、支付风险和售后保障的影响^[13]。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的方向虽然并不相同,但目的都是通过研究相关课题,探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次研究针对文献的时间、主题、作者和机构这四大方面,结合了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将知网上检索到的文献绘制成相应知识图谱,同时使用计量法进行数学统计。大致了解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现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1.全国高校广泛关注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受到广泛关注。研究结果显示,有关大学生网络消费的文献出自各大高校居多,研究机构中包含众多知名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注重这一领域的调查,便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近十年来,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表明这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根据发文量的不断增多,预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一领域的文章出现。

2.研究尚待多元化

(1)从研究机构的角度来看,本研究发现,关注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研究机构多为各大高校,少部分研究机构为社会机构。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这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学科方法应用较少。社会机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进行调查,使研究论文逐渐走向深入和细化。

(2)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研究中应当不断扩展思维,多维度多层次理解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才能寻求新的研究方向。

网络消费受到人们的追捧。大学生树立何种消费观,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消费行为,还会影响社会其他群体的消费习惯^{[14]5}。大学生思想活跃,追求时尚,对新鲜事物接受速度快,对网络消费的认可度高,但是,他们的社会阅历尚浅,对自身的消费能力认识不足,容易在网络消费中迷失自我^{[15]4}。家庭、高校、社会应当形成合力,培养当代大学生正确的网络消费心理。多数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家庭,家长对子女的消费可适当做出约束,比如要求定期报账,及时掌握子女的消费情

况,发现问题,主动和子女沟通,防止其盲目、过度消费。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可融入相关知识,引导学生正确、合理地进行网络消费,促其树立科学节约、理性绿色的消费观。社会应加大宣传力度,弘扬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在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多方努力下,大学生应自觉提升个人修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学会不冲动消费,不在网络消费中迷失。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办公室.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19-10-18].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l.
- [2] 刘志红,王利辉.公共经济学研究主题与方法发展趋势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4):87-96.
- [3] 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3):359-377.
- [4] 张宁,盛武.基于CiteSpace的煤矿信息化知识图谱构建与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3):11-17.
- [5] 谭章禄,单斐,陈孝慈.国内煤矿安全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7(6):837-843.

- [6] 新华网.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4-30)[2019-10-18].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30/c_1124440193.htm.
- [7] 马天琛.高校大学生网络思想行为分析与引导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9.
- [8] 付伶俐,周冰.网络文学消费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对策[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1-94.
- [9] 谭子鑫.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网贷消费行为研究[J].金融经济,2018(20):133-134.
- [10] 王嘉琪.网络消费信贷产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扩散与使用行为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8.
- [11] 张路易.大学生绿色消费观引导路径研究[D].南昌:东华理工大学,2018.
- [12] 刘紫涵.大学生的网络新闻消费心理与行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
- [13] 班惠英.基于网络购物的大学生消费心理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9):36-38+51.
- [14] 汪明霞.网络消费对大学生消费观的影响分析[D].芜湖:安徽工程大学,2018.
- [15] 吴舒.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消费及价值引导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19.

(责任编辑 秋 阳)

(上接第9页)

既要在空间上坚持“平等”,在时间上考虑“可持续”,也要尊重代内与代际之间的环境权益,以敬畏自然与生命的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绿色治理体系,不仅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也要“发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10],党群同心共同战胜疫情。最后,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筑牢防控疫情的自然防线,严惩一切杀害、食用、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杜绝打着“保护自然”的旗号实则获取利益的做法,依靠法治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习近平.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N].人民日报,2020-02-04(1).
-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4]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 刘宽红.追寻自然的精神价值——解读生存论视角下的爱默生自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6):22-25+11.
- [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 [10] 习近平.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N].人民日报,2020-03-11(1).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学生语文读写能力转换的梯度

王家伦 和 苗苗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在整合理念的指导下,历份语文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以及“部编版”教材的编写体系皆体现出读写结合的趋势,要求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读写结合主要体现的是阅读与写作之间“道”的结合,而实际上,从语文核心素养的基本理念来看,更应将结合点着眼于“文”,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出发,注重句、段、篇三个梯度的建构,以促进学生的语文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

[关键词] 读写结合; 语言建构与运用; 读写能力转换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60-05

一直以来,“阅读”占据了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写作”教学名义上很受重视,但实际上却逐渐被“边缘化”,成为语文教学中最令教师和学生头疼的环节。“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两者逐渐“分道扬镳”。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我们更应重视综合性理念在教学中的运用,加强读写之间的联系,以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一、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读写结合理念

在每一次语文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语文课程的性质以及语文教学的目标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也是具体教学实践重要的出发点。语文教学应该以提高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终极目标,这一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提倡整合教学,注重读写结合,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便成为语文教学新的探索点。

1. 读写结合是历份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一贯要求

强调读写结合,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这是语文教学一直延

续的思考与探索,在历份大纲、课程标准中皆可找到依据。

1956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便明确提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应当密切结合的要求,认为阅读文章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写作的基础,并直接将作文教学的效果与阅读教学的质量相关联。

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承续1956年教学大纲的理念,进一步指出“课文”不仅适用于阅读教学,同时也是写作教学的重要依据,并要求教师在对文章的讲读分析中示以“用词造句、篇章结构”之范例,以求更好地为写作教学服务。

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则从“如何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密切配合”出发,将两者转换的连结点更加具体化,注重从选择素材、确定中心、选词造句等方面构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作文教学时,要指导学生灵活运用在阅读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以及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收稿日期] 2020-01-17

[作者简介] 王家伦,男,江苏昆山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和苗苗,女,山西吕梁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试用)》进一步继承了读写结合的理念,并将其具体化、系统化、完整化。不仅要求学生认真学习仔细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而且也提出了学习遣词造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等方法的建议,从而进一步“引导学生把从阅读中学到的基本功,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去”。

总之,要求加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是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一贯要求。

2. 新课程标准对读写结合的要求更为具体

作为课程改革具体“产物”的新课程标准对读写结合的要求更为具体。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写作教学的总目标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1]。这里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教师专门教授的语文知识,而是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不断学习总结的结果。同时,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作者的写作技巧与手法,感受生动明确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读写结合”理念的具体体现。再者,各个教学阶段的阶段目标也有明显的表述。比如,第一学段中明确指出,“在写话中要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在其他阶段的目标中也表现出阅读与写作在语句、标点符号、语法、情感等方面的联系。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阅读与鉴赏”模块中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把握内容,揣摩文章语言,并要有自己的判断、思考,这些都基于一个出发点,即要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与想法,这正可以服务于学生之后的独立写作;同时阅读中涉及不同体裁、不同文类的文章,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学习到多种表现手法与表达技巧,这样在写作中便可以根据表达目的做出合理的选择,从而不断提高其记叙、说明、议论等基本表达能力。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适应语文课程改革的浪潮,承袭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一些观点。其中,它明确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重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之间的联系,善于将读与写、说与写有机结合,相互

促进”^[2]。在各个阶段目标中,也从标点符号、语言材料、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凡此种种,都体现出通过阅读积累知识,培养语感,输入语言材料,并在写作中将其输出运用,不断促进学生读写能力转换的要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3]。“综合性”既是学习与生活的综合,也是听说读写等语言运用的综合,这同样也要求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以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实践性”是说学生语文知识的获得和语文能力的取得必须在真实的语文学习情境中进行具体练习运用,也就是说学生从阅读中学得的语文知识、积累的语文材料可以借助写作得到运用与实践,从而化“学得”为“习得”,不断实现其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这些既是对教师组织教学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相应的教学建议与引导。

3. “部编本”语文教材读写能力转换理念的体现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部编本”语文教材深入贯彻“整合教学”的理念,切实注重语文教学的综合性。首先,从语文教材的板块结构来看,仍然是分单元组织教学,以七年级上册的教材为例,该册书共有六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有阅读教学,紧随其后的便是写作教学板块。除这两个板块之外还设有三次综合性学习、两个名著导读和两个课外古诗词诵读。如此设计,不仅突出了阅读与写作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体现了综合性的设计理念,彰显了编者力求通过读写结合,切实促进学生读写能力转换的思考。

其次,从板块内的具体内容来看,较以往也有了新的调整。各个单元不同板块的内容都有统一的指向,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板块之间内容相互联系,彼此相关。如七上第三单元中,在阅读板块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塑生命的人》两篇现代文,这两篇皆为写人记事的文章,运用不同的描写技巧,各用其能,各显神通,刻画出神态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每个人物都各具特色;在写作板块,则围绕阅读所教所学设置了“写人要抓住特点”的教学要求,如此一来,学生便可以将从阅读课上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及时地运用于写作练习

中进行消化吸收,促进自身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

最后,从板块目标来看,各个板块都遵循“文道各一,文道结合”的原则,注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教育。以七上第一单元为例,阅读板块的导语中说到“本单元课文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多姿多彩的四季美景,抒发了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力求帮助学生树立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 思想情感;同时也谈到学习本文的一些方法与重点,“要重视朗读课文”“把握好重音和停连”“体会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凡此种种,都立足于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力求培养学生的语感,积累语言素材,提高语文素养。而在写作板块同样也从“文”“道”出发,基于阅读板块的学习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目标,以便使学生及时地将所学运用于写作中,切实促进读写结合。如此,精准把握读写结合的理念,力求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可谓用心良苦。

二、学生语文学习读写能力转换的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语文教学不仅要本着以德树人的原则,关注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格信仰;另外还要关注课程的“语文性”,通过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因此,读写能力转换,不仅仅是立足于思想方面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使学生学会并熟练地将从阅读课中学习到的语文知识与能力顺利运用于书面表达中,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1. 读写转换不应限于“道”

在具体的教学探索过程中,常有从“道”出发关注读与写之间转换的现象。如不少语文教师在教学完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之后,在“父子情深”上大做文章,极力渲染父爱的深沉伟大,要求学生在课后模仿课文来写“母爱”。这种基于“道”来进行语文读写转换的教学设计,有其必要性,但也有本末倒置之嫌。单纯的思想陶冶,不仅会使学生产生“被说教”的不悦情绪,同时由于背离语文教学的主旋律,因而很难使学生关注到语文课程的重点。

2. 应该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出发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是语文课程的本质要求。因此,教师在进行读写结合教学设计时主要也应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出发,立足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使学生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品味语言,培养语感,不断积累丰富的词汇、语句等语言材料,体会具体的表达方式的用法,学习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为书面表达准备充足的写作素材。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可以链接阅读教学中涉及的这些知识与能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模仿,不断运用,不断创新,掌握书面表达的技巧,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读写能力的转换。

以“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写作”为例——“写人要抓住特点”。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仔细观察想要描写的人物,抓住人物的特点;接着要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描写。那么“描写什么”以及“如何描写”便成为教师指导写作的关键。教材在写作提示中给出了描写五官、描绘衣着等方面的建议。如何将人物的特点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且表现得传神独特呢?这时教师便可以回归课文,将课文中描写精彩的句、段、篇作为学生模仿学习的案例。由于这些课文已经经过教师系统的讲解,学生更加熟悉,稍加点拨,学生便能够理解接受。接着,教师再指导学生一步步模仿创作,将积累的语言材料进行表达运用,从而成功完成写作。基于语言建构与运用指导学生写作,把课文用作学习范本,将写作为表达的手段,能够不断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

三、从模仿到创新的读写能力转换过程

阅读教学中的大多数文质兼美的文本基本都可以作为写作教学的范文,供学生学习模仿,通过不断的练习运用,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水平。一般而言,写作教学主要关注“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以及“为何这样写”三个方面。其中,“写了什么”是文章的选材立意问题,这可与阅读教学中的“写了什么”相对接,即在阅读文章时让学生体会作者为表达某一情感都写了哪些内容,启发学生写文章时要选取典型事件来记述,这一方面较易掌握;“怎么写”是写作教学以及学生独立写作的

关键,学生“谈写作色变”大都是不知道该如何写,因此要与阅读教学中“怎么写的”相联系;“为何这样写”与阅读中“为什么这样写”相对接,主要用于修改环节,检查语言表达运用得合理与否,这一环节又以“怎么写”为基础。因此,阅读与写作教学结合的衔接点应重点放在“怎么写”上。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读写能力的成功转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对其通过句、段、篇三个梯度进行层递式训练。下文以记叙性文本的读写转换为例进行阐述。

1. 第一梯度:仿句、造句

一座座精美的建筑拔地而起,都始于一砖一瓦的精心堆砌;一篇篇优秀作文的完成,同样也离不开一词一句的斟酌组合。因此,读写结合的第一梯度应着眼于句子的练习,即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关注一些表达生动的语句以及一些优美新颖的词语,进行仿句、造句练习,进一步使习得的语言材料得到运用,从而丰富学生的书面表达素材。

仿句、造句的练习目的在于每一句话的生动准确表达,所以关注的对象不妨放在修辞格的运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以及某些程度副词的改写上。

比如,在教学朱自清的《春》这篇文章时,教师便可以将文中表达生动新颖的语句作为例子供学生模仿练习。如开头一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这句运用拟人修辞,将春拟人化,既传达出春天到来的讯息,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来临时的喜悦与期盼,给人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感觉。这时可让学生随堂运用拟人的修辞,模仿描写其他季节到来时的场景。学生可能会写出如“冬爷爷拖着长长的白胡子,迈着小碎步缓缓来到人间”,如此,便将僵硬的诸如“冬天来了”的表达“改装”得更为生动形象,同时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文中还有许多运用修辞的语句,教师都可作为范例,指导学生进行感悟学习,并练习运用,如此进一步丰富学生的表达。

其次,文中标点符号的运用也较为丰富。在教学中教师也要指导学生学习运用,增强语句的节奏感。

再者,恰当的表述“程度”也应作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要点。例如文中表现小草很嫩的形态时,并没有直接用“很嫩很绿”来修饰,而是化“很”为

叠词,“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将程度副词改成更为形象具体的描绘。这也可以让学生以“这里的风景真好看”为例做模仿练习,变死板的程度副词为生动具体的描绘,从而丰富学生的语言表达,增强文章的可读性。

2. 第二梯度:(连)段

连段练习是促进读写能力转换的第二个梯度。每一个段落大都是由一个个完整的句子连缀而成。如果说,基于句子练习的读写转换更多的是集中于组词技巧的学习,那么,段落的连缀则需要从描写视角和思路着手,其关注重点应放在写作角度以及句与句之间的组织逻辑上。

同样以《春》这篇文章为例。在教学描写花儿的这个段落时,教师应指导学生了解作者的描写思路:作者先是正面描写了桃花、杏花、梨花的形态与香味,接着又从侧面描写蝴蝶、蜜蜂的活动,进一步烘托花之香。最后将视角从高转低,描写了遍地的野花。作者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将正侧面描写相结合,同时又使视角高低转换。这样一来,将一个个句子巧妙排列组合,使得整个段落具体完整,而且充分展现出事物的特点,可谓独具匠心。以此为范例,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以“描写校园一角”为例,要求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描写方法或者转换视角进行连段练习。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真正地掌握连段的技能,进一步提高语言的组合表达能力,进而实现其读写能力更深入的转换。

3. 第三梯度:(成)篇

成篇练习是读写能力转换的第三个梯度。要想室内装修得实用并精致华美,不仅需要精心选择每一件家具,同时还要关注到家具的位置摆放,位置摆放不妥当同样也将影响到整体的效果。文章也是如此,打造好段落之后,还需要将其合理归置。在这一梯度的练习中,结合的立脚点应当放在文章的结构、详略安排以及写作的顺序上。

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整体效果,因此,结构的安排也是写作教学的关键。当然,在有限的写作教学课堂中难以完全将结构的安排方式进行系统讲解,或者说单纯讲一些结构理论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消化。这时,教师不妨通过结构不同的文本的阅读教学,在解读文本时顺势引导学生分析并学习文章写作的结构方式,结合

生动形象的范例,这样更加利于学生的接受与学习。比如,教师在讲解《春》这篇文章时,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并列式的结构方式;又可以通过《雨的四季》这篇文章,使学生对“总分总”的结构有更清晰的认识;抑或通过文章《白杨礼赞》的分析,来学习其先抑后扬的独特结构……如此一来,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多种具体的结构安排方式,体味各种方式的布局谋篇。课后也可以指导学生根据某个主题做“列提纲式”训练,进一步将心中所想、运用所学化为笔尖的表达,逐步提高其谋篇布局能力,促进其读写能力的转换。

其次,详略的安排也是整个成篇训练中需要关注的要点。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同样需要指导学生关注并学习文章的详略布局,“哪些部分要详写”“哪些部分可以略写”“为什么要详写”以及“如何详写”。比如通过《阿长与〈山海经〉》《秋天的怀念》等多篇文章的学习,引导学生理解详略叙述的要义及作用,学习详略安排的方法。之后给以某个主题及素材,让学生构思时考虑应该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从而不断提高其在写作中详略得当、主次分明的意识,进一步促进其雕饰文章的功力,进而更好地促进其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

再者,写作的顺序也是需要学习借鉴的部分。叙述一件事时,先叙述什么,后叙述什么都要有一定的顺序。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来安排,也可以按照空间转换的顺序来安排,同样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叙,如此等等。通过文章来学习具体的写作顺序更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成效。比如,通过《雨的四季》《再塑生命的人》《猫》等文章的分析,可以学习按时间展开故事的方法;通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的学习,可以分析

空间转换的具体运用方法……同样可以通过具体文本来学习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记叙顺序,在学生头脑中储蓄丰富的记述写作方法,形成相关的知识框架,并进行一些相关的成篇练习,从而将其内化为学生自觉的思维意识,转换为切实可行的书面表达能力,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

以阅读为基础,以写作为升华,从句的组织到段落的连缀,再到整个篇章的布局,一步步指导学生学会合理地进行语言表达,不仅可以使学生从阅读中学到的知识与技能逐渐在写作中得到运用,而且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切实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基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紧密联系,进而提高学生合理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这是语文教学的真谛,也适应了学生学习的规律,是较为理想的教学方式。当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共同探索与尝试,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 小说选文的比较分析

刘玉婉 吕华亮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 目前,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而不同版本的选文对比研究,还有广阔的开拓空间,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阅读板块中的小说选文就很值得关注。从选文概况、编排方式的特点、助学系统的设置和教学考量等因素,对高中语文(必修)两个版本教材的小说选文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看到二者各自的特点,也可以体现两本教材编选者在选文过程中按照“新课标”对语文课程的教学要求,为突出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色做出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 高中语文; 教材; 人教版; 苏教版; 阅读板块; 小说选文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65-09

目前,各地使用的高中语文教材存在人教版、苏教版、鲁教版、语文版等不同版本,同时部编本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其中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对它们的对比研究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曲阜师范大学 2011 级教育学硕士李娜的论文《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比较》,对两版教材的整体结构、编排方式、单元组织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继之比较了二者阅读部分选文的整体特色。南京师范大学 2014 级教育学硕士刘艳霞在其毕业论文《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选文系统比较研究》中,对选文教学系统的编排、篇目、时代分布、空间分布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指出两版教材的教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上述研究确实体现了两版教材的特点,然而,一些细部的异同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综上所述,本文选择这个论题,旨在克服过往研究中存在的大而化之的偏差,尝试从细部的异

同体会教材编选者的良苦用心,为此类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角度。

一、“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概况

1.“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概况

“人教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编写而成。其编排体系分为四大板块,即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阅读。阅读鉴赏板块包含精读及自读范文,表达交流板块分为口语交际和写作专题,梳理探究板块设置梳理归纳和专题探究,名著阅读板块未有细化,我们所研究的小小说选文包含在阅读鉴赏板块中,大致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收稿日期] 2019-12-13

[作者简介] 刘玉婉,女,安徽蚌埠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吕华亮,男,安徽寿县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表1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分布概况^[1]

册数 单元	必修一	必修二	必修三	必修四	必修五
第一单元	情感与意象 (现代诗歌)	情趣与理趣 (中外抒情散文)	人物与环境 (小说一)	性格与冲突 (中外戏剧)	情节与语言 (小说二)
第二单元	提要钩弦 (古代叙事散文)	含英咀华 (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歌)	感受与共鸣 (唐宋诗)	情思与意境 (宋元词曲)	披文入情 (古代抒情散文)
第三单元	品人与品文 (记叙散文)	情景交融 (古代抒情散文)	质疑解难 (古代议论散文)	理清思路 (社会科学论文,随笔)	融会贯通 (文艺学论文)
第四单元	博观约取 (新闻、报告文学)	对话与交流 (演讲词)	启迪与想象 (科普科幻作品)	知人论世 (古代人物传记)	概括与归纳 (自然科学散文)

由表1可以看出,首先,“人教版”教材涉猎较广,符合新课程标准时代性和人文性的要求。其次,人教版教材的选文严格遵循文章的体裁特点,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每一单元选取同一类型的文体,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接续性。再次,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的教学重点是人物、环境、情节与语言等。例如,必修三中《祝福》《林黛玉进贾府》《老人与海》的选入具有代表性。而在必修五中又选入了《装在套子里的人》《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边城》。从这6篇小说选文可知,在时间跨度上,都是20世纪左右的作品;在作家地域上,《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其余4篇则是我国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小说代表作品;在小说的主

题上,选取的中国小说主题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以及对人所处境遇的感慨和无奈。选取的外国小说主题则是对学生进行一种生命教育观的展现。

2.“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的选文概况

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又十分有价值的课题,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即重视工具性,突出人文性。各教材版本虽有不同但都应体现这个基本属性。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分为5个模块,每册为一个模块,均有4个专题。专题以话题为序,其中包括“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主线(如表2、表3所示)。

表2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选文概况^[2]¹⁴⁰

	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	语文文化
必修一	向青春举杯	获得教养的途径 月是故乡明	像山那样思考	——
必修二	珍爱生命 (小说选文)	和平的祈祷(小说选文) 历史的回声	——	慢慢走,欣赏啊 (小说选文)
必修三	号角,为你长鸣 (小说选文)	文明的对话	——	语言,存在的家园 寻觅文言津梁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小说选文)	——	笔落惊风雨 走进语言现场
必修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	直面人生	科学之光 心连广宇	——

表3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概况例举^[3]

序号	篇目	作者	国别	年代	册数
1	《最后的常青藤》	欧·亨利	美国	19世纪	必修二
2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肖洛霍夫	苏联	20世纪	必修二
3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海因里希·伯尔	德国	20世纪	必修二
4	《林黛玉进贾府》	曹雪芹	中国	18世纪	必修二
5	《祝福》	鲁迅	中国	20世纪	必修二
6	《品质》	高尔斯华绥	英国	20世纪	必修三
7	《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	雨果	法国	19世纪	必修四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编写方式以专题的方式展开,每个专题又有具体的划分,使我们能够清晰看到苏教版教材的整体构造,就其编写特色而言,该教材是以人文话题统领专题,以促进学 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比如,由表 2 可以看出每一个必修专题都是以“人文”开头,继而统领下面各个专题,小说选文也遵循这一特点,引导学生进行 学习,对文本知识进行探讨,加强与学生生活和社会 生活的联系;表 3 中介绍了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在节选、国别、地域方面的不同,这些选文的目的是丰富学生的人文感受。

二、“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的选文比较

1.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情况及小说选文的占比分析

表 4 呈现了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数量的比较情况。由表 4 可知,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在文学作品的选文总量上占据优势,现当代文学选文占比更胜一筹。表 5 表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小说共有 6 篇,苏教版的小说共选入 9 篇,在总的篇幅上苏教版更具优势。但是,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小说选文所占的比重都较少,人教版小说选文占总体选文的 6%,苏教版小说选文占总体选文的 7%。虽然占比较少,但选文仍遵循了经典选文的原则。

表 4 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数量比较^[4]

类 别 版 本				
	古代文学(篇)	现当代文学(篇)	外国文学(篇)	总计(篇)
人教版	42	23	14	79
苏教版	37	47	29	113
合计	79	70	43	192

表 5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比较

版本	册数	单元(专题)	篇目
人教版	必修三	第一单元	《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
	必修五	第一单元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边城》
		珍爱生命	《最后的常青藤》《说书人》
苏教版	必修二	和平的祈祷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慢慢走,欣赏啊	《祝福》《边城》《林黛玉进贾府》
	必修三	号角,为你长鸣	《品质》
	必修四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

由表 4、表 5 可以看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 6 篇小说选文都是必读选文,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 9 篇小说选文其中的 7 篇是必读选文,《说书人》和《边城》为选读选文。而从两个版本教材选取的共同篇目——《祝福》《林黛玉进贾府》《边城》来看,对《边城》这篇小说选文,两版教材的教学要求有所不同:在人教版中该篇小说是必读篇目,在苏教版中是选读篇目;两版教材为其设定的教学目标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人教版教材要求是从三维目标出发,通过学习这篇小说,要求培养学生语言赏析能力,使学生认识作品中“翠翠”“傩送”等人物形象,并在鉴赏湘西的风

土人情上学习作品的叙事笔调,感受边城的美景、风俗和人情美。而苏教版教材的教学任务中仅将该文作为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选文,不做具体的教学要求。

2.两版教材编排方式与选文来源对比分析

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在小说选文的编排方式上也有所差别,人教版教材按照分类的方式进行编排,条理清晰,自成体系。而苏教版教材则是以专题为基本结构组织编写,旨在突出主题思想。

(1)人教版教材的编排方式和选文来源。人

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共有5册必修教材,每一册必修内容分为“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以及“名著导读”4个部分。在这四部分中,每一部分又下设4个单元,每一单元都有“单元提示”“精读、略读课文”“研讨与练习”3个部分。小说选文属于“阅读与鉴赏”部分。我们所研究聚焦的小说选文出自必修三与必修五,人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均出自权威出版社,可见选文注重经典性。如必修三第一单元,《林黛玉进贾府》选自小说《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祝福》选自《彷徨》(《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老人与海》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同样在必修五的第一单元,《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节选自《水浒》七十一回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第十回,是清初金圣叹的删节本);《装在套子里的人》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边城》节选自《边城》(《沈从文选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人教版教材的选文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好地促进学生多元、开放思维的培养。人教版教材选文在本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比重分配上也较为合理,对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交流与促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2)苏教版教材的编排方式和选文来源。苏教版教材也包括5册必修教材,其最大的特点是选文的文本组合注重现实境况,贴合个人自身,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每册必修教材都有4个专题,其每一个专题都由“专题名称”“导语”“学习板块”“积累与运用”“写作”等部分构成。苏教版教材以专题为基本结构编写,突出整合的思想,其内容组织不分时代、体裁、题材,而将文本编辑到一起进行讨论,增加了其广域性,也为我们的小说研究带来了新意。苏教版教材中的小说编排,如在必修二的“珍爱生命”专题中,有《最后的常青藤》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和平的祈祷”专题中《流浪人,你若到斯巴……》选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黄文华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在“慢慢走,欣赏啊”专题中,《祝福》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边城》选自《沈从文小说选》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林黛玉进贾府》选自《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这一专题中还包括了其他文学体裁的篇目,如《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金岳霖先生》《亡人逸事》,这4篇是散文体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教版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文体的整合。细观其小说选文篇目的选择,苏教版教材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侧重选取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比如《红楼梦》片段的选取。同时对于另外两个短篇小说的选取,则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的个性化,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样在必修三的“号角,为你长鸣”专题中,《品质》选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必修四的“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专题中的《一滴眼泪换一滴水》选自《巴黎圣母院》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小说选文的选入都体现了语文教材综合性的编排理念。

可见,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教材,对于小说的选入都注明了具体出处,篇目无论是节选还是全选,均有标注。两版教材都十分注重选取经典篇目,但是在选入国外小说作品方面,人教版略逊一筹,仅收入《老人与海》《装在套子里的人》两篇小说,侧重以生命教育为主题。而在苏教版的必读篇目中除了《林黛玉进贾府》和《祝福》外,所选都是外国小说,都是以“人”为中心对学生展开的生命情感教育。所以通过两版教材选入的小说选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在选文方面,人教版教材坚持传统,继承经典;苏教版教材则吸纳广阔,继往开来,各具优势;但从总体上看,两套教材小说篇目的选择数量总体还是偏少,建议适量增加小说选文的比重。

3.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的单元设置比较

(1)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单元设置。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设置在“阅读与鉴赏”部分。每册教材在“阅读与鉴赏”之下都分设4个单元,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文学体裁来设置,以“必修三”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单元设置的特点,如表6所示。

表 6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必修三小说单元选文举例^{[5] 1-2}

单元	文体	作者	课文
第一单元	小说	曹雪芹	《林黛玉进贾府》
		鲁 迅	《祝福》
		海明威	《老人与海》
第二单元	诗词	李 白	《蜀道难》
		杜 甫	《秋兴八首》《咏怀古迹》《登高》
		白居易	《琵琶行》
		李商隐	《锦瑟》《马嵬》
		孟 子	《寡人之余国也》
第三单元	文言散文	荀 子	《劝学》
		贾 谊	《过秦论》
		韩 愈	《师说》
		周立明	《动物游戏之谜》
第四单元	科普科技文	卡尔·萨根	《宇宙的边缘》
		加来道雄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在表 6 中,可以看出各个单元的设置以及所对应课文的类别、体裁。人教版教材必修三小说单元教学要求是着重欣赏人物形象,注意情节、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深入分析小说语言和人物性格特征,感受不同作者的创作风格。同样必修五小说单元的教学要求是要注意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节,要理解作品蕴含的感情,分析作者意图,要从

人物、情节、环境这三点进行分析。两版教材关于小说的教学重点都是在强调学生对于小说三要素的把握。

(2)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单元设置。苏教版教材的单元设置是专题形式,以“必修二”为例,如表 7 所示:

表 7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必修二小说单元选文举例

专题	珍爱生命	和平的祈祷	历史的回声	慢慢走,欣赏啊
课文	史铁生 《我与地坛》	[苏联]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苏洵 《六国论》	朱自清 《荷塘月色》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节选)
	[美]欧·亨利 《最后的常青藤叶》	[德]海因里希·伯尔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杜牧 《阿房宫赋》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
				孙犁 《亡人逸事》
	[美]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选)》	[德]安妮·弗兰克 《安妮日记》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曹雪芹 《林黛玉进贾府》
	[美]劳伦斯 《鸟啼》		朱启平 《落日》	鲁迅 《祝福》
			《勃兰特下跪赎罪受到称赞》	沈从文 《边城(节选)》

由表7可见,苏教版教材并不着重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每一个专题涉及多个文学体裁,同时古今中外文学也多有选入。总体看,在苏教版教材中,必修二、必修三、必修四这3册教材均有小说的编入,但必修二中更为偏重。同时在此专题中还包括其他体裁的选文,虽然在设置中不如人教版教材中小说的选文突出,但是也给此类专题添加了色彩,比之人教版教材单元设置的传统性,苏教版教材单元设置更具灵活性。苏教版教材的小说单元不够具象,多是在综合的专题中有所体现,其小说教学要求也是对于小说三要素的把握,注重人物、情节、环境的分析,引导学生注重小说语言的表达以及叙述方式的学习。总之,人教版与苏教版教材中小说选文的单元设置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

4.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助学系统的比较

语文教材中助学系统是重要的一个学习辅助工具,王玉辉先生认为,“助学系统是人们对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的认识提高的产物”^{[6]73}。人教版教材持“守正出新”的教学理念,而苏教版则是以“人文话题”为统领,并下设各个专题,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由于两版教材选文的理念不同,助学系统也各有不同。

(1)两版教材小说选文的助学系统的特点。其一,人教版的开篇题词“致同学”栏目以书信的形式展开,总体阐述模块内容与学习方法;苏教版的以主题词的形式呈现,给出建议。其二,目录形式不同,人教版以单元展开,苏教版以专题形式呈现。其三,单元(专题)导语各异。人教版介绍本单元体裁、所学内容和语言特色,单元体裁统一,便于教学的系统性。苏教版概括主题内容与思想内涵,穿插不同的体裁篇目,与人教版统一性的编排不同,更具灵活性。其四,选文注释的方式基本相同;其五,插图设置各具特色。两套教材在色彩的运用中有一定的差别,如人教版教材中《祝福》一课的插图,描绘祥林嫂形象采取的是以淡黄色作为底色,素笔勾勒,形神兼备地展现了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形象。苏教版则采用黑白色调,祥林嫂右手拄着一根木棍,左手挎着篮子,步履蹒跚,头发花白,身形佝偻,同时在人物刻画背后黑色占据主体,略有留白来反映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这一黑一白绘图手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两版教材人物刻画明显不同,描绘的是不同时期的祥林嫂形象,学生的直观感受也不同;其六,人教版的“旁注”补充用于选文中知识的拓展,苏教版的

“对话栏”则用于解读语句段落。

综上所述,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的助学系统的不同特点,显示了助学系统的丰富性,为今后语文教材的完善提供了多种可能。

(2)两版教材小说选文作业系统的比较。作业系统看似和助学系统独立分开,其实是对助学系统的补充。我们不妨对比两个版本教材所选的共同篇目《林黛玉进贾府》来探讨二者的主要练习目标。

从课后作业系统来看,二者的目标各不相同:

人教版对这一篇题目布置的作业是:

研讨与练习

……

2.同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出场有什么不同,作者介绍这两个人物各用了什么艺术表现手法?

3.品味下列的语言,分析他们的不同身份和性格。

王熙凤:

……

(2)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

4.参考下面的资料,以“话说贾宝玉”为题,谈谈你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

……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5]12}

苏教版的作业目标是:

文本研习

……

2.下面是清人脂砚斋对王熙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出场做的评点,你同意他的见解吗?请说说你的理由。

……

林黛玉出场:

奇眉妙眉,奇想妙想。奇目妙目,奇想妙想。

积累与应用

……

2.脂砚斋评点“林黛玉进贾府”有“总借黛玉一双俊眼中传来”之语。阅读《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进荣国府”、第三十九至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将它们和本文进行比较,讨论交流不同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不同的生活风貌,人情世故。^{[7]126}

从上述作业设置可以发现:其一,人教版教材设置了四个大题,苏教版教材则是三题,这是量的差别。其二,两版教材作业的共同之处是都注重让学生通过人物的具体表现深入理解人物性格,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挖掘作品细节。但人教版教材比较重视对文本的开掘,着力点在引导学生把握作家的写作手法上。苏教版教材着眼于拓展学生的视野,更加注重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体现出文学阅读感悟的多样性特质。人教版教材则注意技巧的把握付度,讲求循序渐进。后者锐意出新,注意经典的加入,注重学生思维发散的培养,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个性。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今后语文教材编写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5.两版教材对新课标的吻合程度比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对语文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实施建议、附录等方面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4年版)(以下简称“原课标”)有较大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表8看到二者的区别。

表 8 两个课程标准的比较

课标 内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8] 1,3,7,14,15 (2004年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9] 1,4,8,11,41,54 (2017年版)(原来基础上的新增或删减)
课程性质	1.语文作为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2.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1.新增了对课程性质、特点及育人功能的阐述 2.注重发展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课程理念	1.注重学生的语文素养 2.促进学生个性能力发展 3.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	1.坚持以道德育人 2.以核心素养为中心,促进课程教学的革新 3.注重学习方式的多样兼具实践性 4.构建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
课程结构	1.必修课程依据“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目标,组成“语文1”至“语文5”5个模块 2.选修课程设计5个系列: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	1.新设了选择性必修课程 2.以学习任务群的形式展开,每个部分分别安排7-9个学习任务群 3.突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始终贯穿教材
课程目标	学生应该在以下5个方面获得发展:“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思维·拓展”“发现·创新”	1.语言的凝聚 2.语言表达与交流 3.语言梳理立与整合 4.形象思维能力提升 5.发展逻辑思维 6.思维品质改善 7.促进祖国对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 8.欣赏文学作品 9.美的表达与创造 10.传承中华文化 11.理解多样文化 12.关注、参与当代文化
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2.评价建议: 制定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评价体系。(1)通过学习情境的创设,开展新的学习方式;(2)教学方式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3)要求教师的能力与课程开发与设计共同发展	1.教学建议: (1)通过创设情境,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2)教学方式要与时代贴近;(3)教师的能力要与课程共同发展 2.评价建议: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更具广延性 3.增加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命题建议、地方和学校实施本课程的建议
附录	略	1.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增加至72篇,课内外读物强调文化经典著作、古代小说、古代剧本等的阅读 2.课内外读物更加广泛

我们所研究的两个版本的教材,是在原课标指导下编写的,那么,它们与新课标要求的吻合程度到底怎样呢?以小说选文为例,我们可以略加探讨。

(1)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两版教材的小说选文的共同之处是都本着继承经典、弘扬传统的宗旨,选择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助于继承传统文化,促进经典永流传,注重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教学目标的深入,基本符合新课标课程理念和课程性质的要求。

两版教材都注重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呈现:在人教版小说选文中《老人与海》《装在套子里的人》向我们呈现的是两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塑造了“硬汉形象”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守法良民”形象;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品质》都是反映人文性的经典篇目。两版教材的不同之处各有侧重,但二者都坚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人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坚持“守正出新”,在6篇小说选文中,有4篇是中国小说。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则继往开来,对于新思想的接收面广,外国小说选文占比较大,选文的范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小说,都具有时代意义,如外国小说选文多选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2)对照新课标的教学理念、目标和教学建议,两版教材均有需要完善之处。新课标更加注重构建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重视创设综合性学习情境,注重在语文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合作探究性。目前这两版教材在小说选文上,还需要进一步向新课标靠拢,课后练习系统仍需改进。从上文的诸多对比可见,苏教版教材在选文的覆盖面和课后练习系统的设置上与新课标要求吻合度更高。

三、“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的缺失比较

1.教学方面考量的缺失

对于教学的考量,我们将从以下3个方面来对两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在教学层面的缺失进行比较。

(1)编排方式。人教版教材是以文学的体裁为线索来组织编写的,首先,将同样类型的篇目放置于一个单元进行教学,这种编排其实并不利于知识的传授,可能使教师在讲授时,形成固化的教学模式,缺少对小说之间的差异性的分析,也会使学生在学学习时缺少新鲜感,在之后的复习中可能

只是进行重复性的阅读;其次,教师对于节选部分的小说,也会很难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部分的节选,仅仅说明了林冲被奸人所害以及后来被逼上梁山的情节,对于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说不够全面,没能将林冲前期的英勇豪迈、意气风发表现出来,对于人物形象的层次性表现不够,容易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形成偏差;最后,小说选文虽具有典型性,但缺失广泛性,所以要注意小说选文量的增加。

苏教版教材是以专题形式编写,专题下设各篇课文,如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中《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品质》《老王》《离骚》这5篇课文中,就涉及不同体裁的选文,有文言文、小说、散文、诗歌,涉及面很广,所以教师在进行具体的小说教学时,很难对其进行系统把握,学生在学习时,面对多种文体可能也会出现学习重心的偏离。同时也存在小说选文篇目较少,受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所以应增加小说选文的数量,使小说编排更加合理。

(2)单元设置。人教版教材的小说单元设置都有单元导语来进行指示分析,介绍本单元学习的重难点,这容易使很多教师的教学停留于书本提示,拓展度不够。人教版教材的单元设置重视对于小说文体特征的总体把握,忽视了不同小说篇目的独特风采,如在单元导语中,介绍小说教学的重心,强调时间、地点、人物,但并未就具体的篇章给出教学和学习要求。在教学中,《林黛玉进贾府》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两者的教学侧重点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对人物描写着墨较多,后者则对具体的情节有详细的刻画,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把握。所以单元导语的设置应是灵活多变的,这才能适应不同的教学和学习要求。

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则是分布在不同的专题当中,如必修四“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这一专题中的小说选文《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专题与主题相对应,但是弱化了小说主题思想的多元性特征,会给读者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利于教学的开展,容易造成教学模式化,教学脱离时代步伐,使学生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再比如,除必修二的单元设置中对小说有所提及,其余必修教材和专题涉及甚少,所以能够看出,教材对于小说教学重视程度不够,课程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

(3)助学系统。助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在前文中我们也具体介绍了两版教材助学系统的差别和共同之处,但是如果把小说选文放到教学中来考量的话,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人教版教材小说单元注释和标题导语往往能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但有时也会使教师陷入一种固有模式中,以《边城》一课为例,按教材的编写格局,教师在教学时先引导学生了解写作背景后再对小说进行分析,必然带着固定的思路,教学效果可能不够理想。研讨与练习环节,教师如果仅是从文本片段出发,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助学系统与之无异,只是在最后的课后练习部分加入单元性的总括学习,分为“活动体验”“问题探讨”“文本研习”,比之人教版教材,更重视学生学习环节,但是,插图导语环节却又略逊一筹,不够细化,不够简单明了,应加以关注,合理改进。

总的来说,把两版教材的小说选文放在教学层面考量,都有较为明显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教师教学的模式化。同时小说选文篇目较少,课程设计目标不够突出。因此,我们建议,教材选文要兼顾经典与时代性,适当增加小说选文的数量,促进教学方式的改变,教师的教学思维要不断改进,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对小说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注重对小说的价值分析。

2. 学生学习方面考量的缺失

对于学习者而言,两版教材的选文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1)知识与能力。人教版教材强调关注小说的人物、环境和情节,体现出对于小说文体共性的重视,可从教与学的双重视角来看,可能会将之作为知识去把握。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小说文体的学习,要注意提升学生理解、领会这种文体的能力。如在小说《祝福》中,祥林嫂是怎样被一步步逼着消逝了生命,那种生存背景下普遍存在的女性的悲剧,值得我们深挖学习,这绝不是通过一些知识的把握就能实现的目标。苏教版教材关注专题,注重对学生主题分析能力的培养,其缺失在于忽视了小说文体的特点。在同一专题下,往往弱化了小说的多义性特征。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小说选文看,人教版教材注重传统,苏教版教材注重现代品格。但无论如何,小说的学习都有助于学习者情感态度

的形成和价值观的转变。所以,选取不同地域、风格多样的小说选文,才能使学习者体会多样的情感,在人类的多种故事框架中,形成明确的价值标准。比如《老人与海》中那种直面挫折、坚强勇敢、永不言弃的精神,对于学生必然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边城》中展现的纯净与质朴,可以荡涤现实的喧嚣与功利,让学生理解另一种人生况味。

学生是学习主体,人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编排以及助学系统的思路,对于学生的参与性学习的重视有待加强,在这一层面,苏教版教材展现了优势;而在学习的接续性上,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具有整体的连贯性,易于让学生把握小说的文体特征,苏教版教材则比较分散,体系性略差。人教版教材坚持传统与创新并举,苏教版教材重树人、重学效,二者都为我们提供了教材编写的一种思路。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人教版和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各有所长,但相对而言,人教版教材总体上人文性不足,而苏教版教材在单元设置中缺少体裁的系统性。两套教材在小说篇目的选择上不够具体广泛。所以,二者的交相融合,可能是语文教材编写的较好格局。希望今后语文教材中小说篇目的数量可以适当增加,以帮助学生涉猎更多的小说作品,更好地提升学生小说阅读鉴赏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张佩林.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阅读板块的比较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 [2]徐祥林.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 [3]胡倩倩.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小说选编对小说教学的影响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 [4]涂盈盈.两套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古代选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 [5]袁行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必修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6]王玉辉.中小学教学新大纲及教材分析:中学语文[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
- [7]丁帆,杨九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必修二[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4.
-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晨 晓)

辞格的游戏和游戏的辞格

尹 群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游戏是人类以追求精神愉悦为目的的一种活动,游戏可以分为语言的游戏和非语言的游戏,辞格游戏是语言游戏的重要门类。汉语丰富的辞格游戏催生了独具汉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许多集趣味性、文学价值于一体的游戏文学、游戏文体。汉语辞格游戏源远流长,是与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 辞格; 语言游戏; 辞格游戏; 游戏文体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74-07

一、游戏与语言游戏

人是游戏的动物,人需要游戏,人在游戏中生存,游戏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荷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 1872—1945)在《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中说:“你可以拒绝严肃,但却无法拒绝游戏。”^[1]游戏是生命的一种本能,“无论我们怎样待它,游戏具有某种意义的这个事实,都意指该行为本身中的一种非实利主义的特性”。^[1]

游戏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游戏”指“娱乐活动,捉迷藏、猜灯谜等。某些非正式比赛项目的体育活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2]¹⁵⁸⁷广义地看,人类的许多活动,几乎一切活动都有游戏的成分。

从语言的角度看,游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文字的游戏,一类是非语言文字的游戏。放风筝、扔沙包、抽陀螺、踢毽子、打弹珠、斗蟋蟀、滚铁环、捉迷藏、骑竹马、剪窗花等都是非语言游戏。非语言游戏有时会与语言游戏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不管语言游戏还是非语言游戏都取决于人的思维方式。比如,在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既没有老鹰,也没有小鸡,充当老鹰和小鸡的人(大人和孩子),只是同老鹰和小鸡具有某种相

似性而已。我们也可以说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是建立在比喻格之上的,是广义的比喻格。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人与人交际的媒介。但有的时候,语言只是被用来满足人们的娱乐心理,这就是语言游戏。人们喜欢并擅长游戏自己的语言,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

(1) Can you can a can as a canner can can a can? (你能够像罐头工人一样装罐头吗?)

(2) I think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student wrote on the blackboard was wrong. (我认为那个学生写在黑板上的那个“that”是错误的。)

(3) となりのきやくはよくかきくうきやくだ。(隔壁的客人是个爱吃柿子的客人。)

例(1)例(2)是两则英语绕口令,例(3)是一则日语的绕口令,读起来都佶屈聱牙,如果从表意角度、语用角度出发,它们均为不合格的句子。但这三则例子,很多外语学习网站都有,首要目的是用游戏的方式让外语学习者练习他们不熟悉的语言,其次当然是让人在游戏中获得快感。

历代中国文人喜欢玩高雅的文字游戏,李佳琪从汉字娱乐功能的角度把游戏分为“字形游戏、字音游戏、字义游戏、字序游戏”四类^[3]。现代很多网络用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

[收稿日期] 2019-07-19

[作者简介] 尹 群,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果,而只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游戏语言的心理。例如:

(4)你真是丧(gan)心(de)病(piao)狂(liang)!

(5)你怕是石乐志!(谐音:失了智)

(6)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例(4)看似不明说,但又在括号里标出真实想法,括号内外词语的意义反差更是凸显了说话人强烈的爱憎。这是一度非常流行的网络新格式,是一种书面游戏。例(5)是传统的谐音在网络语境中的重现。每天都有大量的网络词语在使用,其中谐音词占了很大一部分,汉语同音词多的特点给谐音格的广泛持久使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例(6)表达了对过分母爱的一种无奈。这种格式被高频仿拟,可表达多种多样的意义。

语言游戏还催生了一些流行语,比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油你涨”“煤超疯”等,调侃一段时间内价格涨幅过大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变异了谐音格。其他如“蓝瘦、香菇、猴赛雷、凹凸曼、怪蜀黍”等谐音词,与其说是为了取得追新求异的表达效果,不如说也是一种全民参与的语言游戏。

流行的“XX体”,也是一种语言游戏,通常用来调侃某种怪异的或出格的文风。如“梨花体”,调侃其过于口语化;“知音体”,调侃其标题过于煽情;“羊羔体”,调侃其过于直白而混乱;“琼瑶体”,调侃其过于烦冗反复,矫揉造作^[4]。每一个“XX体”出现,网络立即会出现大批仿拟之作,这些仿拟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强,只是网民娱乐自己、娱乐他人的一个工具。游戏是人类的本能,语言游戏是重要的游戏品种,充分运用语言的特点来娱乐,是人们游戏心理的一种反应,也是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的人类的必然选择。

二、辞格的游戏和游戏的辞格

1. 辞格游戏

辞格即“修辞格”,也叫作“修辞方式”。第一位给辞格下定义的当属唐钺,他在《修辞格》一书中说: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效力,不用通常的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这种地方叫作修辞格(又叫语格)^[5]。此后又有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给辞格下定义,如:

(1)辞格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而运用的一

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6]41。

(2)辞格也称“修辞格”“修辞方式”和“修辞格式”,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形成的各种修饰、加工语言的特定格式^[7]191。

(3)修辞格,简称“辞格”,也称“语格”“辞藻”“藻饰”“辞式”。它是在修饰、调整语言,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中形成的具有特定表达作用的和特定表达形式的特殊的修辞方式或方法,如比拟、借代、析字、顶针等^[8]41。

(4)辞格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之后,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9]14

定义(1)明确指出辞格的产生源于对生动有力的表达效果的追求。定义(2)出自国内最通行的高校教材之一——黄廖本的《现代汉语》。定义(3)来自国内较为权威的语法修辞词典《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定义(4)是代表当代修辞研究集大成的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中给辞格下的定义,这几个定义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强调了辞格的表达效果。除了王希杰先生较多关注到语言的游戏功能,大多数修辞学著作均更看重修辞格的一般功能、主要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辞格的游戏功能。20世纪五十年代的修辞学论著中,往往排斥、排除一些辞格,指责说是旧文人的文字游戏的工具,例如:镶嵌等。在革命至上、革命与游戏对立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游戏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不可低估的。修辞格的游戏功能同样是不可否定的,也不应当低估的。游戏是人类以追求精神愉悦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辞格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特定范式,两者看似不相关,实则关系密切。游戏是辞格的“孵化器”,辞格是游戏的内容与手段,有些辞格甚至直接推动了游戏的产生。比如顶针格就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接龙游戏,如成语接龙、诗词接龙等。如:

相见恨晚→晚生末学→学贯天人→人面桃花→花貌蓬心→心口如一→一双两好→好梦成真→真假难分→分庭抗礼→礼贤下士→仕女如云→云谲波诡……

汉语的成语数量极其巨大,因此,成语接龙的每一步大都具有多种可能。例如:

仕女如云→云泥之别→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别无一致、别有用心、别有风味、别具只眼、别具匠

心。

仕女如云→云散风流→流星赶月、流离失所、流金岁月、流金铄石。

仕女如云→云蒸霞蔚→蔚为大观、蔚然成风、蔚为大观。

这些成语孤立地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的组合却没有意义,“相知恨晚+晚生末学”“晚生末学+学贯天人”“学贯天人+人面桃花”等,两个成语组合并没有构成一个更大的语义单位,不是一个句法语义结构体。它们仅仅依靠首尾相同的词素链接在一起。这种语言形式喜闻乐见,但它们的存,其主要目的不是传递某种信息,不是为了语言表达更准确、更生动、更形象,也不是为了让语言更加得体,而是出于单纯的游戏的需要,目的是娱人娱己,营造气氛,协调关系。成语接龙、诗词接龙还可以培养智力,丰富知识,提高修养。这种利用某种修辞格式来进行的语言文字游戏就是辞格游戏。

2. 游戏的辞格

几乎所有的辞格都可用于语言游戏,比喻、双关、仿拟、对偶、夸张等常见辞格都可用于游戏,有些辞格更是与游戏有不解之缘,拗口、镶嵌、回环、拟误、别解、析字等修辞格,以及上文提到的顶针格,都与游戏关系密切。

(1) 拗口格。说话写文章讲究流畅,朗朗上口,切忌拗口,拗口发音难,听起来不顺。故意拗口的,可叫作拗口格。拗口格可以说就是为游戏量身定做。拗口格属于字音游戏,是利用汉字的字音来设计的语言游戏。例如:

[a] 疏杉低通滩,冷鹭立乱浪。草彩欲夷犹,云容空澹荡。

(皮日休《双声溪上思》)

[b] 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

(梅尧臣《五仄体舟中夜与家人饮》)

例[a]四句,全用双声字。例[b]八句,全都是仄声。故意拗口,可叫“拗口诗”。再如拗口对联、拗口儿歌:

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

娃挖洼出瓦,妈骂马吃麻。

麻妈妈骑马,马慢,麻妈骂马;牛妞扭牵牛,牛

拗,牛妞扭牛。

运用拗口格进行游戏的言语产品就是绕口令。绕口令不仅仅是属于汉语的,也是属于世界上其他语言的。

(2) 镶嵌格。镶嵌就是“把物体镶入另一物体内部或围在另一物体的边缘”^{[2]1431}。原始人的艺术活动是从自己的身体开始,把某些物体镶嵌到自己的嘴唇、鼻子、耳朵、手臂等处。现代人的耳环、耳坠,也是镶嵌的艺术。这些镶嵌是非语言的。修辞学中的镶嵌格则是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镶嵌常用于游戏。关汉卿《望江亭》,谭记儿和白士中一见钟情,谭记儿咏诗:

愿把春晴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风兮句,去妇当归卖酒家。

镶嵌的四个字是:“愿随君去。”白士中咏诗:

当垆卓女艳如花,不记琴心未有涯。负却今宵花底句,卿须怜我尚无家。

镶嵌的四个字是:“当不负卿。”

所谓的药名诗、地名诗、人名诗都是镶嵌格的运用,如:

[a] 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疏磺。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掠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

[b]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吴承恩《西游记》三十六回)

例[a],镶嵌了“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硫磺、柏叶、桂枝、苻蓉(从容)、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藤、常山、缩砂(宿沙)、独活、续断、轻粉、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地黄、菊花”等二十六种中药。例[b],镶嵌了“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等九味中药。

(3) 谐音格

一——忆多娇、二——耳边风、三——散秋香、四——思乡马、五——误佳期、六——柳摇金、七——砌花台、八——壩陵台、九——救情郎、十——舍利子。

《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了一套数字隐语^{[10][113]},这套数字的创制就是利用了谐音辞格。造词者用这种近乎游戏的方式造出了这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数字表达方法。谐音格,也是语音的游戏

(4)歇后格。是故意省去短语或句子的最后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歇后格也常用于游戏。比如,章太炎著名的歇后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国之将亡必有妖”与“老而不死是为贼”是文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话,分别出自《礼记·中庸》和《论语·宪问》,章太炎故意省去最后两个字“妖”“贼”,以引导读者用猜谜的方式联想出来,以退为进,达到充分嘲讽康有为的目的。

(5)析字格。是利用对汉字的字形加以变化来达到娱乐效果的游戏,属于字形游戏。这是汉语修辞的独特品种,是具有强烈游戏色彩的一个辞格。析字格是灯谜、字谜的主要创作手法。例如:

“四面不透风,一人在当中,若是猜囚字,其实没猜中”(囚)

“坐在水中,当怕水冲;放在水中,无影无踪”(盐)

“什么字,两个口?”(回或吕)

“什么字,三个口?”(品)

“什么字,四个口?”(田)

“什么字,五个口?”(吾)

人们还可以用析字格来创作对联,如:

[a]长巾“巾”内女子“好”,少女为“妙”;

山石“岩”中木古“枯”,此木为“柴”。

[b]迎送远近通达道;

进退迟速逗逍遥。

例[a],长+巾=帐,女+子=好,山+石=岩,此+木=柴。例[b],上下两联14个汉字,左边的部件都是“辶”。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世说新语》的一段记载: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于碑背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齏白”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

‘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齏白,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黄绢幼妇”采用的是析字格,一代奸雄都要行三十里才能明白的词语,当然不是为了传递和交流信息,而仅仅是一个考验他人猜谜能力的语言游戏。

(6)拟误格。说写者明知其错而故意利用错误的说法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的格式。拟误格又叫飞白。拟误格往往可以形成幽默的语言效果,《笑林广记》中有如下记载:

庸师惯读别字。一夜,与徒讲论前后《赤壁》两赋,竟念“赋”字为“贼”字。适有偷儿潜伺窗外,师乃朗诵大言曰:“这《前赤(拆)壁贼》呀。”贼人惊,因思前而既觉,不若往房后穿逾而入。时已夜深,师讲完,往房后就寝。既上床,复与徒论及《后赤壁赋》,亦如前读。偷儿在外叹息曰:“我前后行藏,悉被此人识破。人家请了这样先生,看家狗都不消养得了。”^{[11][15]}

同形异音异义的汉字多,语言学习和运用中都需要区别开这些多音多义汉字,而故意混淆同形异音异义的汉字,也是拟误格的一种。例如:

[a]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b]长长长长长长长;

长长长长长长长。

例[a]是山海关孟姜女庙里的对联。可读作: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长,常常长,常长常消。

例[b]据说是豆芽店里的对联。上联,一、三、五、六读若“cháng”。二、四、七读若“zhǎng”。下联相反,一、三、五、六读若“zhǎng”,二、四、七读若“cháng”。

(7)回环格。也是一个主要用于游戏的辞格。回环是一种常见辞格,是指词序的颠倒。“回环,就是重复前一句的结尾部分,作为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又回过头来用前一句的开头部分作为后一句的结尾部分。”^{[9][287]}把两个字词相同而排列次序不同的言语片段紧密相连,产生循环往复的意趣,体现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对立的关系。例如:“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语言的美和美的语言”等。汉语没有形态,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这是产生回环的肥沃的土壤。回环是最

能显示汉语特点的辞格。回环是汉人语言文字游戏的最爱。于是产生了回文文化、回文诗、回文词:如明代蒋一蔡《咏春》,“莺啼岸柳弄春晴晓月明”,这十个字按照前七后三的格式,可以读成一首用回环格写的诗。

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月明。明月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

这首踏春诗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其价值在于通过游戏愉悦了诗人和读者。回环绝品,苏惠的《璇玑图》也是如此。840个汉字,可以读出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诗歌3752首,的确是个奇迹,但其中并无多少好诗,它的价值和蒋一蔡的《咏春》一样在于游戏。

三、辞格的游戏和文学创作

辞格不仅仅可以用于日常的游戏,也可以用于文学创作。朱光潜说:“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12]57}“从民歌看,人对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普遍的。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一点。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对于文字游戏的成分不免轻视。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放在形式技巧上,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但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急’。就史实说,诗歌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一直引起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12]47-48}

[a]“老猫老猫,上树摘桃。一摘两筐,送给老张。老张不要,气的上吊。上吊不死,气得烧纸。烧纸不着,气得摔瓢。摔瓢不破,气得推磨。推磨不转,气得做饭、做饭不熟,气得宰牛。宰牛没血。气得打铁。打铁没风,气得撞钟。撞钟不响,气得老鼠乱嚷。”(朱光潜《北平歌谣》)

[b]“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塔前有座庙,庙里有老僧。老僧当方丈,土地六七名。一个叫青头楞,一个叫楞头青;一个是僧僧点,一个是点点僧;一个是奔葫芦把,一个是把葫芦奔。青头楞会打磬,楞头青会捧笙,僧僧点会吹管,点点僧会撞钟;奔葫芦把会说法,把葫芦会念经。”(朱光潜《北平歌谣》)

从修辞角度看,例[a]是句式反复。例[b]是顶针和列举分承手法。朱光潜说:“这种搬砖弄瓦式的文字游戏是一般歌谣的特色。它们本来也有意义,但是着重点并不在意义而在声音的滑稽凑合。如专论意义,这种叠床架屋的堆砌似太冗沓,但是一般民众爱好它们。正因为其冗沓。他们仿佛觉得这样团转自如的声音凑合有一种说不出的巧妙。”^{[12]46}朱光潜深刻地指出了这些民谣歌谣的创作意图不是表情达意,不是文以载道,而是以语音的巧妙配搭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快感。

除了民谣和儿歌,许多经典的小说里也有辞格游戏的描写:

陈淑媛道:“妹子刚才斗草,屡次大负,正要另出奇兵,不想姐姐走来忽然止住,有何见教?”紫芝道:“这斗草之戏,虽是我们闺阁一件韵事,但今日姐妹如许之多,必须脱了旧套,另出新奇斗法,才觉有趣。”宴耕烟道:“能脱旧套,那敢情妙了。何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紫芝道:“若依妹子斗法,不在草之多寡,并且也不折草。况此地药苗都是数千里外移来的,甚至还有外国之种,若一齐乱折,亦甚可惜。莫若大家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名,依著字面对去,倒觉生动。”毕全贞道:“不知怎样对法?请姐姐说个样子。”紫芝道:“古人有一对句对得最好:‘风吹不响铃儿草,雨打无声鼓子花。’假如耕姐姐说了‘铃儿草’,有人对了‘鼓子花’,字面合式,并无牵强。接着再说一个或写出亦可。如此对法,比旧日斗草岂不好玩?”^{[13]76}

《红楼梦》也有类似描写: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枇杷果。”^{[14]237}

闺阁里的姐妹们起初是以实花来斗,斗到后来,越斗越来劲,韵味愈斗愈浓。运用实物,采集百草来斗,是属于非语言的,加入了对偶格的斗草游戏既是一种比拼知识面的游戏,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对偶辞格的运用,增加了游戏的难度,也促进了游戏的精致与高雅。

宝塔诗也是辞格的游戏的产物。宝塔诗采用

的是递进格,是从唐代的“一七体”演变发展出来的。一七体,从一个字开始,逐步递进:二、三、四、五、六,直到七个字。底部宽大,顶部尖尖,逐层收缩,像等腰三角形。例如:

呆
秀才
吃长斋
胡须满腮
经书解不开
纸笔自安排
明年不请自来

(吴敬梓《儒林外史》)

这是递进格的运用。递进格,又叫“层递”,“就是采取阶梯式关系来排列句子,表达客观事物之间逐步发展的关系,常常是由浅入深,由小到大,从轻到重,从低到高,层层深入,逐次加码”^{[9]316}。

语言游戏是文人学士、才子佳人发挥想象力和聪明才智的大舞台,苏东坡一家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个中高手,正史野史都留下他们不少佳作。苏东坡曾仿拟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鼻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来嘲笑刘贡父。秦少游赞美苏小妹,写了一首怪诗,用“静思伊久阻归期忆别离时闻漏转”14个字构成的一个大圆圈,苏小妹答以“采莲人在绿杨津一阙新歌声漱玉”14个字构成的一个大圆圈,苏东坡见后提笔写了“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14个字构成的一个大圆圈。这三个圆圈上的字分别可读出三首七言诗来:

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
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

采莲人在绿杨津,在绿杨津一阙新。一阙新
歌声漱玉,歌声漱玉采莲人。

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
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三首诗歌都是顶针和反复的巧妙结合。比较而言,苏东坡的这个大圆圈的怪诗,可谓回文辞格游戏的绝品,形义俱佳,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才子佳人的语言游戏、辞格游戏。这些以游戏为主要目的,巧妙运用语音、语形、语义、语序的特点创作出的文本样式可以叫作“游戏文体”,“游戏文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拗口诗、回文诗、藏头诗、宝塔诗、灯谜、字谜均可以称

之为“游戏文体”。

除了文人雅士、才子佳人,普通人也喜欢语言游戏、辞格游戏。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是仿作的极好版本,时下仿作极多。例如:

术不在高,能吹则名;业不在精,会唬则灵。斯是诊室,惟吾能行。抨击同行庸,贬斥西医蠢。自诩具妙手,回春数业精。兼营看手相,驱灾星。无务农之费力,无经商之劳形。逢人即思骗,遭骂便装聋。心里云:来钱就灵。

仿刘禹锡《陋室铭》,抨击时弊,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黑暗面的不满。这可称之为“仿陋室铭体”。这类仿拟小品,也是游戏文体。

四、结语

游戏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语言游戏占了游戏的半壁江山,辞格游戏又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汉语中的辞格游戏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与汉语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汉语音系简单,同音词多,人们可以基于相同的语音产生诸多的联想。汉语是单音节语,缺少形态变化,语言单位重组非常容易。记录汉语的汉字是形音义兼备的文字,人们可以利用汉字的字音、字义、字形、字序的相互关系来设计游戏,因此汉语汉字是非常适合语言游戏的语言文字。

很少有人从辞格角度专论辞格与游戏,这是因为修辞学家们通常更加关注名家名作名篇,但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的视野似乎也可以开阔些,适当地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文体纳入研究范围,考察游戏与辞格的相互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有大量的辞格运用于游戏,更是因为很多游戏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辞格游戏,并由此产生了独特的汉语游戏文体。当然也是因为游戏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比如有些民俗其实也是一种辞格游戏。大红灯笼几乎成为中国的象征。这其实是一种谐音双关:灯——丁(男丁)。闽南语(灯)与(丁)同音,故一般将提灯、闹灯视为人丁旺盛的佳兆。台湾习俗中,妇女在元宵节穿梭于灯下,祈求来年得子

(男)、添丁;在台湾北部桃竹苗客家庄里,男丁从农历正月十一日起到家庙挂灯,称为(起灯),谐音(起丁),为新生男丁入族的仪式之一,含义深远流长。

辞格游戏既可以促进游戏的丰富与高雅,也有良好的社会功能,既可以娱乐自己,调节身心的,也可以娱乐他人,营造良好的社交气氛,协调人际关系。当然,它也可以用来针砭时弊,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游戏中的修辞格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胡伊青加.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2]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3] 李佳琪.汉字娱乐功能论[J].汉字文化,2017(6): 85-88.
- [4] 王颖.新兴网络三字格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学,1996.

- [5] 唐钺.修辞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 [6] 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 [7] 黄伯荣、廖学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 [8] 张涤华,等.汉语语法修辞词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 [9]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0] 陈克.中国语言民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11] 游戏主人.笑林广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 [12]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3] 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4]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南 山)

(上接第53页)

- [8] 邓欢.大学生情绪标签的神经机制:基于ERP技术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 [9] LEE KH, SIEGLE GJ. Common and distinct brain networks underlying explicit emotional evaluation: A meta-analytic study [J].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2(5): 521-534.
- [10] KIRCANSKI K, LIEBERMAN MD, CRASKE MG. Feelings into words: Contributions of language to exposure therapy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10): 1086-1091.
- [11] MCRAE K, TAITANO EK, LANE RD. The effects of verbal labelling on psychophysiology: Objective but not subjective emotion labelling reduces skin-conductance responses to briefly presented pictures [J].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10(5): 829-839.
- [12] 邓欢,江琦,马静,等.大学生情绪标签与性别

标签加工时程差异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10): 796-800.

- [13] 邓欢,江琦.标签发生在何时:情绪标签的ERP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 231-236.
- [14] LIEBERMAN MD, JARCHO JM, BERMAN S, et al.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placebo effects: A disruption account [J]. NeuroImage, 2004(1): 447-455.
- [15] LANE RD, SCHWARTZ GE.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 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sychopathology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87(2): 133-143.
- [16] 邓欢,江琦,冯淑丹.让情绪进入觉知之光:情绪意识及相关研究[J].教育生物学杂志,2013(3): 208-213.

(责任编辑 师 语)

石臼湖流域汉语方言形成初探*

侯 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 石臼湖流域是江淮官话和吴语的交界地区,分布有江淮官话、宣州吴语、太湖吴语和移民方言。唐宋以来的行政区划跟石臼湖流域官话和吴语的分界大体一致。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奠定了沿江城市南京、马鞍山、芜湖等地官话方言的基础,但并未进一步深入到离江较远的石臼湖地区。石臼湖流域方言是在行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自发演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 石臼湖; 方言; 形成

[中图分类号] H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81-06

引言

石臼湖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当涂县的交界地带,是江苏、安徽两省的界湖。石臼湖西部有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姑溪河汇入,北部经天生桥河(旧名胭脂河)与秦淮河相通,南部经石固河、芦溪河与固城湖相连。石臼湖因形状酷似“石臼”而得名,湖面 200 多平方公里。石臼湖、固城湖和原丹阳湖同源于古丹阳湖,因泥沙淤积,逐渐分化出固城、石臼、丹阳三湖。丹阳湖成湖之初面积很大,湖面 4000 余平方公里^{[1]283}。唐代诗人李白《姑熟十咏·丹阳湖》诗云:

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
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
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
少女棹归舟,歌声逐流水。

此诗前两句描写了丹阳湖波澜壮阔的景象,可见直至唐代该湖依然是烟波浩渺的大泽。因历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垦,丹阳湖湖面不断缩小,目前只剩石臼、固城二湖。

石臼湖流域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前

沿,原属吴语区,周边有当涂、博望、溧水、高淳一县三区,其中当涂西部、北部,溧水北部的方言以江淮官话为主,当涂东部、溧水南部和高淳区以吴语为主。此外,本区还有移民方言岛分布,尤以溧水地区为最。据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2],整个宣州吴语地区的吴语和官话方言成交错状分布,不像其他方言片区那样界限分明。

目前石臼湖流域的土著吴语受到江淮官话的冲击,正在逐步丧失原有的领地。20 世纪 80 年代,叶祥苓(1984)曾经调查过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方言,对这一地区的方言分布状况和主要特点作了初步分析,其中涉及高淳、溧水和当涂三地的吴语。^[3]近年来,石臼湖流域的方言正在逐步受到学界关注,但有关该区方言形成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从方言分布及方言特点出发,结合行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三方面尝试探讨石臼湖流域汉语方言的形成过程。

一、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分区

从方言分区来看,石臼湖流域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分界线自东向西大体上在溧水城区—石湫镇北部—丹阳镇—薛镇—护河镇—太白镇一线。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理语言学视阈下苏皖浙交界地区吴语音变研究”(项目编号:18BBY051)。

[收稿日期] 2019-09-27

[作者简介] 侯 超,男,安徽利辛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白湖流域的吴语分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太高小片和太湖吴语毗陵小片:博望区、当涂东部、溧水西南部、高淳西南部的吴语属于宣州吴语铜泾小片;高淳桤溪镇以西(砖墙镇除外)及当涂湖阳镇西部属于宣州吴语太高小片;溧水东南部(白马等镇)、高淳东部桤溪镇属于太湖吴语毗陵小片。石臼湖流域的土著方言为吴语,主要特征是古塞音声母今读仍保持三分格局,多数方言点有六至七个声调,且入声分阴阳。词汇方面和邻接的太湖吴语有一些共同特征,如“下雨”说“落雨”,“淋雨”说“汫雨”“去年”说“旧年”,“时候”说“辰光”,“迟”说“晏”,“割稻”说“斫稻”等。语法方面,石臼湖流域吴语表被动可用介词“把”(如高淳:他把狗咬则)、表处置可用介词“拿”(如高淳:拿门关起来)。石臼湖流域吴语特征的保留显然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吴语的地域范围内有关。

石臼湖流域的文明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1997年高淳薛城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5500—6000年,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4]。除高淳外,当涂、溧水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行政区划沿革来看,石臼湖流域长期处在同一政区。^①西周时期,石臼湖流域属吴国,东周时期先后为越、楚所辖。秦朝实行郡县制,设有丹阳县、溧阳县,时石臼湖流域大部分属丹阳县,小部分属溧阳县,两县先后为鄣郡、会稽郡所辖。两汉至西晋时期隶属丹阳郡。西晋时,于丹阳县南部分置于湖县。东晋及宋、齐、梁、陈的都城都在今南京市,此时石臼湖流域属丹阳郡及侨置南豫州、淮南郡等。时另有侨置当涂县,初无实地,今当涂县之名始于此。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析溧阳西北及丹阳(江宁和博望交界处)故地东部置溧水县(今溧水、高淳属之),为溧水建县之始。隋朝当涂、溧水之地属丹阳郡,高淳之地属宣城郡。唐朝石臼湖流域大部属宣州,隶江南西道,此时石臼湖地区与南京地区(属润州,隶江南东道)已有分隔。明弘治四年(1491年),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是为高淳建县之始。自北宋始,溧水、高淳和当涂已有明确分野,此后,石臼湖流域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大

的变化,高淳、溧水始终和南京一起先后为江宁府(北宋)—建康府(南宋)—集庆路(元)—应天府(明)—江宁府(清)所辖,当涂始终和芜湖、繁昌一起先后为太平州(两宋)—太平路(元)—太平府(明清)所辖。

周振鹤、游汝杰(2015)指出,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对方言的发展演化有很大的影响,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有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对一体化来说非常适中。^{[5]62}石臼湖流域自古属于吴地,其方言早期显然属于吴语范畴。自东晋以来,北人南迁,石臼湖流域自北向南逐步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唐代,高淳以及当涂、溧水南部均属宣州(辖今石臼湖流域和芜湖、宣城、安庆地区),而当涂、溧水北部的一小部分区域属于润州(辖今南京、镇江地区),时宣州和润州的分界线大体跟今天石臼湖流域北部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一致,只是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分界线略有南移,可见唐代的行政区划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区有着重要影响。

北宋时,当涂属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溧水、高淳属江宁府,此后,太平、江宁名称虽有沿革,但辖地基本不变,当时太平州和江宁府东部在地理上基本上以石臼湖的中线为界,这条分割线也成为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分界线。在地理上,石臼湖的阻隔,使得宣州吴语内部产生分歧:西部(不包括当涂湖阳镇)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而石臼湖南岸(包括当涂湖阳镇)则是宣州吴语太高小片。这种宣州吴语内部的分区也大体上跟宋代以来太平州和江宁府的行政分界相一致。可见,地理上的分割对石臼湖流域宣州吴语的内部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历史移民与方言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是西晋永嘉丧乱之后的北人南迁。永嘉丧乱之前,苏南、皖南地区都说吴语,用吴语传唱的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吴声

^① 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主要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当涂县志》(中华书局,1996)、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志 1986—2005》(方志出版社,2010)、溧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歌曲”就产生于建业一带。^[6]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乘机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亡。317年,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东晋。永嘉丧乱后,中原士族臣民大批南迁,史称“衣冠南渡”。永嘉移民的特点是时间长、数量大,自永嘉元年至泰始二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南迁流民达九十万人之多,占南朝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7]410}由于移居建康的北方人多是统治阶层和名门望族,社会地位很高,他们所说的语言自然也具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南方士族纷纷效仿北方口音。“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8]529-530}前贤一般认为,六朝时期,南京方言属于吴语^{[6]9},但当地居民实际操北方话和吴语两种方言,北方人和南方士人操北方话,庶人则操吴语。因为北方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北方方言在南京地区逐渐取代了吴语。^{[5]17}

语言的传播路径大体上有两种,一是人群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在中国古代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即从上层阶级向普通百姓传播,六朝时期金陵吴语被北方话取代的过程正是由士族向庶民方向发展的。二是地域之间的传播,又有跳跃式和渐进式两种,前者往往形成方言飞地或方言岛,后者则形成地理上相连的方言片或方言区。北方话在南京、芜湖等沿江城市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在地理上进一步向离江较远的地区推进,但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差异明显,这种推进是非常缓慢的。石臼湖地区距离南京城区80公里左右,古代多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农村,加上湖水阻隔,所以尽管北方话在濒临长江的南京等城市逐步取代了吴语,但是进一步的南推显然受到了阻碍,至今仍然没有越过石臼湖,直到20世纪80年代,石臼湖以北溧水城区仍然能够调查到属于吴语的“老在城话”^{[10]2},可见,石臼湖北部地区的吴语被江淮官话取代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朱蕾(2016)认为皖南的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主要是在明清以后^[11],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代北方方言不断南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且人口数量超过土著的北方方言要在它所迁入的中心城市取代当地方言相对比较容易,但要在经济文化比较

落后的农村地区取得优势并非易事。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官话在杭州城区具有优势地位,致使杭州城成为吴语包围中的官话方言岛,但优势的官话方言遭到周围吴语的抵抗,从而形成了具有官话色彩的吴语杭州话。^[12]古代石臼湖流域交通不便,且经济、文化上跟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比要落后很多,这种状况使得这一地区的吴语得以保存。相对而言,长江沿岸多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城市,北方移民南迁以后往往定居于此,士族大户也不愿意进一步往南迁移到农村去,所以当时的移民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石臼湖流域。永嘉丧乱之后,大批的北方移民都是沿着长江分布的,除南京外,今芜湖、马鞍山等地也被北方移民填充,《晋书》卷十四《地理志》载“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宁康元年,移镇姑熟”^{[13]272}。“芜湖”当指今芜湖市,侨立豫州于此,“丹杨”即丹阳县(今小丹阳),“于湖”由丹阳县析出,“姑熟”即今当涂县城。可见,今长江沿岸的芜湖市、马鞍山市在永嘉丧乱之后,都被北方侨民占据,只是跟南京地区的移民来源地略有不同,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包括当涂县城)的方言均属江淮官话,这跟永嘉丧乱之后的北方移民不无关系,只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低于南京,这里的吴方言被北方方言覆盖的时间略晚于南京地区。如上所述,北方移民到达江南后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并未扩散到离江较远的石臼湖地区,至今,吴语仍散存于芜湖和当涂两县的东部和南部。

第二次移民大潮始于唐安史之乱后,持续至五代,历时近两百年。这一时期的移民不像第一次大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而是遍布南方各地,“其中,江南、江西、淮南和蜀中吸收了大量的移民,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域,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7]269}。“江南”指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上海市与浙江省。与第一次迁入江南地区的移民不同,第二次迁入江南地区的移民分布范围很广,今苏州、南京、杭州、绍兴、宣州、歙县、贵池都是移民聚居的重要地区。从移民分布来看,第二次大移民主要迁入江南地区的

一些重要城市,迁入石臼湖流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移民相对较少。安史之乱后的北方移民方言加速了沿江城市吴语向北方话发展的过程,使得北方方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没有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次大移民是靖康元年至建炎四年(1126-1130)的北方人口南迁。据葛剑雄(1997),此次移民大约有三个浪潮:金军攻入河北、河东以后,移民进入河南和淮南;攻入淮南后,移民进入江南;攻入江南以后,一些移民进入岭南、福建以及其他山区。^{[7]279}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区分布很广,临安府作为南宋都城,成为北方移民分布的中心地区。平江(今苏州)、建康、镇江三府是江南仅次于临安的移民较多的府州。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太平州、池州等)也是北方人民迁入避难的重要据点。据《高淳县志》(1998-2010),高淳境内万人以上大姓多为南宋期间徙入的后裔,^{[14]9}这说明即使是离江较远的城市也有移民前来定居。从总体上来看,当时北方移民仍以移居中心城市为主,县城虽有移民,数量有限,农村更少。南宋以来,石臼湖流域的方言仍以吴语为主,但自北向南已逐步受到北方方言的冲击。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均对苏皖长江南岸地区方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大移民奠定了北方方言的基础,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移民进一步巩固了北方方言的地位,同时使得北方方言的区域不断南移。在第三次大移民时期,南京、马鞍山、芜湖等集中了数量相对较大的北方移民,“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15]与第一次大移民主要定居长江沿岸城市略有不同,第二次、第三次大移民的范围扩大,普通的县城亦有移民迁入,这些北方移民的方言显然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产生了一些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吴语逐渐脱离太湖吴语的轨道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除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还有一次局部移民活动也对石臼湖流域的汉语方言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及战后的大移民。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十六省,造成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其中苏浙皖交界地区因为是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人口损

失尤其严重。据葛庆华(2002)统计,战争期间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损失约1048万,损失率达90.1%,战后这一地区有大量移民迁入,持续半个世纪之久,至宣统三年移民达二百余万,占全区人口的58%。^{[16]1}战后石臼湖流域移民大部分来自河南、湖北、皖中和苏北地区,显然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北方方言区。大量移民移居石臼湖流域,对这一地区的方言地理分布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为数不少的方言岛(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客民话”),其中溧水地区最为明显,如白马、共和、东屏等镇的河南话方言岛^{[17][18]}。从总体上来看,客籍移民方言只是使得石臼湖流域吴语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但其方言特征并未明显渗入本地吴语。

三、方言接触与方言演变

永嘉丧乱和唐末五代的北方移民奠定了沿江城市南京、马鞍山和芜湖等地北方方言的基础,至南宋靖康之变发生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之后,这几个沿江城市应该已经成为北方方言区了。至于这些城市的方言进一步演变为江淮官话的时期,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能够证明。刘丹青(1997)认为,比较稳固而定型的江淮官话区的形成较晚,是在原先南方方言(主要是吴语)和不断南下的历代北方人的方言长期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19]44-45}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历代移民所带来的北方方言不断地和不同时期的本地方言接触融合,形成了今天长江南岸江淮官话的基础。在方言的交界地区,两种方言之间的接触是必然的,就石臼湖流域而言,这种接触发生的时间相当早,而且是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古代,本地方言对外来方言的抵抗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离江较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加之水系复杂、交通不便,石臼流域的土著吴语能够保存至今。近代以来,由于经济、交通条件的改善,方言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从方言发展的大势来看,沿江的北方方言持续不断地向南推移,五六十年代溧水县城还有吴语存在,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说吴语的人了。

当涂东部、溧水南部目前仍属吴语地区,具有一些跟江淮官话不同的特征,如:声母有清浊对立,泥来母不混,侯韵读[ei][ø][ɤ]等,但因为直

接面临江淮官话,这里的吴语带有一些江淮官话的特征,如:古浊音声母出现更多的清化现象;微母更多地读零声母;蟹止摄开口三四等字舌尖化;宕江摄主元音读低元音;通摄主元音央化;声调数量五至六个;次浊上归阴上。有些语音特征跟邻接的江淮官话并不完全一致,那很可能是早期方言接触过程中语音折合或后期发展的结果。词语方面跟江淮官话也有一致性特征,如“今天”说“根朝”,“彩虹”说“虹 kaŋ⁵/kã⁵”,“谁”说“哪个”,“西红柿”说“洋柿子”等。

需要指出的是,高淳地处石臼湖南岸,距离沿江城市较远,交通相对不便,所以历史上到达这里的移民相对较少,即使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高淳地区的土著也显著多于移民^①,这一点跟当涂、溧水的情况有所不同。应该说高淳吴语受到官话方言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至今仍然保留一些跟太湖吴语一致的特征,如语音方面,有七个声调、阳入为低升调、覃韵有读[y]的现象等;词汇方面,雄性动物前加“雄”(如“雄鸭”)、雌性动物后加“婆”(如“鸡婆”)等。有些太湖吴语难觅的说法甚至还能在高淳方言中找到遗迹,例如“茄子”高淳方言说“落苏”,太湖吴语基本上已被“茄子”取代,只在上海方言中还保存着。

前文指出,自北宋以来,高淳一直和南京在同一直辖区内,而与镇江、常州不同区,行政区划的阻隔也使得高淳地区的吴语跟太湖吴语有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少都是晚期自发形成的,例如奉微母读重唇音[b]^[20]、咸山摄开口一二等字读[ie](如“三 cie¹”)^[21]、次浊上归阴平^[22]、边音自成音节、“去”白读[k^həʔ⁷]、“关”读[tɕye¹]等。当涂、溧水地区的吴语也有一些既不同于江淮官话也不同于高淳吴语的特征,例如古浊音声母今读强气流辅音、山摄开口一二字有鼻韵尾丢失的现象(如“山”读[sæ¹])、果摄元音高化或裂化等。还有个别的吴语方言点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语音特征,如博望方言第一人称代词说[nieʔ⁷]、第二人称代词说[nieʔ⁸],两者只有声调差异。石臼湖流域复杂的语音面貌表明,在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土著方言在跟外来强势方言接触的过程中,会在剧

烈的抵抗中缓慢地接受外源方言的影响,同时在演变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独有特征,方言接触加上方言自身的演变可能导致本土方言变得跟周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淳吴语。多种方言之间的接触还可能导致一字多音现象。溧水石湫镇西部横山村覃韵个别字有三种不同口音,例如“胆”读[tã³][tia³][tũ³],三种形式之中,[tia³]和[tũ³]是吴语层次,[tã³]是江淮官话的层次。不同的读音形式之间相互竞争,最终只有一种胜出。

四、结语

石臼湖地区是江淮官话和吴语交界的前沿,结合语言的外部环境来看,江淮官话是本区强势方言。历史上,官话方言和吴语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北进南退,目前这种趋势仍在石臼湖流域上演。石臼湖流域马鞍山、当涂地区属于皖南,而目前整个皖南地区的强势方言是江淮官话。关于皖南地区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郑张尚芳(1986)和孟庆惠(2000)秉持“移民说”,前者认为江淮官话主要是江北移民带来的,后者认为历史上的永嘉移民、晚清移民和抗战移民都是皖南江淮官话形成的重要原因。^{[23][24] 2338-2339}朱蕾(2016)不同意二人的观点,认为皖南强势江淮官话主要是明清以后标准语通过文教力量在皖南持续推行的结果。^[9]我们认为,皖南强势方言江淮官话的形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在很大程度跟历史移民有关,如沿江的马鞍山、芜湖等,这些城市永嘉丧乱之后就成为北方移民聚居之地,唐末五代和宋室南迁时期也都是北方移民南迁的重要据点,这些城市的江淮官话是在本地方言和不断南下的历代北方人的方言长期接触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朱蕾(2016)也承认芜湖、当涂等沿江城市江淮官话的形成及发展可能和南京、扬州等方言基本同步或略后。^[11]可见南京、马鞍山、当涂县城等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形成较早,且形成之后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这些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不断向东南方向推进,蚕食石臼湖流域吴语的地盘,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溧水城区还有吴语存在,目前部分靠近江淮官话的镇村多种方言

① 据葛庆华(2002),宣统三年,高淳县人口约20.1万,移民及其后裔约6.2万,数量明显少于石臼湖流域其他地区。

形式并存的现象,也直接证明了江淮官话和吴语之间的竞争关系。石臼湖流域的吴语跟主流吴语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石臼湖南岸的高淳方言,早期曾被认为是“古韵方言活化石”,其实它的很多特点大都是后期音变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特点跟方言接触密切相关,如麻韵主元音读[a]等。总之,我们认为石臼湖流域方言的形成是行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和自发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苏民,窦鸿身.中国湖泊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 叶祥苓.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方言[J].方言,1984(4):243-246.
- [4] 薛城考古队.南京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高淳薛城遗址的发现及初步认识[J].南京史志,1998(2):36-38.
- [5]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6] 卢海明.六朝时期南京方言的演变[J].南京社会科学,1991(2):28-30.
- [7]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8]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9] 鲍明炜.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J].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 [10] 郭骏.溧水方言探索集[C].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 [11] 朱蕾.论皖南强势方言江淮官话的形成[J].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三辑),2016:197-220.
- [12] 徐越.宋室南迁和杭州话的形成[J].江西社会科学,2005(2):126-130.
- [13]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4] 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志 1986-2005[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 [15] 周振鹤.中国历代移民大势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响[J].人文地理,1988(1):57-64.
- [16] 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7] 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5(4):120-125.
- [18] 顾黔.江苏溧水方言地理学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6(10):108-113.
- [19] 刘丹青.南京话音档[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20] 侯超.江苏高淳方言古奉微母的特殊音变[J].方言,2018(3):287-291.
- [21] 侯超.江苏高淳方言山咸摄一二等字的层次、分合及演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3):182-188.
- [22] 侯超.江苏高淳方言声调的格局及历史演变[J].语言研究,2016(4):45-52.
- [23] 郑张尚芳.皖南方言的分区(稿)[J].方言,1986(1):8-18.
- [24] 孟庆惠.安徽文化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南山)

《经典释文》术语“依字”研析

姚 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经典释文》为南朝入唐的学者陆德明所撰,“经注毕详,训义兼辨”,是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一部巨著。其中的术语“依字”在《释文》中出现约一百余频次,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和用法。从术语本身含义分析,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之词义者,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中所承载之词义者。从术语的使用情况分析,陆氏用“依字”辨析误用、混用字,呈现字、词对应的复杂关系,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

[关键词] 《经典释文》; 术语; “依字”

[中图分类号] H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87-07

《经典释文》^①(以下简称“《释文》”)三十卷,为南朝入唐的学者陆德明所撰。卷一为序录,包括“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四个部分,说明著书的缘由、全书体例、内容安排的次序及其理由,以及各种经典的师承源流和各家传注。卷二至卷三十依次为《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十四部古籍考证字音、辨别字义,同时对于经典异文也多所考证,记载了多种版本的异同。是我国早期对众多古籍中的疑难文字进行集中解释的“音义”总集之一。

陆德明生活在陈、隋、唐三朝,他经历了朝代的兴衰更替,也体察到经学由分裂向统一转化的趋向,对因分裂给经学带来的混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看到当时的经义阐释“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因此,他“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1],撰成《经典释文》。

《释文》注音的基本体例是“摘字为音”、兼释“经”“注”,即摘出经典正文和注文中的单字,加以

音释。释义的基本体例是“胪列诸说,并下己意”^{[2]83},做到“经注毕详,训义兼辨”(《释文·序》)。这样的体例使《释文》集六朝音注之大成,成为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一部巨著。它不仅是阅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还为后人研究音韵、词义和文字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所以它既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又有很高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

如此重要而体量庞大的作品,最大化发挥其价值的前提是准确把握《释文》全书的体例及其系列训注方式、术语、内涵,在正确理解陆氏训解之意的基础上以此为桥梁展开对14部儒道经典的深入全面研究。

陆德明本人对《经典释文》条例的直接说明主要出现在《序录》之中,主要从撰著目的、范围、注音的原则、异文的收录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吴承

[收稿日期] 2019-09-27

[作者简介] 姚 徽,女,安徽和县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① 《经典释文》刊行版本及其流传的情况,资料很多,但杂而零碎。本文以中华书局1983年版黄焯断句之《经典释文》为工作底本,旁参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经典释文》四部丛刊初编本(以通志堂本别据叶石君校宋本)、《经典释文》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

仕、黄焯、万献初、岳利民等学者对《释文》体例都有阐发,对正确解读《释文》贡献很大,但《释文》中相关的体例研究远未充分展开,尚有不少可以深入研究的内容,下面试对术语“依字”作一较为详细的论析。

一、“依字”的含义

陆氏使用“依字”这个术语,字面上义为“依从字义”,古代学者“字义”“词义”不分,仔细对比,可以发现陆氏“依字”术语所依从的意义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的词义(当然,对于多义词而言,指的是与文义匹配的那个词义);一类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中所承载的词义(不一定是此字字形所记之词的本有之义或固定用法)。下面详细言之。

1. 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之词义者

(1) 依陆氏注语所明确出示之字

筑场: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塲,塲依字失阳反。今亦宜直羊反。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七月)^①

此例中“依字”指依陆氏注语所出示之“场”字,非依本条所注之“塲”字。

薦脯:本又作薦,予见反。或作薦,非也。薦依字直买反。解薦,兽名,后放此。

(卷十·仪礼音义·士冠礼第一)

此例中“依字”指依陆氏注语所出示之“薦”字。

释蟲第十五:本亦作虫。案此篇是释蟲,依字虫音许鬼反,蛇类也。并两虫为蝮,音古门反,蟲之总名也。三虫为蟲,直忠反,有足者也。

(卷三十·尔雅音义下·释蟲第十五)

此例中“依字”指依陆氏注语所出示之“虫”字。

上述之例是先明确出示所依之字,再注以读音。还有一种较特别的释例,先出示读音,再标注其所依之字形:

齐侯疥:旧音戒。梁元帝音该,依字则当作痂。《说文》云两日一发之瘡也。痂又音皆。后学之徒金以疥字为误。案传例因事曰遂,若痂已是瘡疾,何为复言遂瘡乎?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二十年)

所注经典原文为:“齐侯疥,遂瘡。注:瘡,瘡疾。”^②

这里的“依字”指依梁元帝注为“音该”的“痂”字。

擻衣:旧音患。今读宜音宣,依字作擻。《字林》云擻,擻臂也。先全反。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王制第五)

先出示读音“宣”,再标注“宣”音所依之字形为“擻”。

(2) 在有不同字解的情况下,依本条所注之字

甫田:旧音晡。“十藪”郑有圃田。下同。毛依字,甫,大也。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车攻)

原文为:“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传: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为防,或舍其中。笺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郑有圃田。”

对此句“甫草”毛、郑看法不一。郑认为“甫草”为“甫田之草”,“甫田”为专名,即“圃田”,毛依字即依本条所注之“甫”字,释为“大”。

之谦:依字力簞反。依注音黏,女廉反。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第六·轮人)

原文为“参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亦弗之谦也。注:杀,衰小之也。郑司农云‘谦读为黏’,谓泥不黏著辐也。”

郑注认为此条之“谦”为借字,本字为“黏”。“依字”则依本条所注之“谦”字本有之义。

壹戎衣:依注衣作殷,於巾反。戎,兵也。谓一用兵伐殷也。《尚书》依字读,谓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

(卷十四·礼记音义之上·中庸第三十一)

原文为:“子曰:无怙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注:纘,继也。绪,业也。戎,兵也。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与?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依字”义为依“衣”之本字之义解,不依借字

^① 括号中“卷六”指所据中华书局1983年版《经典释文》第六卷,下同。

^② 本文所引儒家经典原文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同。

“殷”之义解。

(3)在同一字有多音多义情况下,依此字的常用之音义

擎颂:众家不音,当依字。戚音容。

(卷八·周礼音义上·宗伯下·眡瞭)

原文为:“眡瞭,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

注: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

《汉语大字典》“颂”字有 róng 和 sòng 二音。音 róng 首义为“仪容”,后作“容”,为“颂”之本义。音 sòng 首义为“歌颂”,为其常用义。《汉语大词典》释“颂磬”为“特指古代大射礼时置于西方的磬”,取义“歌颂”。“众家不音,当依字”指诸位注家不特为“颂”注音,则依“颂”常用之音义,即“歌颂”之“颂”。

不如:依字读。或一音而据反。

(卷十五·左传音义之一·僖传四年)

“而据反”属日母御韵,音 rù。《广韵》“如”有去声音,但未释义。此条依字指按“如”的常用音义解释,而不按又音他义解释。

信夷狄:音申。注除宋以信义一字皆同音申。或读依字者,非也。

(卷二十三·穀梁传音义·僖二十七年)

原文为:“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诸侯也。其人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国也。”

这里的“信”为借字,通“申”。此条“依字”指按“信”本字本有之义解释。

2.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中所承载之词义者

釐妇:力之反,寡妇也。依字作嫠。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巷伯)

“依字”义为依上下文义此处应作“嫠”(寡妇),而非“釐”。

建绥:而谁反,注下同。依字作綏,误作绥耳。

(卷八·周礼音义上·天官下·夏采)

原文为“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注:绥以旄牛尾为之,缀于幢上,所谓注旄于干首者。”

《说文》:“绥,车中把也。”本义为“登车时用以拉手的绳索”。《说文》:“綏,系冠纓也。”本义为古代帽带结子的下垂部分,引申而指“以旄牛尾

注于竿首”的“有虞氏旌旗”。“建绥”之“绥”为借字,依字当为“綏”。

二、术语“依字”的使用

由于在语言文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词义会辗转引申,语词会分化更替,文字会通借变化,加之古代学者“字”“词”界划不够清晰,所以整理分析《释文》中术语“依字”的使用情况,可以归纳出若干种不同的用法。

1.用“依字”辨析误用、混用字

(1)因形近而易误

豐:芳忠反。《字林》匹忠反。依字作豐。今并三直畫,犹是变体。若曲下作豆,禮字耳,非也。世人乱之久矣。彖及序卦皆云大也。案豐是腴厚光大之义。郑云豐之言俛,充满意也。坎宫五世卦。

(卷二·周易·豐)

豐“豐”形近易误,“世人乱之久矣”,陆氏详辨之。

关雎:七胥反。依字且边佳。且音子徐反。旁或作鸟。

(卷五·毛诗音义上·周南·关雎)

“雎”“睢”形近易误,陆氏特别用反切明确是“且”而非“目”。

既飭:音勑,正也。依字从力。脩飾之字从巾,不同也。今人食边作芳,以为脩飾之字。借作勑,音非。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六月)

辨析形近之“飭”“飾”“饒”三字的不同!

自陝:式冉反。依字当作陝。何休注《公羊传》云弘农陝县是也。一云当为郟,古洽反,谓王城郟也。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曲礼下第二)

《说文》:“陝,隘也。”“陝,弘农陝也,古虢国王季之子所封也。”二字义不相同,但字形极似而微异,“陝”里为“人”,“陝”里为“入”,陆氏详辨之。

(2)因音同而易混

辭:本亦作詞。依字应作词,说也。《说文》云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辭,不受也。受辛者,辭。辭,籀文辭字也。

(卷二·周易·繫辭上)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下简称为《汇校》):“写本詞作辭。是也。段云,辭,说也。《说文》如是,有《广韵》七之可证。此陆分别辭与词之不同,

而俗人改之。吕氏音训引同,则其误久矣。上文云本亦作辩,故分别辩辩之用,而又兼辨词不同辩。当作《说文》云辩说也词者云云,浅人乱之耳。”^{[3]20}按黄焯校语,此条应为:

辩:本亦作辩。依字应作辩。辩,说也。《说文》云: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辩,不受也。受辛者,辩。辩,籀文辩字也。

“辩”“词”“辩”上古和中古皆邪母之部,词义亦有部分有关联者,故容易混用,陆氏因此而详细辨析。

2.显示字、词对应的复杂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经典文本在写作、传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本字记录本词之外的复杂字、词对应关系。

(1)通假字

文本以借字记录词义,陆氏用“依字”术语出示本字,有时更直接点出假借关系。

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傍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为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离骚》云“纫秋兰以为佩”是也。

(卷五·毛诗音义上·郑·将仲子)

黄焯《汇校》:“阮云,《六经正误》云:‘依字韋旁作刃。韋作章,误。’是也。此及小字本、十行本所附皆作木,亦误。焯案宋本亦误作木。”

原文为:“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传:园所以树木也。檀,疆韋之木。”

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疆韋之木”之“韋”出校语。陆氏所见之本应作“忍”,故出此条。“依字木傍作刃”,如黄焯案语应为“依字韋傍作刃”,即陆氏认为“忍、刃”为假借字,依“疆韋”词义本字当为“韋”。

伶人:力丁反,乐官也。依字作伶。

(卷十七·左传音义之三·成传九年)

“乐官”义本字当为“伶”。

离也:依字应作离。今作离,假借也,力知反。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十三年)

原文为:“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乃藩为军。注:藩,离也。”

“藩篱”之“篱”注文用借字“离”。

后彫:丁条反。依字当作凋。

(卷二十四·论语音义·子罕第九)

“凋落”义本字当为“凋”。

烝填:依字音田,与寘同。又依古声音尘。

尘,久也。故笺申之云古声填寘尘同。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常棣)

原文为:“兄弟鬩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传:烝,填。戎,相也。笺云:当急难之时,虽有善同门来久也,犹无相助己者。古声填寘尘同。”

与之相类的还有一条:

寘填尘: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尘。郑云古声同。案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声同。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东山)

陆氏数条都申引郑笺指出,“烝”“填”“寘”记录“久”义皆为借字,因与本字“尘”古音同而通假。涉及上古音系统,保存了珍贵的古音资料。

(2)古今字

文本记录的字形为后起的今字,陆氏用术语“依字”出示古字。

紂帛:侧基反。依字系旁才。后人遂以才为屯,因作纯字。

(卷五·毛诗音义上·召南·行露)

黄焯《汇校》对“紂帛”之“紂”出校语:“旧钞本作纯字。”即陆氏所见文本为“纯帛”,故用术语“依字”出示同“緇”之“纯”为后起的今字,古字为“系旁才”的“紂”。

(3)正俗字

文本用常见的俗字记录,陆氏用术语“依字”出示本有的正字。主要学术活动期在南朝的陆氏已有较强的正字法观念,不过与隋唐以后兴起的规范用字、服务科举考试的正字系列著作不太一样的是,陆氏更多的是以《说文》为依据,强调其原初本字字形。

跛:波我反,足跛也。依字作𨾏。

(卷二·周易·履)

《说文》:“𨾏,蹇也。”徐锴《繫传》:“𨾏,俗作跛。”《段注》:“各本𨾏作跛,又于蹇篆之上出跛篆,云‘行不正也。从足,皮聲。一曰足排之。读若彼。’此后人不知跛即𨾏之隶变而增之耳。今删……凡经传多作跛。”^{[4]83}

关于“跛”,徐锴认为是“𨾏”之俗字。段玉裁认为是“𨾏”隶变后的字形,并认为《说文》本无“跛”字。但经传多作“跛”字,陆氏所见亦如是,所以用术语“依字”出示原初之字形(或云正字)“𨾏”。

创制:初亮反。此俗字也。依字作𠂔。

(卷二·周易·蛊)

原文为注文“甲者创制之令也,创制不可责之以旧”。

“依字作𠂔”的“𠂔”,四部丛刊初编本《释文》和《四库全书》本作“𠂔”,上海古籍影印宋元递修本作“𠂔”。

《说文》:“𠂔,造法𠂔业也。从井,𠂔声。读若创。”“𠂔”为“𠂔”之异体字。本义为“创造、创业”等。

《说文》:“𠂔,伤也。从刀,从一。创,或从刀,仓声。”《说文》此字正体为“𠂔”,“创”为其或体重文。本义为“创伤”。《广雅》:“创,始也。”《正字通》:“创,创业。《说文》本作𠂔,今作创。”

“创制”义本字当用“𠂔”,“创”表此义乃后起字形,陆氏目为俗字。

陜:音洽。本或作狹。依字应作陜。

(卷五·毛诗音义上·魏·葛屨)

原文为《葛屨》序“魏地陜隘”。

《说文》:“陜,隘也。”且有“陜”无“陜”。《段注》“陜”条下:“俗作陜、峽、狹。”

壻:字又作𡙇,悉计反,女之夫也。依字从士、从胥。俗从知下作耳。

(卷十四·礼记音义之上·昏义第四十四)

黄焯《汇校》:“钞本‘壻’作𡙇,‘又作𡙇’上出‘又作壻’三字。狩野云,张参《五经文字》‘壻’作‘𡙇’,伪。《干禄字书》又出‘𡙇、𡙇、壻’三字,谓上俗,中通,下正。《释文》所据本作𡙇,后人改作壻,又从而削‘又作壻’三字也。”

《说文》:“壻,夫也。从士,胥声。”“夫壻”义正字当作“壻”,“𡙇”为俗字。

(4) 异体字

同一个词由不同的字形记录,形成异体字。陆氏也用术语“依字”讨论相关问题。

羊豮𦍋:刘音普见反。依字才丹反。《字林》昨善反。沈云马融音𦍋。干宝为𦍋,与《周易》𦍋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义。或云字则如沈释,而羊豮𦍋之语未见出处。俗谓羊豮脂为𦍋,音素干反。岂取此乎?案《周礼》注𦍋余字,本多作𦍋,宜依𦍋音。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第六·鲍人)

原文为“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则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

若苟自急者先裂,则是以博为𦍋也。注:郑司农云‘𦍋读为𦍋’,谓以广为狭也。玄谓𦍋者如‘𦍋𦍋’之‘𦍋’,或者读为‘羊豮𦍋’之‘𦍋’。”

《说文》:“𦍋,𦍋也。从二戈。”《段注》:“𦍋,此与𦍋音义皆同,故𦍋用以会意,今则𦍋行而𦍋废矣。”《说文》:“𦍋,𦍋也。从𦍋,𦍋声。”《广韵》“𦍋”为昨干切。陆此条释“羊豮𦍋”云“依字才丹反”,才丹反与昨干切同音。下文又云“案《周礼》注𦍋余字,本多作𦍋,宜依𦍋音”,则陆氏认为依字作“𦍋”。“𦍋”与“𦍋”为异体字,《说文》的解释皆为“𦍋”,造字方法不同,“𦍋”为会意字,“𦍋”为形声字。《汉语大字典》“𦍋”字首音 cán 下第一义即“同‘𦍋’”,作异体字处理。

附:异文

陆氏还用术语“依字”显示文献流传中出现的异文现象,主要集中在连绵字和专名用字上。

连绵字:

璫兮:依字作琐,素果反。琐尾,少好之貌。

(卷五·毛诗音义上·邶·旄丘)

原文为“璫兮尾兮,流离之子。”

朱熹《诗集传》:“琐,细;尾,末也。流离,漂散也……言黎之君臣,流离琐尾,若此其可怜也。”^{[5]23}朱熹拆释连绵字,误!毛传已释“琐尾”为“少好之貌”,陆氏申之。“琐尾”为连绵字,义为颠沛流离,处境艰难。

櫟:本又作契,又作𣎵,同,音结。

櫟:古毫反。𣎵,依字作桔櫟,见《庄子》。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曲礼第一)

“櫟櫟”为井上汲水的工具,连绵字。陆氏出示不同写法的异文。

专名:

包括地名、水名、人名、动物名等。

崑崙:本又作混淪。各依字读。

(卷八·周礼音义上·宗伯下·大司乐)

原文为注文:“此三者皆祫,大祭也。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崑崙,人鬼则主后稷。”

“崑崙”为山名。《汉语大词典》“混淪”词条下未列此义项,可据以补之。

制河:诸设反。依字应作浙。《汉书音义》音逝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余杭郡。后汉以为吴会分界。司马云浙江今在会稽钱塘。

(卷二十八·庄子音义下·外物第二十六)

“制河”即今之“浙江”。

孔甯:本又作寧。按《左传》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读。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运第九)

稷契:息列反。依字当作偃。古文作高。

(卷十六·左传音义之二·文传十八年)

原文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注: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伦。”

“偃”,商代始祖名,也作“契”。

獫狁:乃刀反,獫狁也。依字亦作獫。

(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第十九)

3.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

汉语言、文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变化与分化,陆氏对若干种较重要的演变如隶变、破读、同源词等都有用“依字”显示之例。

(1)隶变

不琢:字又作琢,丈转反。徐又依字丁角反。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器第十)

原文为“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罍桴杓,此以素为贵也。注: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琢当为篆字之误也。”

黄焯《汇校》:“段云,此以注改经之本也,字又二字或有误。严云,琢当作琢,释文、石经皆误作琢。郑注琢当为篆,字之误也。盖古籀汉隶偏旁从豕者往往从彖,其从彖从豕者隶省皆从豕,故隶琢为豕,琢亦为琢,琢、篆形近,故郑云当为篆也。而琢、琢所异者微,故徐音丁角反。陆所据正本作琢^①,故谓徐依字,以琢字可琢可琢,因得两读,若径作琢,则与琢非一字,不得音丈转反矣。”

据此,《释文》原文应为:

“不琢:字又作琢,丈转反。徐又依字丁角反。”

《说文》:“琢,圭壁上起兆琢也。从玉,篆省声。”本义为玉器上雕饰的凸纹。《说文》:“琢,治玉也。从玉,豕声。”《段注》“豕”字下按:“琢,俗作琢。”古籀篆文“豕”“彖”形近,故汉隶偏旁从“豕”者往往从“彖”。“琢”“琢”仅一点之差。因此经隶变后,“琢”字有作“琢”形,“琢”字亦有作“琢”形。此条传世《礼记》正文作“琢”,郑注作“琢”解,故云“当为篆字之误也”。徐邈作“琢”解,故音“丁角反”。此条反映了汉字由古字经隶

变向今字发展时产生的一些复杂情况。

(2)破读

破读字是因为词义变化或词性转变而引起读音改变的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词义引申和语词分化,形成了古书上常见的一字异读现象。注解家们一般用术语“如字”标注习惯上认为最通常的读音,用术语“破读”“读破”或直接的注音(反切或直音)标注习惯上认为最通常读音之外的读音。陆氏《释文》亦如是。不过还有少量“如字”之字是用“依字”或“依字读”来标注的。

彭生乘:绳证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则依字读。

(卷五·毛诗音义上·齐·南山)

对比:乘马:王、徐绳证反,四马也。郑如字。下同。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鸳鸯)

所以王:于况反。周弘正依字读。

(卷十八·左传音义之四·昭传二年)

对比:七月王业:于况反。又如字。下同。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七月)

好恶:呼报反,下乌路反。或并依字读。下并注皆同。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十五年)

对比:好:毛如字,郑呼报反。《兔置》诗放此。

(卷五·毛诗音义上·周南·关雎)

(3)同源分化

同源字是音、义相同或相近,属同一语源的字。王力《同源字论》云:“为什么说它们是同源呢?因为它们原始的时候本是一个词,完全同音,后来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有时候,连读音也没有分化(如‘暗、闇’),只是字形不同,用途也不完全相同罢了。”^{[6]4}

《释文》里陆氏用术语“依字”辨析的不同字形中,有部分即属于同源分化关系。

佩:蒲对反。依字从人。或玉傍作者,非。

(卷五·毛诗音义上·卫·芄兰)

《说文》有“佩”字,其释为:“佩,大带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谓之饰。”本义为名词,“古时系在衣带上的装饰品”。后发展出“佩带,携带,钦佩,环绕”等动词义。“珮”字《说文》未载。《玉篇》:“珮,玉珮也。本作佩,或从玉。”

^① 据《汇校》的分析,这里的“琢”当为“琢”之误。

《汉语大字典》只列其名词用法,是“佩”的同源分化字,后出。陆氏“依字”辨析“佩觿”之动词“佩”应从人,不从玉。

柴:仕佳反。依字作柴。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王制第五)

原文为“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

王力《同源字典》列同音之“柴”“柴”为同源字,云:“‘柴’是木柴,‘柴’是祭天的典礼。祭天要烧柴,所以祭天的典礼就叫作‘柴’。后来祭天的典礼写作‘柴’,以别于木柴的‘柴’。”^{[6]115}

窳:刘古孝反。依字当为窖。作窳,假借也。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下·匠人)

原文为:“困窳仓城,逆墙六分。注:逆犹郤也。筑此四者,六分其高,郤一分以为窳。困,圜仓。穿地曰窳。”

“窖”“窳”上古皆见母幽部,同音。《说文》:“窖,地藏也。”《段注》:“《通俗文》曰:‘藏谷麦曰窖。’”《说文》:“窳,窖也。”义亦同。微别者“窖”侧重指藏谷麦。陆氏可能重此差异,判二字为假借关系,实则同源关系。

藻税:章悦反。依字当作楹,梁上侏儒柱。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器第十)

“税”“楹”上古皆章母月部,同音。本义并不相同,《说文》:“税,木杖也。”“楹,木也。”但《尔雅》已有“税”之“梁上的短柱”义即“侏儒柱”的记载。《尔雅·释宫》:“桷谓梁,其上楹谓之税。”郭璞注:“侏儒柱也。”“楹”有“侏儒柱”义可参考《释名·释宫室》:“楹,梁上短柱也。楹侏儒犹侏儒短,故以名之也。”宋李诫《营造法式·大

木作制度二·侏儒柱》:“侏儒柱,其名有六:一曰税,二曰侏儒柱,三曰浮柱,四曰楹,五曰上楹,六曰蜀柱。”从后来的词义发展来看,在“侏儒柱”义上二字同源。

术语“依字”在《释文》中出现一百余频次,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和用法。从术语本身含义分析,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之词义者,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中所承载之词义者。所依之字有《释文》所注经典注解之字,亦有陆氏本人注语中出现之字。前者有依此字的常用音义者,有依此字在文中承载的借义者。从术语“依字”的使用情况分析,陆氏用“依字”辨析误用、混用字,用“依字”显示字、词对应的复杂关系,用“依字”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同一个术语“依字”,我们在研读时要结合具体文本及注释情况仔细斟酌,方能做出较为准确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 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 [3]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5] 朱熹集注.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6] 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编辑 南山)

“门”的语法化分析

王春江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随着汉语的发展,实词“门”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出了复数标记“们”和量词“门”。二者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基础:一是“门”与“们”音形义紧密关联;二是经常出现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表复数。“门”发展为量词的基础:一是“门”频繁的位于数词之后,被不断的量化;二是“一门”频繁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

[关键词] 门; 们; 语法化; 复数标记; 量词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94-06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语法化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角度主要包括语法化的定义、语法化产生的动因和机制、汉语历时发展过程中各类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现象、具体词汇的语法化过程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语法化的定义越来越具体。石毓智提出:“语法化——一个新兴语法手段产生的历时过程。语法手段包括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两大类。在汉语语法史上,一个语法化过程往往同时涉及新标记和新结构的产生,两者经常是同一变化的两个方面。”^{[1]2}如汉语中“完成”类动词“尽、已、了”等在语法化过程中产生了“范围标记、时态标记、结句标记”等用法。同时,句法位置也发生了改变。目前,研究汉语具体词汇语法化的文章不少,但尚未见到专门讨论“门”的语法化的文章。随着汉语的历时变化,“门”也发生了语法化:在词义上,发展出了虚化义;在结构上,虚化后的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产生了新的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并发生语音弱化。实词“门”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为复数标记“们”和量词“门”。

二、汉语复数标记的产生与“门”的语法化

1. 汉语复数标记的产生与词缀“们”的来源

汉语是兼有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的语言,“们”是现代汉语中唯一的复数标记。“复数形尾在唐代还只是初步使用,但到了宋代以后,它便立即风行起来。在标准语中成了一个极常用的语尾。”^[2]关于“们”作为复数标记的来源,前人主要有以下观点:

(1)“门”源说:石毓智、李讷、李艳惠认为“们”与某些方言中的复数标记“家”的发展具有平行性,且《敦煌变文》中“们”与“家”是同义词,并就此推测“们”源于“门”。石毓智、李讷认为:“们”来自原来表示“家庭”“一组”“学派”的“门”,在“门”虚化为复数以后,因为它只限于与人有关,而且语音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丢失声调以及鼻音韵尾-m 弱化),人们就加上一个“立人”偏旁以示区别。^{[1]330}太田辰夫(1958)、俞敏(1989)、张惠英(1995、1997)等人也认为“们”来源于“门”。

(2)“辈”源说:吕叔湘认为“们”可能源于“辈”。“们”与“辈”的用法相同,都仅用于代词或

[收稿日期] 2019-07-19

[作者简介] 王春江,女,山西忻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人名词后,语音上“们”与“辈”都是双唇音,虽有塞音和鼻音的区别,但谐声字和方言中不乏通转的例子。冯春田赞同“辈”字说。他考察了宋代文献中“们”缀的用例,认为在早期阶段“们”缀还带有“辈”字之类的语义色彩,可以看出“们”由“辈”“等”义向复数词尾演变的痕迹。又从明代笔记中找到“辈”作“们”缀的用例,进一步论证“们”缀来源于“辈”。^[3]

(3)“物”源说:江蓝生认为“们”源于“物”,认为复数词尾“弭、弥”是其语源“物”脱尾音变的结果;“每、伟”是“弭、弥”的方言变体;而“门”组字不是从“物”纵向音变而来的,而是通过其白读音[mei]跟“每”读音相同而充当复数词尾标记,最后又以其文读音[men]取代白读音[mei]的。并举出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里的一些事实,说明疑问代词“麼”(包括样态指示词“麼”)跟复数词尾“们”或有音转关系,或用字相同,进一步论证二者的同源关系。

几种看法从语音、语义、用法、字形上对“们”缀的来源进行了探索,都有一定的道理,如“辈”源说着眼于语法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有丰富的语料支撑;“物”源说着眼于语法演变的系统性,可以解释现代许多方言中的“么”“们”同音现象;“门”源说多着眼于现代方言发展的平行性,字形上也易于说明。但学界认为这些试图通过分析多种写法找到一条语音演变的轨迹观点还存在如下问题:“辈”源说不能从语音上充分说明由“辈”到“们”的音变;“物”源说问题在于这种同音可能是同源的结果,还可能是音变后的趋同所致,“物”源说用于指人名词或代词后表类属的用法也缺乏文献上的支持;“门”源说得不到历史文献所反映的语言事实的充分支持。总之,“门”缀的来源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们”缀来源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对“们”缀来源之所以莫衷一是,是因为如下问题:(1)为何会有多种书写形式。如蒋绍愚认为“如果它(们)真是由表示‘学派’、‘家族’的‘门’虚化而来的,其发展线索很清楚,写法应不至于如此分歧”。^[15](2)为何有的书写形式语音差别较大。都是记音字,但有些字的读音与“们”差别甚远。学者们试图通过分析多种写法找到一条语音演变的轨迹,但会遇到问题,如“唐宋元明之际,这两类记音字曾有过弭>们>每>们的反复变化”。^[3]对此,吕叔湘曾用南北系方言进行解释:“‘们’与

‘每’之消长,无非由于两种方言之伸绌而已”。“当北方盛用‘每’字之际,南方固依然用‘们’,南宋话本可为代表”。^{[4]789}但又出现了下述(3)的问题。(3)为何所有写法最后统一为“们”。吕叔湘提出:“何以到了元代以后北方系官话也不说‘每’而说‘们’,以致在现代的北方方言里找不着‘每’的痕迹?这还是不容易解答。”

梅祖麟认为“们”缀的-n尾是从阿尔泰语借来的。虽然该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却提示我们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在探讨“们”缀来源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从历时演变和共时比较的角度来试着解决以上分析“们”缀来源时遇到的问题。

(1)不同的写法是不明语源而产生的不同记音字。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听音为字”是记录汉语时常见的现象。袁宾认为,“们、门、每、瞒、懣”这几个字实际上表示同一个后缀。祖生利把“弥、彌、伟、满、瞒、懣、门、们、每”看作是“们”缀的不同书写形式。吕叔湘认为,远在“您”“俺”之先,已有表复数之词“m-”存在。此即证明,“们”是一个口语词,“懣”“们”“每”均为表音字。这一点还可从“们”最先出现在“诸宫调”和“话本”中得到证实。诸宫调、话本是宋代说唱的底本,常使用不同的写法记录同一口语音。一个新词或语法标记会最先出现在口语中。“口语是语言的源泉,许多新词产生于口语。一词出现后往往先在人们的口头中流传,经过口语这个锻造车间的千锤百炼,优胜者进入了标准语的词库,成为语言体系的一分子。”^{[5]20}而操这种语言的人群不一定都通晓它的演变过程,因此,在产生之初,书面上会出现诸多分歧。

(2)不同记音字是受方言或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众多,语音差别较大,在实际运用中,人们更愿意选择接近实际语音的字,因此,不同方言区的人或少数民族的人学汉语共同语时,语音上会出现偏差。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地区方言对“们”缀写法的影响,如吕叔湘认为南北系方言的差异造成“们”与“每”之消长。邓兴峰认为,汉语复数形尾直接源自西北方言。当时长安是唐朝国都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西北方言凭借此种优势,必然会对当时的标准语产生影响。单纯的方言影响无法解释何以元代以“每”为主,而语言的接触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宋元时期是汉族跟少数民族杂居和交往非常

密切的时期。“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语言和北方汉语势必发生接触,对汉语产生一定影响,‘每’记录的可能就是这种受影响后的北系方言音。今天有些北方话说‘门’字时收尾鼻音仍不明显,如西安话、济南话都说成[$\text{cm}\tilde{\text{e}}$],只是鼻化韵,而不是用鼻音[n]收尾”。^{[6]39-40}对于宋元汉语中“们”缀不少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用法,如非指人名词后加“们”,祖生利赞同太田辰夫、梅祖麟、孙锡信等人的看法,认为元代非指人名词后加“们”的用法是当时北方某些地区(如大都)实际口语的一种反映,不过这种用法非汉语本身所固有,而是一种“汉儿言语”现象,是元代蒙古人所说蒙式汉语影响渗透的结果。元代明初直译体文献中,指人名词加“们”后,前面用确定数量词限制用例较多,这是硬译蒙古语静词复数形式的结果。可见,当时蒙语对汉语的影响广泛。元代,文献中“们”缀除少数写作“们”“门”外,多数情况下写作“每”字,我们认为这同样是受蒙古语的影响。如:

①将一十七个先生每剃了头。(白话元碑,引自吕叔湘 1985:68)

②那三百人每尽数珍灭了。(元朝秘史,引自吕叔湘 1985:68)

这些例子均出现在汉译蒙语的文献中,结合元代将蒙古语定为国语的语言政策可以推断,元代“每”的广泛使用,很大可能是受蒙语影响。

(3)明朝语言政策促使汉语复数标记统一为“们”。政治的统一促进语言的同一。如果单从语音演变来阐释,不足以解释何以明代统一用“们”。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较特殊的一个朝代,其特殊性体现为:明朝是夹在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朝和清朝的中间朝代。在语言政策上,明朝首先学习了宋朝编纂的《礼部韵略》,在此基础上,编纂了《洪武正韵》来指导民间和官方的语言运用。朱元璋打着“恢复汉制”的旗号推翻元朝,立国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复古措施,涉及政治、礼教、文化等众多领域。明朝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行文风格,建立了官方语言运用的实用性规范,这一语言文字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使明朝的语言使用逐渐规范化。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们”的起源,我们更倾向于“门”源说,不仅因为这一来源能更好地解释“们”为何只能出现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表示复数,还因为“门”源说能更好地解决当前对“们”的来源探索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们”用于代词或

指人的名词后表复数,始见于宋代。当时多个政权并存,各国相互交往频繁,受方言或语言接触的影响,汉语口语中已存在的复数词尾[men]缀出现了不同的记音字。“瞞、满、漚”等是不明“们”语源而产生的不同记音字。经历了多国的对峙,元朝统一政权,在语言的使用上极力推行蒙古语,表达复数词尾多用“每”字。“待到元亡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原来的北方系官话已经不再被推崇,逐渐失去了对中原方言的影响”。^[7]“们”缀明朝以后渐趋统一而一般写作“们”。我们认为,这是受明统治者语言政策的影响。任何词汇形式的保留,都是以经济性、明晰性为原则,废弃其他不同的写法,而独保留和推行“们”为复数标记,结合明代统治者的语言政策,不难得出,“们”才是汉语复数标记的“本土符号”,“每”是受蒙语影响的记音符号。这一点还可以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以及《水浒传》中多用“们”字得到验证。因为这些书的写作和印刷都是在南方,元朝政权在北方,对南方官话影响较小。与“们”的用例比起来,除了“每”,其他写法的字用例很少并最终淘汰,进一步说明,其他写法是受方言或外族语影响,而“们”才是能更好地反映其语源“门”的记音符号。

3.“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条件

“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不仅因为其字形、语音、语义联系直观,还因为其有符合演变的句法环境。

(1)“们”与“门”的音形义关联

相比其他来源,“们”与“门”在字形、语音、语义方面关系最直观、最紧密,且“南渡以前殆有‘门’而无‘们’也。”^{[4]787}“们”与“门”声韵相同。“门”在甲骨文时期就已产生,本义是建筑物的出入口可供开关的装置,引申指“家庭、家族、学派”,“家庭、家族、学派”由多人构成,“门”出现在代词/指人的名词后表示这一意义,因此,发展为指人的复数标记。《汉字字源词典》:“们,形声字,亻表意,其古文字形体像一个站立着的人,门表声,门里常居住多人因而有多义”。为了更好地表示“们”为指人的复数标记,因而加亻旁。

(2)“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句法环境

语法化不光是由语义决定的,还受到语法位置的影响。“代词/指人的名词+(之)+门”的结构是“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句法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代词/指人的名词+(之)+门”的结构,“门”指家庭、学派。例如:

①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墨子》)

②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入于尧之门。(《吕氏春秋》)

③大臣之门,唯恐多人。(《韩非子》)

汉朝时出现“代词/指人的名词+门”结构,“门”指家族、学派。例如:

④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史记》)

⑤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论衡》)

⑥儒生说名於儒门,过俗人远也。(《论衡》)

唐五代时出现“人称代词+门”。其中“门”多指“家庭”。例如:

⑦说着上由(尚犹)皆惊怕,如何祝娉向他门。(《敦煌变文》)

⑧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霍小玉传》)

⑨娉与他门荣九族,一场喜庆卒难论。(《敦煌变文》)

宋朝时,“代词/指人的名词+们”结构表复数,有时还用“门”。例如:

⑩秀秀道:“既如此,你们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宋话本)

⑪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门,得人怜,秦吉了。(《全宋词》)

⑫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一半路,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宋话本)

综上所述,“们”与“门”的音形义关联是“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前提和基础,“家庭、家族、学派”是“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语义基础。门(们)常出现在代词/指人的名词之后表示家庭、家族、学派,促使“门(们)”发展为复数标记,复数标记“们”也只能跟这些词搭配表复数。“家庭、家族、学派”都是由多人构成,因此“们”只限于表示人的复数。

三、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门”的语法化

1.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个体量词“门”的来源

对于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时间,学界大多认为萌芽于先秦,盛行于唐宋以后,必须强制出现在数词、名词之间表示称量出现于十五世纪左右。先秦汉语的个体量词处于刚刚萌芽阶段,个体量

词并不多见,且个体量词不必强制性地出现在表量结构中。汉代以后,量词获得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魏晋以后个体量词成批出现,“数+量+名”结构成为基本的称数计量方式。唐宋时期,个体量词已很丰富,现代汉语中的各类量词在唐宋时已经出现,只是数量比现代少些,使用频率也不如现代高。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仍袭用旧时语法,在数词和名词结合时可以不参以量词,例如“三山”“五湖”“千帆”等。^{[8]282}个体量词“门”在宋代时与指示代词“这”连用,后接名词,形式上近似量词,宋以后发展出量词用法。

汉语中量词多由名词虚化而来。王力指出:“一般说来,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的,并且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来的。”^{[9]279}个体量词的产生是部分名词虚化的结果,汉语作为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无法通过语言形态本身来表现单复数变化,随着人类思维的精密化,人们在表达物体的精确数量时迫切需要一个东西来称量,个体量词应运而生。个体量词的产生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表达事物,同时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认知特点和语言对物体的范畴化作用。名词的实体性容易成为人们的认知原型,因此量词多由名词虚化而来。对于量词“门”的来源,侯瑞隆认为,个体量词“门”是从名词“门”的“门派”“类别”义发展出来的,其认知基础是“门”区别不同门户、人家的功能。惠红军认为:“门”在现代汉语中称量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人”和“人结成的社会关系”。如:压根儿连提都不敢提自己有这么一门亲戚。(梅芷《细细排起来》)并指出:这也是“门”的早期称量对象。我们认为,量词“门”来源于名词“门”的“家庭、家族”义,“门派”“类别”义是“门”的“家庭”“家族”义引申而来。因此,“门”最先称量的是与“家庭、家族”义紧密相关的亲戚、亲事。

2. “门”虚化为量词的条件

(1) “门”虚化为量词的句法环境

量词“门”的产生除了受到汉语个体量词发展规律的制约外,还受其句法环境的影响。“数词/指示代词+门+名词”结构的出现,促使“门”由名词向量词转化。

西周时期,“门”便与数词结合,但目前可见用例很少,有“一门”“四门”“九门”。春秋战国时期,可用来与“门”搭配的数词有所增加,出现“一门”“三门”“四门”“九门”“百门”。汉朝,与“门”搭配的数词进一步增加,出现“一门”“二门”“三

门”“四门”“五门”“八门”“九门”“十门”“四百四十门”“千门”。至此,“门”几乎可以与任意数词搭配。与数词连用成了“门”的常规用法。例如:

①一曰居一门中。(《山海经》)

②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左传》)

③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淮南子》)

宋朝时“门”与“这”“那”连用,出现了“这+门+名”的结构,但用例很少。例如:

④大官人见庄门闭着,不去敲那门,就地上捉一块砖儿,撒放屋上。(《警世通言》)

⑤这门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儿滴滴地?(《快嘴李翠莲记》)

元明清时期,“一门”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用法扩大,用例非常普遍。例如:

⑥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如此难堪,怎忍叫他家也到这地位!(《二刻拍案惊奇》)

⑦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红楼梦》)

⑧于是一门皆哭临,安厝尽礼。(《聊斋志异》)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门+亲事/亲戚”和“这/那+(数)门+名”的用法,即“指示代词/数词+(数词)门+名词”的结构。例如:

⑨贤弟,也是我与你相处一场,明日与你议一门亲,生下一男半女,也不失姜姓之后。(《封神演义》)

⑩贾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爷那边,不曾听得这门亲戚。”(《红楼梦》)

⑪走了半日,肚子里饿了,没处打尖,见这门庙门上挂着个饭幌子,就在这里歇下。(《儿女英雄》)

“门”虚化为量词,受其所处的句法环境的影响。“能够引发某一词汇语法化的句法格式的先决条件是,该格式必须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1]328}“门”前数词范围和使用频率的扩大是“门”语法化的基础。“门”后名词的出现,以及“指示代词/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的大量使用,促使“门”发生了语法化。与数词搭配的“门”的语义由本义衍生出家庭义,由区分不同的家庭衍生出“类别”义,数词的功能是序数和计量的,因此与名词结合时,其后的名词便是可以计量和称数的,“门”频繁的位于数词之后,被不断的量化,便产生了量词的用法。结构中名词为何先出现“亲戚/亲事”,我们认为这与元明清时期,“一门”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用法普遍有关。至于南宋时期出现的少数“这+门+名”的用法,不具有普

遍性,只能看作是“门”后出现名词的过渡。

(2)“门”虚化为量词的语义制约

现代汉语中用“门”计量的名词范围扩大,数量变多,“指示代词/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中的名词可以是学科、学问、行业、款项、心思等。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量词和名词的搭配,并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约定俗成”,而是有认知理据的,要受到制约。个体量词“门”所能搭配的名词,受到名词“门”意义的制约和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名词“门”指家庭、家族,便用来称量跟家族或家庭有关的事项;名词“门”指学术思想上的派别,所以“门”后可接学科、学问、行业等;“思想派别”义是由“师门”义引申而来,所以其后可接语言、技术、学问等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的某种知识和技能;名词“门”有类别义,因此“门”扩大为不同事项的量的指称词,如作为大炮、款项、心思等的量词。分析发现,用量词“门”称量是建立在“房门”“大炮”“钱款”这几类事物的认知原型基础之上的,所接名词能够反映“门”的语义特征。至于用“门”来称量心思,“心思”是一个抽象名词,用“门”来称量是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人将“心”当作思维的器官,所谓“心之官则思”。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将它隐喻作“房子”来加以认识,因此,汉语中有“心房”“心室”的说法。是房子必有房门,所以,会用“门”来计量。

综上所述,量词“门”由名词“门”虚化而来,宋代有近似量词的用法,宋以后发展出量词。量词“门”所称量对象受到名词“门”语义和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只能用来修饰认知原型上与“门”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事物,即被量化的名词常常体现“门”的语义特征。元明清时期,“一门”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用法普遍,这是量词“门”产生的语义基础。此外,量词“门”的产生还受到句法环境的影响,数词的序数和计量功能以及“指示代词/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的大量使用,促使“门”发生了语法化。

四、结论

随着语言的发展,实词“门”发展出了虚化意义,发生了语法化:一是虚化为词缀;一是虚化为量词。这两个过程是相继发生又相互制约的。复数标记“们”产生于十到十一世纪之间,当“们”进一步向普通名词复数标记发展的时候,量词系统最终建立,制约了“数+名+们”结构的出现。配合量词系统的建立,“门”向量词虚化,出现“数+门+

(下转第123页)

我国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几个问题商榷^{*}

——以《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为例

周继祥 傅文茹

(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61)

[摘 要] 我国目前一些省级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各省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为国家制定统一的《家庭教育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有一些问题还有待商榷。本文就以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为例分析我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立法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即该《条例》未跳出狭义家庭教育的窠臼;主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厘清;《条例》中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应更多一些;《条例》的立法前瞻性不够。

[关键词] 家庭教育立法; 问题;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中图分类号] G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099-03

教育是国家精神命脉延续之根本,家庭教育更是一切教育的基石。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论述“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性。他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是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他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1]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通过,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一地方法规的制定,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扎实举措,对促进江苏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增进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及提升民族整体素质具有重要

意义。

一、《条例》的特色和亮点

该《条例》具有的特色和亮点主要有:

第一,《条例》强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责任。《条例》规定立德树人是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家庭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培育良好家风,促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条例》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涵,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适时开展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责任、道德修养、行为规范、文明礼仪、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生活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养成优良品德、健全人格、劳动精神和良好行为习惯。

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异化、不当等问题,《条例》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和行为习惯,注重言传

^{*}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学校、家庭、社会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K19120),合肥师范学院 2018 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合肥市行知学校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项目”(项目编号:2018xqsj04)。

[收稿日期] 2019-10-08

[作者简介] 周继祥,男,安徽全椒人,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兼职律师。

傅文茹,女,安徽肥东人,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身教,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影响未成年人,避免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要求,营造文明和睦的家庭教育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

《条例》还强调了父母双方应当共同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对离异家庭、外出务工等特殊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第二,《条例》强调家庭教育需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共同通力合作。《条例》设置了“家庭实施”“政府推进”“学校指导”“社会参与”四章对如何促进家庭教育加以规范^[2]。

第三,《条例》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增强约束性、强制性,体现法规的严肃性、惩罚性。

第四,《条例》设立主题宣传周,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工作。

虽然《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有着较为明显的特色和亮点,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二、《条例》存在的问题

2019年2月23日新华网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内容,该文件提出了2035年主要发展目标有八个,第一个就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而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中,我国的学校教育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却发展缓慢,还是我们的短板,这和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我们重视程度不够有关。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提高到了美好的标准,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自身生活品质提供更优的服务,人民对这方面的物质建设和制度创新需求日益强烈。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家庭教育要高度重视起来。……无论何时,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把家长引导和培育成立德树人的一支有生力量。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支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

《条例》是我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最新的立法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笔者认为《条例》仍有以下几点缺憾:

1.《条例》未跳出狭义家庭教育的窠臼

家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我国现实语

境下,多为狭义的家庭教育,即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被监护人的教育。《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监护能力的家庭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和生活实践,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正面引导和积极影响。狭义的家庭教育很明显和“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目标不一致。根据杜瓦尔(Duvall)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育儿阶段只是家庭生活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虽然当今社会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非常突出,但家庭教育不应仅仅是要解决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更多的应该关注家庭全部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家庭的和睦、幸福、文明有赖于全体家庭成员的努力,全体家庭成员都应受教育,不应局限于家长对未成年家庭成员的教育。所以广义的家庭教育应是“对每位家庭成员的教育”。

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教育,系指具有增进家人关系与家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动”^[3],并明确列举了六种教育,即:亲职教育、子职教育、两性教育、婚姻教育、伦理教育、家庭资源与管理教育,同时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家庭教育事项”,此种应为家庭教育的广义定义。对比广义和狭义的定义,笔者认为广义的定义更科学一些,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未成年人需要受教育,同样家长也需要接受教育;家庭教育的目标也不应是单一的,如解决不要出现“熊孩子”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是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建设一个健康、积极向上发展的家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转型,诸如婚姻关系不稳定的问题、围绕养老而引发的冲突问题逐渐成为威胁家庭和谐稳定的大杀手。近些年来因家庭矛盾冲突而发生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并呈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家庭教育问题即“教子问题”。

因教育体制的弊端,绝大多数人在成年前或后都没有受过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子女”等方面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组建家庭时,对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还是一张白纸,在组建家庭后也是也很少有途径去接受关于家庭的教育。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著作《给父母的建议》中谈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所有人都会成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4]9-10}所以我们不仅要强化家长的责任,教育家长,更应注重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家庭生活知能。

2. 主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厘清

家庭教育早已超越了“父兄事也”的阶段,“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健康了国家才能健康,家庭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更加重视家庭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通过立法来推动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法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家需要依职权对家庭教育进行有效治理,首先就是要明确家庭教育的合适主管部门。

《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教育部门、妇女联合会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根据这条的规定,我国家庭教育的牵头部门仍然是全国妇联。这种管理体制很显然是建立在狭义家庭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是不合适的,也不利于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家庭教育的主管机构应明确为教育部,而不应是全国妇联。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急需变革,以适应到2035年“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目标。教育部的内设管理机构主要是按照学历和职业教育来划分的,没有设立专门管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设机构。我们追求更多的是学历提高和职业的适应性,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忽略了育人的协同效果,服务于家庭健康发展的保障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制度设计的缺陷会导致再多的努力也不会取得大的效果突破。

3.《条例》中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应更多一些

《条例》中虽然从家庭、政府、学校和社会四个方面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职责,也有不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但还不完善。例如没有每个地区应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具体实施家庭教育工作部门的具体职责、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学校办家庭教育应区别学校的层级,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具体的办家庭教育的种类及最低时数。社区教育机构办家庭教育没有具体细化的规定。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家庭价值观建设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庭

教育的核心任务。推行价值观教育需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与融合。《条例》中缺乏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措施。

4.《条例》的立法前瞻性不够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家庭变迁加快,物质生活的丰富而便捷、资讯的爆炸、教育的开放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本身不是坏事,但鱼龙混杂的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出现,诸如在婚姻关系、子女教育、家庭成员沟通、生育观念、家庭伦理、两性教育等方面的家庭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仅仅局限于教子的家庭教育没有一定的前瞻性。

虽然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活动不能解决所有的家庭问题,但可以促进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和谐并增进成员进行家庭生活的知识和能力,预防诸多家庭问题的产生。例如,开设婚前的家庭教育课程是为了培养正确之婚姻观念,促进家庭美满。开设家庭沟通课程可以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开设家事指导课程,可以锻炼家庭成员生活自理能力,加强家庭资源管理。

三、结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每个人都应树立一个终身学习的理念。家庭教育不只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教育”问题,应指“具有增进家人关系与家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动”。教育的现代化应包括家庭教育的现代化,家庭教育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应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新的制度设计、完备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立法的前瞻性。

[参考文献]

- [1] 张俊国.从未消失过的记忆与温暖[N].学习时报,2018-08-29(5).
- [2] 江苏省人大.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N].新华日报,2019-04-12(4).
- [3] 戴双翔,熊少严.台湾家庭教育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J].教育导刊,2008(2):27-30.
- [4] 苏霍姆林斯基.给父母的建议[M].罗亦超,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及其监管

何 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600)

[摘要] 职业放贷人的出现,表明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趋向于职业化、规模化,其影响日益广泛。目前我国自然人职业放贷行业乱象频发,反映出相关立法和监管的阙漏。自然人职业放贷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它具有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和持续营业性,属于商事性民间借贷,故借贷双方实际为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或金融业务经营者与金融消费者的关系。建议加快立法并加强监管,让自然人职业放贷合法化、阳光化,并加大对借款人正当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 自然人; 职业放贷人; 商事性民间借贷; 金融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02-05

职业放贷与一般民间借贷、职业放贷人与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行为方式上,职业放贷人通过针对不特定对象的连续性放贷,实现营利目的,即放贷行为具有营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在职业放贷人法律规制方面,我国立法存在阙漏,导致民间借贷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因此需要在监管方面做出努力。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就自然人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立法方面,并未对职业放贷人进行具体定义,但可以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进行总结,即职业放贷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不特定对象进行连续性放贷业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①。“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权利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1]142}对于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主体,其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方式是不一样的。在职业放贷法律关系中,职业放贷人与借款人作

为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分别为债权人和债务人。若单对法律关系进行认定,似乎只能将其作为普通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通过民事法律进行规制^{[2]330}。然而,根据我国职业放贷行业实际情况来看,不规范的职业放贷活动极易对债务人的权益造成侵害,职业放贷人往往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资金优势谋求不正当利益,如“套路贷”案件等刑事案件的频发^②。在这种情况下,若严格遵守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合同双方主体的平等原则,那么就不宜对债务人进行特别保护。结合我国具体司法实践,职业放贷人主体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往往表现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于法人、非法人组织这类组织体类型职业放贷人而言,可以参考小额放贷公司的相关规定,本文在这里不深入探究^{③[3]}。

在这里主要提出的问题是:自然人职业放贷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更进一步地对职业放贷行为的具体法律关系进行认定。最后,在具体的立法层面,提

[收稿日期] 2019-11-10

[作者简介] 何 煊,男,江苏镇江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参见《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部分,银保监发[2018]10号。

② 参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8起“套路贷”典型案例》,2018年10月24日发布。

③ 参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出对于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监管思路。

二、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特点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1. 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特点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提出了商事性民间借贷的概念,因其具有的营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特征,主张将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民间借贷的有益补充,进行特别的立法规制^[4]。因为就不同的职业放贷主体而言,其在交易行为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方面是不同的,作为自然人的职业放贷人所进行的放贷活动相比于法人、非法人组织而言,在规模、职业化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所进行的放贷活动,主要以日常生活、经营为需求,一般认为是民间借贷行为^①。倘若自然人开展的放贷行为具有明显的营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特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自然人认定为职业放贷人。那么这样的职业放贷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的区别究竟为何?在这里,就不得对商行为、商事性民间借贷进行探析。

“自然人可以作为商行为主体并进行商事活动,属于商个人。商个人是指具有商事权利能力和商事行为能力,独立从事商行为,依法履行商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自然人。”^{[5] 37} 自然人作为拥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可以以商品生产者或商品经营者的身份参与到商事交易中。“商行为可以定义为:是商人所实施的以营利为目的,能够引起商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设立或变更或终止的营业行为。”^{[5] 59} 就自然人职业放贷而言,其满足商主体和商行为的特征,与一般的民间借贷具有显著的区别,具有营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特点。因此,可以赞同商事性民间借贷概念的构建,对于商事性民间借贷可以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作为民间借贷的重要补充。

2. 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分析

对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首先需要针对金融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对金融及金融关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金融本身是

一种经济活动,金融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与完善的产物,是现代经济的核心。”^{[6] 2-4}“金融关系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心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发生在金融监管、调控活动和金融业务活动过程中,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分不开的,是一种与银行信用和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7] 5}若依照这样的观点,其他如财政收支、民间借贷等关系,虽然也已资金融通为手段和目的,但不属于金融关系。

因此,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出民间金融这一概念,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的,是政府金融管制之外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8];“民间金融指的是不受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监管的民间融资活动的总和,具体表现形式为地下钱庄、民间理财公司、租赁公司等,这样的金融活动未被纳入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中。”^[9]可见,将民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归入民间金融概念有一定的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概念下,形成广义的金融概念^②。作为商事主体的自然人,自然也能从事金融业务。在笔者倾向于将自然人职业放贷行为定义为金融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民间借贷抑或商事性民间借贷,以此达到加强对职业放贷行为的监管以及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目的。

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数据流通和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交易过程的关键。“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升级,金融消费产品日益丰富,在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的抉择难度,欺诈性合同条款不断出现。”^[10]对于民间借贷而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一对一的简单关系,债权人往往成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债务人则成为提供金融产品的机构,两者类似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11]。诚然,市场经济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市场中掌握着较多信息的一方往往能够控制交易过程,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自然人开展的职业放贷活动信息掌握、资金获取等方面,相比于作为交易相对方的金融消费者即借款人而言,存在着较大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② 学界一般倾向于将金融机构开展的与资金融通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定义为金融,笔者认为此种语境下的金融属于狭义金融。

差距。后者在信息获得、专业知识以及维权意识和能力方面较为薄弱,处于弱势地位。在交易过程中,也极易受到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目的的职业放贷人的侵害,这种侵害可以表现为欺诈、胁迫等严重危害借款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就作为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而言。自然人类型的职业放贷人所开展的放贷活动为商事性民间借贷活动,即归属于广义的民间借贷概念,又属于广义上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在主体范围上,只包括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自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活动。因此,自然人开展职业放贷活动时,在法律性质上应当属于提供金融服务、销售金融产品的商事经营者。而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借款人,则属于金融消费者。

三、我国自然人职业放贷中的问题与成因

1. 目前我国自然人职业放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改革,我国民间资本市场日益兴盛。随着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为我国民间借贷制度敲响了警钟。“自2011年4月以来,温州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企业倒闭潮的生成的连锁效应,也导致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垮塌和民间借贷市场的动荡和混乱,民间金融体系日渐崩坏,引发民间金融诚信危机。”^[12]

自2017年、2018年以来,“套路贷”行为逐渐进入公众视线。在行为方式上,主要包括以欺诈、胁迫、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等方式,损害被害人人身和财产权益^[13]。多地法院相继出台相关意见,意在职业放贷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尽管建立了相关职业放贷人名录,职业放贷人行业所处的困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1) 借款合同条款不规范,影响公平交易

通过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是职业放贷行为的基本行为方式。基于商事效率原则,职业放贷人不可能通过重复拟定借款合同保障交易的公平和安全。这就意味着在借款合同中必将出现大量的格式条款,这种格式条款包含了减少自身义务、加重借款人责任等内容,而这些条款对于缺少

一定专业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借款人来说极为不利,最终影响合同权利义务的公平实现。例如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套路贷”案例中,张某通过提供填空式格式条款,谋取非法利益,侵害债务人李某的权益^①。

(2) 私力救济的滥用,侵害债务人人身权益

自然人在职业放贷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私力救济等违法犯罪手段,如威胁、绑架、非法拘禁等,强行实现自己的债权。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中,陈寅岗等人通过殴打、非法拘禁、虚假诉讼等非法手段实现债权,造成许嘉平人身财产权益受损^②。另一方面,这些职业放贷人由于其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在借款人无力偿还欠款时,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强行实现债权。

2.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 民间融资渠道不畅

我国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在近几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14];2015年审结142万件,同比增长38.67%^[15]。这些数据在客观上表明了我国民间融资需求的增长。

然而,在融资渠道方面,除了我国法律规定的正规金融活动外,民间融资手段较为匮乏。这导致了民间借贷市场前景“灿烂”,一定程度方面促使越来越多的自然人运用自有资金参与到放贷行业中。

(2) 职业放贷法律制度缺失,监管处于灰色地带

就职业放贷人立法而言,我国立法机关虽然早已有建立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的意向。2008年,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试点,先行投入民间借贷市场。国务院法制办于2015年发布《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就非存款类放贷组织的各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因各种原因,该条例最终未能通过。《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及《关

① 参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8起“套路贷”典型案例之三:李某诉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2018)浙03民终2087号。

② 参见《陈寅岗等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诈骗罪》(2017)沪0106刑初892号、(2017)沪02刑终1182号。

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只是对民间借贷笼统地规定,而并未涉及到职业放贷人。

各地高院虽然在近两年相继出台了针对职业放贷人的指导意见,但其缺乏统一的规定,文件的效力级别也不够高,因而不能作为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规制和监管依据。

(3) 借款人风险防控和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

在自然人职业放贷中,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加上借款人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导致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透彻,亦有遭受欺诈、胁迫的风险。所谓的“套路贷”就是利用借款人的疏于防范,职业放贷人在合同交易过程中运用一系列手段,达到侵占借款人财产利益的目的。目前,我国的法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公民在遭受侵害后首先想到的往往并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私了”,助长了职业放贷人的不法行为。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对于职业放贷人所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是远不能满足实际发展需求的,必须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以达到对职业放贷人的监管目的。

四、完善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立法和加强监管的路径分析

1. 尽快出台相关立法,让自然人职业放贷合法化、阳光化

英美等国早于20世纪初便建立起以借款人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放贷人法,其中对于借款人正当权益的规定逐步充实^①。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早期的计划经济过渡,对于经济活动依然保留一定程度上的政府权力干预,出现“权力主导”的特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需求的增长,以往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目前来看,《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已经迫在眉睫,可以参考《征求意见稿》中的总则、设立与终止、业务经营、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章节的内容,对自然人职业放贷形式进行全面的規定。

2. 加强自然人职业放贷业的自律管理

就以往而言,政府“父爱主义”的监管方式,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停滞。对于职业放贷人的监管思路,应当进行适度转变,将政府从“守夜人”变为“参与者”,适度放松事前监管,即从

立法上就市场准入等具体方面做出规定;同时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主要在于保障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借款人权益,丰富司法救济措施,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追究。

由于自然人的职业放贷活动相比于组织类职业放贷活动在组织、影响力方面都有所不及,因此,可以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建立相应的行业自律组织,实行自律监管。同时可以仿照部分省份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由自律组织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将特定区域内的职业放贷人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范。在监管的主要内容上,应当规范借款合同内容,对格式条款内容做出一定的限制,保障合同的实质公平。

3. 尽快引入自然人破产制度

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行,法院案件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在社会信用体系、信用制度尚未完善的今天,“执行难”问题影响法院正常工作,严重损害了国家公权力机关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作为债权人的职业放贷人在无法通过正常的诉讼、执行程序实现自身的权益时,私力救济的使用也就不可避免。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利于使债务人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不仅有利于债权债务矛盾的解决,更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公民关系的和谐,对于借款人和职业放贷人而言,都大有裨益。

4. 严惩自然人职业放贷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类似“套路贷”的非法借贷活动,则要坚决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制裁,坚决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利益,对于犯罪行为应当“零容忍”。然而,“‘套路贷’并不是一个刑法概念,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或者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16]。要严格按照刑法中对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的具体构成要件,而不能给被告人冠以“套路贷”罪。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合理运用刑事法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合法民间借贷与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将合法民间借贷纳入打击范围内。

当前,职业放贷行业乱象频发,为了对职业放贷人进行法律规制,首先要对各类职业放贷人法律性质进行界定,而不能将之一概(下转第116页)

^① 参见英国《消费信贷法》、美国《诚实信贷法》。

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初探

孟 涵 陈 烨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时代快速发展的产物之一,将成为网络犯罪的核心对抗点。数据作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的资产,与数据相关网络犯罪的防治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由于对数据进行的犯罪成本并不高,并且大多以牟利为目的,犯罪成本与所得收益比例之间不协调,犯罪的预防效果不佳。因其属于新类型犯罪,犯罪手法新颖,手段不可预知,现行立法缺乏对网络犯罪刑事法制的规制,不管从立法司法还是定罪与刑罚问题上都存在的一定的漏洞。如何防控人工智能涉及的数据网络犯罪,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数据网络犯罪; 定罪量刑; 风险防控; 谦抑主义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06-04

一、问题的提出

1. 网络犯罪及数据保护的现状

网络犯罪的范围涉猎较广,侵害性也逐渐增大。有调查表明,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网民的个人信息曾被盗窃、泄露。相应的数据显示,网络欺诈行为大多通过移动设备进行,其中又有绝大多数源自移动应用程序。一旦网络犯罪分子通过获取到移动设备的访问权限进入到注册的移动银行应用程序,便会启动多级网络犯罪活动。截至 2016 年,我国各地公安已侦破网络犯罪七千多件,共抓捕网络犯罪嫌疑人 1.8 万余人。2017 年 1 月份的政法会议上,相关部门领导人指出中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

网络犯罪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大至侵犯国家安全,比如利用网络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国家安全以及政治稳定造成损害,以及对公共秩序造成了扰乱,消减了政府权威乃至司法公信;小至每一个在网络空间中活跃的行为人都受到侮辱诽谤、恶意攻击以及

个人信息被侵犯。2017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对如何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隐私如何不被他人侵犯的问题、数据权属及应用的法律问题以及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新兴产业中的数据安全保护进行了规划。对于大数据领域的安全法治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有多个省份成立大数据地方监管部。

2. 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概述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发展和完善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以及人脑芯片的催化下,人工智能模拟体现了人类的智慧能源,并以高于人类的做事速度、优于人类的做事精度协助人类解决林林总总的难题,包含突破了人类生理与物理上的困扰,代替人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事工作,将人类的创造力优势与人工智能的操作性优势达成完美融合。

人工智能犯罪主要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方式表现为行为人直接利用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实施犯罪。由于操作系统中存储了大量数据和信息,涉及个人隐私、身份信息、商业秘密等重要数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孟 涵,女,山东莱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 烨,男,山西大同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若被非法获取和利用,进而实施相关犯罪行为,就会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窃取国家秘密罪等^[1];另一种行为方式表现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犯罪分子将人工智能当作手段和工具实施犯罪行为。人工智能会提高犯罪行为成功的可能性、消除犯罪障碍以及降低犯罪难度,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危害性。

涉数据网络犯罪是指以网络为媒介,对数字化形式进行技术处理的以一切数据为侵害对象的行为,以个人信息犯罪为逻辑起点,以信息搜集、处理、使用和储存为产业链条,主要涉及的犯罪类别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电信诈骗犯罪,范围延伸至与信息数据相关的网络犯罪整体。

网络犯罪的演变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网络当作对象的犯罪;第二阶段是行为人利用网络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第三阶段是行为人直接在网络上实施与传统犯罪相当的行为,即将网络当作载体。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虽然表现出不同于前两种的犯罪现象,但仍与传统犯罪无太大的区别,只是犯罪的地点空间发生了转变。网络犯罪的常见类型主要包括为: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色情的传播牟利、诈骗与敲诈勒索、侵犯隐私权以及贩卖个人信息、网络赌博、网络洗钱以及知识产权侵权。在《大数据安全白皮书(2018年)》公布的数据泄露中主要攻击手段中,排在前三位的是黑客攻击、恶意软件、配置或操作错误。

二、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密切相关

1. 实施涉数据网络犯罪的便利性

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学习一定的算法与计算对大数据进行学习,在人类对网络以及智能系统深度利用之后,其智能系统本身也获得了不断升级与发展的潜能,逐渐获得主体资格,最终可能会对人类现有的制度进行一定的冲击。智能系统集中大量的数据于一体,数据作为信息的化身与载体,一旦形成数据库之后,不法分子若想要实行犯罪,只需攻破一次数据库即可获得全部信息,其犯罪成本的低廉以及利益的最大化,会强化行为人的犯罪故意^[2]。由于AI操作系统本身存在了大量的信息数据,当该操作系统的掌握者或者使用人利用该信息进行不法活动,也为一系列下游犯罪的实行打开了阀门,如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诈骗、进入金融系统窃取财物等,其便利性与可操作

性可想而知。AI与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的初衷是为了造福社会与公众,若被不法分子非法的利用,那么权利受到侵害的仍是社会公众。尤其是网络普及的当代,多数软件的使用都需要真实信息注册,以及手机电脑及大多数设备也存储了大量的隐私与信息。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进行前置性的构想与风险的预防、防控是出于对每个网络用户信息安全的基本尊重。

2. 涉数据网络犯罪保护法益的转变

涉数据网络犯罪是指以网络为媒介,对数字化形式进行技术处理的、以一切数据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行为^[3]。我国最传统的网络犯罪的对象是计算机犯罪,随着网络自身的技术性和虚拟性特征被网络犯罪所吸收,历经一代又一代的网络犯罪的转变,目前网络犯罪的中心已经转化为个人信息类型的犯罪。刑法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计算机系统的“数据”价值转向法律定位后的“信息”^[4]。大数据时代下刑法的保护法益呈现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的转变,保护重心逐渐向个人权益倾斜^[5]。

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存在争论,主要包括三种学说:其一是隐私权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根据在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其中包括精神性利益,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以公民的精神性损害为要素的刑事非难基础^{[6]179-180};其二是人格权说。这种学说的观点体现在一般人格权是不容侵犯的,人格独立、自由与尊严同样值得保护,刑事立法上体现为公民人身权欲财产权的兼顾保护^{[7]45-46};其三为个人信息权说。主张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确立个人信息法益,以保障个人信息所包含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在此基础上与第二种相类似,但扩充的部分是包括积极使用并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并且消极防御他人侵害的权利也同样值得保护,在刑事追诉中体现为理念转变、体系革新与科学治理^[8]。笔者赞成第三种学说,如今公民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手段越加繁多,其人身权与财产权都是应当予以保护,并且在一些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方面,个人信息的主体应当有赞成或者否认的意见,并决定是否赋予他人行使。

三、涉数据网络犯罪面临的规制困境

涉网络犯罪具有客观非物质性、隐匿性以及潜在性的特点,犯罪手段与传统犯罪存在差异。目前我国涉网犯罪形势严峻,在侵犯个人信息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黑色产业链。上文已经指出

由于目前的网络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已经由个人信息犯罪代替了传统的计算机网络犯罪,因此,在法律评价上具有意义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就有了区别,在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涉数据网络越轨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刑罚^[5]。

涉及数据网络犯罪的困境是取证难,证据的获取、保持以及效力的认定均存在问题。目前,行为人的防范意识较强,为了避免追查跟踪经常采用身份的多重转变,进行诈骗活动所在的网站域名也时常更换,并对涉案账号进行快速注销等。网络犯罪多发生在以网络软件、硬件为物理和技术基础的虚拟空间,导致追查行为人身份的难度提升。并且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痕迹或多或少表现为电子数据的形式,销毁之后提取需要较高的技术支持。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也难以得到证实。

学者文立彬指出,从最初的互联网时代到信息网络时代,直至最终的三网融合,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其一是传统犯罪行为本身,由侧重于结果转变至对法益的保护为中心;其二是犯罪的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故意或是过失;其三是客观方面,如犯罪的最终目的、犯罪针对的对象、以及危险结果等。就其犯罪对象而言,由单纯以牟利为目的扩大为营销号、公众号等点击量的扩大、转发评论的数量多少,流量博主以其自身的影响传播的能力也成为衡量价值的一种方式。从最初具体有形的、可以估价的金钱利益转化为更无形、价值更难以衡量的无形资产。在涉数据网络犯罪行为方面也呈现了多样化的形态,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之后,引发了大多数的下游犯罪,如获取信息之后实行的诈骗、敲诈勒索行为;行为人非法买卖或者盗窃个人信息之后办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等。我国对于治理涉数据网络犯罪的框架治理与预防并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法益保护对策,对于当下网络犯罪的一些概念性的解释以及犯罪行为与结果的认定存在模糊。网络犯罪的跨区域性强,不少学者已经提出跨区域跨国界的管辖权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惩治网络犯罪,可以建立区域性涉数据网络犯罪追惩机制,在一些特定区域设立试点进行治理。

四、预防人工智能实行网络犯罪之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国家大数据战略时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要加强政策、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笔

者认为为了预防人工智能实行网络犯罪,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对现有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定进行规制与梳理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与网络犯罪急剧增多的大环境下,在对信息安全的规制与保护方面,应当做到事先预防与事后打击相结合,把涉数据网络犯罪遏制在摇篮里。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同时完善民事与行政的手段,多部门结合,更有效地防治犯罪的产生。在刑事立法方面,对法益保护的范围应当适当拓宽,以更有利于权益的保护。对刑事规制的节点相应增加,一些预防性的惩罚措施应当设立与完善。

在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上,应当对刑法的传统规则方式进行反思,社会防卫与安全保障价值方面也应当予以重视,从而对行为无价值的社会意义进行审视思考,实现责任注意功能化的适用。因此在涉数据网络犯罪的刑法保护法益上,不仅应当关注权利人的权利保障,对当下网络环境相关的法律专业词语概念的解释、犯罪行为模式的转变以及惩罚机制的完善,都应当给予相应的重视^[5]。

随着网络舆论与人肉搜索带来的危害增加,网络媒体空前发展,其参与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对网络环境进行合理合法的整治是切实有效的,毕竟网络空间仍是处于法律治理的范围之内,进行法治网络建设,每一个用户都应当遵纪守法,言论自由也应当在合理范围内,而不是利用其虚拟的空间为所欲为。维护规范、法制和有序的网络环境,是每一个用户都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意味着自我权利得到保护。

2.对人工智能实施涉数据网络犯罪时主体地位及权利边界进行明确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学习一定的算法,依赖于云计算、大数据与算法的适用,在人类对网络以及智能系统深度利用之后,在庞大数据集下做出科学决断,其智能系统本身也获得了不断升级与发展的能力,更是网络逐渐获得主体资格的过程,最终可能会对人类现有的制度产生一定的冲击。集中大量的数据于一体本身就隐藏了潜在的风险,因为数据就是信息的化身与载体,一旦形成数据库之后,不法分子若想要实行犯罪,只需要攻破一次数据库即可获得全部信息,其犯罪成本的低廉以及利益的最大化,使行为人可能会控制

不了犯罪的意念^[2]。

于是在未来 AI 可能利用掌握的大量数据造成犯罪的情况下,也应当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利用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将其作为工具进行侵犯数据利益的网络犯罪的,应当由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人承担责任。德国学者费尔巴哈的“无行为则无刑罚”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在日后强人工智能时代, AI 机器人有朝一日会具有自主认识与意志,逐渐享有了能够独立控制自己的意识与行为的能力,并且根据自我意识进行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行为之时,应当赋予其作为刑事主体的资格,由其独立承担责任。人工智能纳入刑罚处罚范围的设想存在着实现建构的可能,刑罚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给予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做出反应的权利”^{[9]144-145}。在人工智能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具备主体资格时,自动地受到刑法规制,而刑罚有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的功能,实施了严重网络犯罪的行为,必然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另一种是对 AI 数据共享的权利应当予以保障,其中包括数据使用权和知情权的一种数据使用模式。当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出现矛盾或冲突时,应当进行价值与利益的衡量,不能全权否定日后 AI 作为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一体化的资格。归因于 AI 掌握大量数据的前提,其研发者、制造者、使用者有保证 AI 及涉及信息与数据的安全,从源头进行风险防控,确定严格责任。刑法对不当利用 AI 的行为加以规制,以维持秩序稳定与网络数据的安全,防止网络犯罪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防治犯罪的发生并不等同于禁止对 AI 智能的研发,虽然 AI 带来的刑事风险确实存在,但为了社会的发展,科技治国的理念并不能因此而摒弃。目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一切尚在掌握之中,对其发展的方向可以进行必要的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将人工智能带来的投产比最大化,对其进行前瞻性分析,减少法律的滞后性。

3. 风险社会下同时秉持谦抑主义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风险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的发展难免同时存在着风险,现代社会的发展总是要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的阶段,人类进行创造力与研究开发自然的活动,同样会带来社会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相应的威胁^{[10]344-346}。在人工智能将会带来风险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正视一切所带来的风险的可能,并在刑法理论上坚定不移地坚持刑法的谦抑主义^[11]。所谓谦抑,即

倡导进行轻罪治理,轻刑处置。在刑法以责任主义为前提进行规范下,应当以预防主义来进行特别处理,使保护社会安全与教导行为人向善两方面相结合,而不随意侵犯个人的利益甚至是犯人的利益,以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刑罚的设置应当在合理适当的限度之内,此为谦抑之意。刑法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的“最后手段”。为了防止“刑事膨胀”现象的出现,只有在确有必要的前提下,才借以刑法的辅助,要理性防止在刑法方面的立法权滥用。

因此,尽管如今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势不可挡,涉数据网络犯罪的犯罪率逐年升高,但设置合理的刑罚即可,并无必要升格为更严厉更苛刻的法定刑,重刑化治理未必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应当更全面地完善当下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相关具体的司法解释,贯彻罪刑法定主义以弥补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在机遇与风险同在的情况下,将犯罪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 [1] 钟义信.人工智能:“热闹”背后的“门道”[J].科技导报,2016(7):14-19.
- [2] 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J].法商研究,2018(1):3-11.
- [3] 于志刚,李源粒.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制裁思路[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100-120+207.
- [4] 于志刚.青年刑法学者要有跟上时代步伐的激情与责任[J].法商研究,2017(6):7-10.
- [5] 文立彬.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困境与优化路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0-47.
- [6] 王秀哲.信息社会个人隐私权的公法保护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
- [7] 谢永志.个人数据保护法立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
- [8] 于志刚.“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刑法保护思路[J].浙江社会科学,2017(10):7-14.
- [9] 威廉姆·威尔逊.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M].谢望原,罗灿,王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5.
- [10]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11] 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J].法商研究,2011(4):26-29.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探究*

陈东 豆晓甜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要] 贫困问题不仅仅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受人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导致这一地区贫困的原因有生态环境的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备、经济与教育的落后及思想观念的影响。欲改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必须从提升知识水平、促进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治理、实施易地搬迁、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民族地区; 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10-03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和致贫的原因

贫困问题一直是联合国社会发展关注的三大主题之一,消除贫困则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愿望。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都很重视贫困问题。目前我国贫困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原因,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现象既有贫困的一般特征,也有其民族的特殊性,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的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备、经济上的滞后、教育落后以及思想观念的封闭。

1. 生态环境的制约

生态环境的优劣对于当地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我国的偏远地区,这里主要以山地和盆地为主,常年干旱少雨,春秋季节还有沙尘暴天气。西北少数民族大多都是以游牧为生,他们的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生态环境对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广袤,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使得这里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我国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虽然水资源在总量上比较丰富,但是空间结构上却极不合理,再加上人们经济用水的过度使用,使生态用水减少,而天然的河流和湖泊在逐渐萎缩甚至消失^[1]。另外,由于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很快,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以及毁林毁草进行开荒的行为,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土地可以用于种植,没有办法去放牧,甚至一些靠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存在尖锐的矛盾。

2. 基础设施不完备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备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制约。近些年来,国家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援建,但是进程缓慢。在道路交通方面,相比内地而言,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修建铁路和公路要耗费的不仅是物力还有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由于地质和海拔的原因,在施工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一个一个的攻克,这就使得这些地方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修建进程缓慢。水利设施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大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BZZ033)。

[收稿日期] 2019-11-02

[作者简介] 陈东,男,河南镇平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豆晓甜,女,甘肃兰州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部分以游牧业为生,因此这里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利设施建设不完备。通信设施方面,近年来,为了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能够和内地群众享受一样的通信服务,三大运营商在这些地方修建了很多信号塔,但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分布比较稀疏,很难做到网络的全覆盖。

3. 经济上的滞后

产业结构单一,科技文化水平落后。摆脱贫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发展经济,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落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以发展传统的农牧业为主,其他产业的比重很低,依靠农牧业发展的经济水平是很低的,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县区的财政都没有办法满足本地区的需要,长期依靠的是国家的补贴,摆脱贫困是很困难的。西北地区的牧区占据全国牧区很大的比重,牧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在牧区放牧的牧民的生活来源基本上依赖的是畜牧业,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落后,逐草而居的游牧型生活方式使牧民对抗灾害和病痛的能力低,脱贫后返贫的概率很高^[2]。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发展的是初级加工的工业,这种产业技术水平不高,发展前景一般,因此吸引外来资金的能力不足,呈现出发展缓慢的状况。由于历史原因和教育上的落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水平也相对落后,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难以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使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入驻到少数民族地区。

4. 教育落后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虽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加大资金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落后的教育观念,仍然没有办法改变。由于教育是一个长远和高的投资,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难以接受,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眼前的收益,大多让子女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或者是跟从父母去放牧。再加上具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女儿长大总是要嫁人,前期投入的越多,最后嫁人就意味着全部的失去。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比较落后。但是它们各自的原因又不尽相同,对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来说,大多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很欠缺,师资水平不高,使这两个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落后。而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来说,除了自然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问

题,尤其是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面积广阔,而且少数民族的种类比较多,这里的少数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们不会说汉语,虽然现在学校里都有双语老师,但是汉语老师对于整个新疆地区来说还是非常欠缺,新疆每年都会向内地招聘大量的汉语教师,但是由于环境和饮食等等的原因,内地老师有很多会在一两年任教以后离岗,再加上从内地赴疆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学能力不足,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水平发展缓慢。青海相对来说离内地比较近,在师资和教育方面要好一点。

5. 思想观念的影响

思想观念问题也是制约西北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少数民族的人们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没有用,女子的教育程度普遍都很低,早早地辍学,早早地结婚生子,这就使得她们的思维受到了限制。在一些藏族地区,仍然保留着女人不和男人同桌吃饭的习俗。在一些聚会活动上,男女被分开,女性的聚会一般会由其中一位长者主持,这位主持的长者坐的位置比较高,其他的女性则坐在地毯上。还有部分少数民族的贫困群众把贫穷当作引以为荣的事情,不努力进行生产劳动而是坐等政府的救济和帮扶。少数民族还被“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影响,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在三个以上,家庭成员多,整个家庭的生活并不富裕。另外是宗教信仰的影响。比如藏族的群众信仰的是藏传佛教,他们的信奉方式不像普通人那样每逢初一、十五去寺庙上香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日子给寺庙捐献香火钱。藏族群众对于佛教的信仰很重视,这种信仰是生命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藏族群众都会向寺庙捐赠钱财,一些人更是会将一年的大部分收入捐给寺庙。另外他们在丧葬上的花费也很大。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的路径

1. 努力提升当地人民的知识水平

知识就是力量。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教育水平比较落后,人们对教育不够重视,因此,要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去接受完整的教育,形成以“学习为荣”的理念,还要鼓励社会组织去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些专业知识培训活动,逐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知识与能力,解决因为知识欠缺和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兴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想让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要加大对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培养方面主要是要加大对当地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水平,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能够一样接受义务教育,通过知识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认知,让他们可以转变落后的观念。国家也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引进的宣传力度,地区政府配合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

2. 多渠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兴旺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交通条件比较差,经济水平也很落后,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以传统的农耕或者是放牧业为主,几乎很少发展第一产业,因此这些地方仍然保留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这正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所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达到脱贫的首要途径就是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促进产业复兴。例如青海省的藏区,可以发展乳制品和肉制品,形成规模化和集聚化,打造自己的品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势广阔,拥有深厚的异域历史底蕴,可以发展旅游业,但是一定要谨记不能够照搬别的地方的发展模式,要根据自身民族的独特性及优势,做到一点一景,突出特色,满足多样化的需求^[3]。还要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的区位优势,促进特色产业国际间的合作。比如宁夏回族群众和阿拉伯人秉承着“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理念,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可以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3. 加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带动乡村振兴

农村是我国的基层自治组织,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4]。要想使乡村治理能够有效地实施,必须要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只有实践才能够得出真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比较多样,因此在考察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民族的特殊性,要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也要给村镇一定的权力,让其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另外,政府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发声,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来,并且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

4. 积极实施易地搬迁工程,让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安全 and 稳定

易地搬迁工程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生活在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这些少数民族群众本来生活就不富裕,如果遇上自然灾害就会直

接破产。对于易地搬迁的少数民族群众,一定要做好补偿,为他们提供住房,提供就业岗位,适当的时候给予政策上的优惠。通过易地搬迁工程,能够使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脱贫,并且还能够使他们的生活稳定而富足。

5. 全面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5]¹²⁸ 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汇总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³⁷⁴⁻³⁷⁵ 他们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获取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实现脱贫的重要资源和基础,也为发展提供动力。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一定要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红线更是不能够有一丝的突破。为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科学的经济管理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对重要的区域要加强保护。对一些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区要加大资金的投入,为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还要为它们制定紧急抢救保护的措施。

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因此地方要形成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对荒漠化的地区要进行综合治理,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退耕还林、退草还牧,要立足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贾毅.基于精准脱贫视角的民族地区脱贫路径研究——以东乡族自治县为例[J].兰州学刊,2018(12):149-157.
- [2] 雷兴长,徐烨.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途径与选择[J].社科纵横,2019(1):28-33.
- [3] 骆行,王志章.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探索——以贵州道真自治县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8(10):145-151.
- [4] 程晓羽.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南村为例[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2):185-186.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光 翟)

“五大发展理念”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金 欣 雪^{1,2}

(1.亳州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安徽亳州 236800;
2.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安徽阜阳 236037)

[摘 要] 在“五大发展理念”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为例,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评价,了解其发展现状、强项和弱项;对制约其发展的融资难问题,进行效率分析,以期为更好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 中小企业; 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13-04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命题之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占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央在“五大发展理念”背景下,发出了从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的宣言,过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导致银行风险加剧,金融体系不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我们需要更为全面的认识。

浙江是中小企业大省,全省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各类中小企业已突破 300 万家,工业中小企业、中小板及创业板企业景气指数一直名列前茅,针对此类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金融保障,在贷款增速、贷款总量及产品创新等领域也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本文选择浙江省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浙江省作为中国中小企业的领头兵,其发展

问题更具代表性。

一、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

1. 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国内外企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成果,结合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特点,本文选择出 12 个指标构建中小企业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1],选用销售利润率(X1)、成本利润率(X2)和总资产利润率(X3)3 个指标衡量各行业的获利能力,用负债流动率(X4)、资产负债率(X5)等 7 个指标衡量各行业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2],选取主营业务增长率(X11)、总资产扩张率(X12)等 2 个指标来衡量行业的成长能力。通过这些指标对浙江省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行测评,具体指标如表 1: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K2019A034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金融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8D63),安徽省质量工程重点教学研究项目“基于网购大国视域下电子商务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8jyxm0564),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统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9jyxm0275),阜阳师范大学校级重点项目“城市金融生态运行质量研究”(项目编号:2019FSSK04ZD),阜阳师范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统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8JYXM41),阜阳师范大学网络课程资源建设项目“统计学基础网络课程”(项目编号:2018WLKC11)。

[收稿日期] 2019-11-10

[作者简介] 金欣雪,女,回族,安徽涡阳人,亳州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讲师,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表 1 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能力	指标
获利能力	X1:销售利润率
	X2:成本利润率
	X3:总资产利润率
	X4:负债流动率
	X5:资产负债率
	X6:流动比率
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	X7:营运资金占总资产比率
	X8:固定资产周转率
	X9:流动资产周转率
	X10:全员劳动生产率
	X11:主营业务增长率
成长能力	X12:总资产扩张率

2.分析结果

在企业获利能力方面,指标 X1(销售利润率)、X2(成本利润率)、X3(总资产利润率)有较

大载荷,其中电子设备业的获利能力得分最高为 1.903,其余行业略低,各行业整体差别不大;指标 X11(主营业务增长率)、X12(总资产扩张率)在企业成长能力上有较大载荷,其中成长能力最好的行业得分为 2.813;在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指标 X9(流动资金周转率)、X10(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较大载荷,排名第一的行业得分为 2.756,其余行业得分稳步下降;指标 X6(流动比率)、X7(营运资金占总资产比率)、X8(固定资产周转率)在企业运营能力上有较大载荷,排名前五的行业得分差别较大,石油加工业在运营能力方面表现较好,得分为 4.692,其余行业得分均偏低;在企业偿债能力方面,指标 X4(负债流动率)、X5(资产负债率)上有较大载荷,在行业得分方面,与前者类似,最高得分为 3.788,而其余行业均低于 1,行业整体表现不佳,具体结果见表 2。(表 2 为在企业获利能力,成长能力等方面,排名前五的不同行业得分)

表 2 不同维度排名前五位行业得分

获利能力得分 (x1,x2,x3)	成长能力得分 (x11,x12)	资源利用效率得分 (x9,x10)	运营能力得分 (x6,x7,x8)	偿债能力得分 (x4,x5)
1.903	2.813	2.756	4.692	3.788
1.675	1.870	2.743	0.935	0.760
1.640	1.158	1.512	0.912	0.753
1.513	1.113	1.065	0.289	0.669
1.138	1.086	0.451	0.256	0.617

上述分析有助于认清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强项和弱项,各行业所处位置等信息。由此不难看出,在代表企业获得能力、资源利用效率能力及成长能力等指标上,各行业均有较好表现。而在代表企业偿债和资本运营能力的各项指标中,普遍表现较差,除个别行业之外,行业得分整体偏低,这也反映出浙江省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企业资金不足,有 85.3%的中小企业亟须再融资,融资难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3]。

二、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分析

融资效率是指企业在融资的财务活动中所实现的效能和功效,即企业能否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资金并加以有效利用^[4]。研究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对相关机构全面了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

析形成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为执行“五大发展理念”下提出的相关政策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浙江存在资金不足问题的中小企业占比高达 74.6%,而这些企业借助的融资种类主要有:一是内部融资;二是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又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不同的融资方式引致不同的融资成本,对融资效率产生差别影响。企业内部融资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资金利用率等方面均优于外部融资,融资效率最高^[5]。本文随机选取了上述行业中的 29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两种外部融资方式的效率高低进行论证。

1.变量选择

(1) 融资效率指标

企业的融资效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成正比,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融资效率越高;反之,则融资效

率越低。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企业融资效率的指标。

融资效率=投资报酬率/资本成本率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①
=净资产收益率/[债务成本（1 - 所得税率）×资本负债率+权益×权益比]

(2) 债权融资水平

本文用资产负债率代表债权融资水平。这反映了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该指标综合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水平。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3) 权益性融资水平

本文采用股东权益比率代表权益性融资水平,是股东权益与总资产的比率,反映了公司的自有资本。

股东权益比率= 股东权益总额/总资产净额×100%

2. 分析结果

为了明确不同的融资方式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对以上三个指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

表 3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调整后 R ² = 0.9125		F = 42.2583	
	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4.139	-2.728	0.0000
债权融资水平	1.057	6.314	0.0000
权益性融资水平	0.867	2.913	0.0002

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部分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出,债权融资水平及权益性融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两者均对融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债权融资水平的变化对于企业融资率的影响比权益性融资水平的影响更大,即债权融资的效率要高于股权融资的效率。另外通过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变系数回归的结果显示,上市时间长短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偏好,上市时间长的企业偏好权益性融资,而晚期的上市企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一方面因为债权融资具有税盾效应,我国对利率及相关收费都有明确规定,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不大,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水平并不高;另外一方面,对于普遍发行额较小的中小企业来说,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和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引致其股权融资效率偏低,因其上市所需的审计费用、信息披露费用、挂牌费用等均

为固定费用,不会随发行规模大小发生变化。情况,发现其在获利能力、成长能力等方面进展良好,而在企业融资方面普遍表现较差。针对中小企业突显的融资难问题,对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债权融资与权益性融资均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但债权融资的效率要高于股权融资,上市时间长短也会对企业融资偏好产生影响。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融资难、融资贵。为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加速中小企业对权益性融资的偏好转变,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从直接融资看,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股票市场的门槛较高,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托类、债券类、和票据类等金融产品缺乏创新,集合债、集合信托等融资成本高达 12% 至 15%。截至 2018 年,浙江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仅为 16.7%,直接融资比重过低,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为了响应“新国九条”提出的“壮大主板、中小企业板市场,创新交易机制”“加快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号召,可以学习“浙江板

三、结语

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数据为例,首先通过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分析,了解中小企业的发展

^①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反映每单位融资额获利情况,并且在不同规模企业间具有可比性,因此投资报酬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资金成本率采用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表示。

块”模式,通过推动中小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提高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加快推进优质中小企业上市直接融资。

2.“建立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投融资机制”,防范融资风险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内部融资是其首选方式,至少62%的资金依靠其自有资金解决。伴随规模的扩张,借贷资金(包括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也逐渐成为其重要的融资方式。鉴于伴随银行贷款的审批周期长、借贷时间短、融资贵等缺陷,更多的中小企业倾向于进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在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首先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其次不规范的民间借贷途径,易引发资金链的断裂,隐藏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规范民间借贷的同时,通过“建立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投融资机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如建立中小企业间的互助组织,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直接对接;开设中小企业应急专项贷款,提供短期周转资金;搭建中小企业网络融资服务平台,开启网络融资模式

等等,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预防资金链断裂,防范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 [1] ALLEN Franklin, QIAN Jun, QIAN Meiju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1):57-116.
- [2] BOOMSMA A, HOYLE R H, PANTER A 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earch report [J]. Handbook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012: 341-358.
- [3] 薛玉玲,王美佳.论中小企业投资风险的管理与控制[J].中国外资,2013(3):145-147.
- [4] HERNÁNDEZ-CÁNOVAS G, MARTÍNEZ-SOLANO P.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banking relationships on credit availability: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spanish small firms[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7(28):37-53.
- [5] BOOTH L, AIVAZIAN V, DEMIRGUO - KUNT, MAKSSIMOV. Capital 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Finance,2001(56):87-130.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105页)

而论。组织类职业放贷人可以通过准用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规定,而自然人开展的职业放贷活动却仍缺少法律规制。当前,我国对于职业放贷人的监管缺少法律依据,应当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出台,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基本理念,对自然人职业放贷活动进行全面的规制。

[参考文献]

- [1] 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2] 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 [3] 黎洋.职业放贷人法律规制研究——兼评《非存款类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J].北京建筑大学学报,2017(2):75-80.
- [4] 孔令学.民间借贷规范发展路径辨析[J].河北法学,2013(3):125-130.
- [5] 顾功耘.商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 刘少军.金融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 [7] 朱大旗.金融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8] 谈萧,胡新建.民间金融的法律评判及规制路径[J].法治研究,2010(6):57-62.
- [9] 黄家骅,谢瑞巧.台湾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演变[J].财贸经济,2003(3):91-94.
- [10] 岳彩申,张晓东.民间高利贷规制的法理源流及制度变迁[J].政法论丛,2015(4):11-19.
- [11] 岳彩申,车云霞.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的新进路[J].河北法学,2016(5):47-57.
- [12] 黄越.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以温州民间借贷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2-45.
- [13] 刘道前,满艺伟.“套路贷”的法律性质及侦防对策分析[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5):64-71.
- [14] 罗书臻.划“红线”促“阳光”避“踩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综述[N].人民法院报,2016-02-27(1).
- [15] 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EB/OL].[2019-10-02].<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3/id/1820527.shtml>.
- [16] 张明楷.不能以“套路贷”概念取代犯罪构成[N].人民法院报,2019-10-10(5).

(责任编辑 光 翟)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探讨

郑天羽

(齐鲁师范学院财务处, 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 本文从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特点入手,并结合传统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式存在的缺点分析大数据时代对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时代拓宽了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创新了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对无形资产的计量也产生了 4 大影响。笔者还选取了互联网企业最显著的无形资产—网络域名,对其确认与计量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大数据; 无形资产; 确认与计量; 互联网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3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17-05

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及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2016 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总规模达 1.07 亿元,同比增长 46.8%,带动信息消费增长 8.73%,可以说当前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在此背景下,对互联网企业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是我国政府以及互联网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伴随着互联网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文化、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人才、网络域名等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无形资产已经成为影响互联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所以对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也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传统的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难以满足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动了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式的改变。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的研究由来已久,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无形资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学术界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的研究也发生了改变。Cinca 等(2001)

按照在互联网上的经营、可获得的会计信息以及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等标准选取了 76 家互联网公司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其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他认为企业外部形象、客户认可度等无形资产缺乏必要的确认与计量。澳大利亚学者 Ritter 等(2006)通过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有关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会计准则过严,导致其无形资产的范围过窄使得无形资产在财务报告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我国学者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研究较早,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杨兴奋等(2007)认为我国的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只重视可靠性与稳定性,缺乏对相关性的重视,这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是不利的,甚至会导致管理层的错误决策。罗桂兰等(2008)指出我国对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研究只重视外在特征,缺乏对无形资产本质的研究。罗琦(2014)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对于公允价值、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缺乏必要的规定,可能诱使某些企业处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计量方法,长此以往会导致我国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法的混乱,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以往的学者在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

[收稿日期] 2019-04-18

[作者简介] 郑天羽,女,山东济南人,齐鲁师范学院财务处副科长。

临,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必然会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了。

二、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特点

《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把互联网行业定义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服务以获得收入的企业,本文把我国互联网行业分为3大类:基础层互联网企业,如移动、电信等;服务层互联网企业,如神州数码;应用层互联网企业,如腾讯、新浪等。这些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比重较高,以下3个方面是本文总结的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所独有的特点^[2]:

1.以网络环境为依托

互联网行业生存的根本依据就是计算机、网络平台,所以其无形资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网络环境为依托,脱离了网络环境,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必然不复存在。比如,App、点击量、用户数量等互联网行业的无形资产是互联网企业的命脉,离开了这些互联网企业将难以生存下去,而传统的无形资产,比如土地使用权对于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要低很多。

2.知识类无形资产比重较大

互联网行业对技术以及知识的要求较高,因而知识类无形资产在其总无形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版权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是构成知识类无形资产的主要力量,这些知识类无形资产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力量,所以很多互联网企业为了提升其竞争力都大力发展自身的知识类无形资产。

3.以内部研发和开发为驱动及主导

互联网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研发驱动组织,创新是互联网企业的灵魂,创新能力不足的互联网企业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3]。因此,互联网企业无一例外很重视内部研发和开发,比如我国的阿里巴巴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其收入的17%;华为研发投入达3100亿元,逐步形成了内部研发和开发在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内部研发与开发能力是互联网企业最为关键的无形资产,研发与开发能力越强的公司,其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

三、传统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存在的缺陷

1.无形资产确认上的缺陷

(1)无形资产确认范围较窄

我国会计准则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资产的形式之一,其本质上是一种狭义资产。按照此概念,流入企业的资产中只有可以计量的并且与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或者经济产品才是无形资产,这大大缩减了无形资产的范围,因为按照此方法互联网企业创造的商誉、网络平台、供应链等都因为无法准确计量而不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了^[4]。以前,我国互联网企业进行会计处理时,只考虑那些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交易,对于非经济利益相关交易并不进行确认和计量,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文化、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品牌价值等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重要性愈发明显,如果仍依照狭窄的范围进行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使得重要的无形资产无法在财务报表显示,必然会损害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研究开发支出的界限模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在经营中越来越重视知识、数据、技术的重要性,所以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多。在此背景下对研究开发费用的精确计算就越发重要了,而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无形资产支出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研究阶段支出以及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支出计入费用项目,开发阶段支出计入资产项目。但是互联网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开发支出时间跨度大,过程极为复杂甚至会跨越几个国家(地区),会计人员依靠传统方法很难进行区分。此外无形资产允许资本化的五个条件也难以决断,最终导致研究开发支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2.无形资产计量上的缺陷

(1)计量单位的形式单一

我国无形资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的计量单位是货币,方法为历史成本法,其他计量方法应当用于后续计量,希望通过多种计量方式的混合使用并结合市场的变化以准确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行计量^[5]。但是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具有不稳定

性、高风险性、可货币化程度低等特性,比如企业文化、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人才等互联网企业核心无形资产如果仅以货币为单位利用历史成本法是无法准确度量的,会导致互联网企业管理层无法获取完整的会计信息,影响互联网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无形资产摊销及会计处理的主观性过强

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两大方面,其一,可供会计人员进行无形资产摊销的方法有产量法、加速摊销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处理方法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这导致互联网企业在进行无形资产摊销时随意选取处理方法,可能导致人为控制盈利空间的情况出现^[6]。其二,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此外还规定每个年度要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评估,这必然会导致会计人员主观判断行为的出现,不利于国家对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摊销以及操纵利润等行为的监督。

四、大数据时代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改进

1.对无形资产确认的改进

(1)扩宽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

大数据时代,无形资产在互联网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无形资产地位的提升使得我们必须对传统无形资产确认方法进行改进,扩大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使得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得以全面的反应^[7]。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资产,主要是体现市场竞争力的资产,如品牌、客户、信誉、专利权使用协议、经常性合同等,大数据时代市场依然是实现利润的唯一手段。其次是知识产权资产,主要是体现脑力劳动的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配方、版权等。再次是企业结构资产,主要是互联网企业管理层在组织、协同等方面的优点,是互联网企业可获得的潜在利益,如企业经营方法、企业文化、网络域名、网络平台等,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域名是企业身份的代表与企业内在外在形象密切相关。最后是人才资产,即互联网企业的人力资本,如员工的技术水平、受教育程度、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阿里、腾讯等我国著名互联网企业都无一例外注重对企

业人力资本的培养。

(2)创新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

大数据时代不仅要扩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范围,而且要改变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可定义性,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自创商誉、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显然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作用愈发明显;其二,可计量性,如果仍以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仍然无法完整的对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进行确认,所以我们可以与产出价值来计量;其三,相关性,以前没有被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互联网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互联网企业各方面都与这些无形资产相关;其四,可靠性,虽然无形资产种类繁多,但它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收益是能够可靠计量的。总的来说,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要满足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以及可靠性这4大标准。

2.对无形资产计量的改进

(1)由成本计量逐渐转向价值计量

当前,无形资产的计量采用历史成本法,重视对成本的计量而忽视对价值的计量。虽然历史成本法可以从投入层面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具有一定的可验证性,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收益,导致互联网企业市场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严重偏离^[8]。大数据时代,有形资产地位下降,无形资产地位上升,无形资产的计量在互联网企业资产的计量中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计量逐步由成本计量转向价值计量,资产负债表按照价值进行公允计量,有利于夯实互联网企业利润,确保其利润信息的完整性。

(2)精确性计量和模糊计量相结合

传统的计量方式以货币为单位进行精确计量,大量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无形资产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准确反映,这对于无形资产比重较大的互联网企业是十分不利的,导致互联网企业管理层无法对企业资产进行全面了解。大数据时代强调会计计量的多维性,对于无法用货币进行精确计量的无形资产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以非货币指标进行模糊计量,如互联网企业的客户量、客户满意度、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都可以用非货币指标进行模糊计量。

(3) 现金流量贴现法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些无形资产未来价值的计量对互联网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现金流量贴现法逐步被互联网企业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现代金融学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按此定义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可以换成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此方法优点在于可以准确反映互联网企业的资产价值,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缺点在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收益高、风险大,因而对折现率、收益期限的估计可能存在误差。

(4) 实物期权法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

近年来,实物期权法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在无形资产计量领域实物期权法主要用来对研究与开发费用以及专利权价值评估方面^[9]。专利权是指政府对于某产品在造型、技术、配方等方面的发明给予其制造、出售等方面的专门权利,投资者购买专利后,如果专利市场条件好,投资者会生产该专利产品将其投入市场,反之市场条件不好,投资者会暂时放弃对专利产品的生产,因此我们可以用实物期权法对专利权价值进行评估,如公式(1)(2)(3)所示:

$$C = \{PN(K_1) - Ve^{-rt}N(K_2)\} - \sum_{i=1}^T \frac{Fi}{(1+u)^i} \quad (1)$$

$$k_1 = \frac{\ln(P/V) + (r + \theta^2/2)T}{\sigma\sqrt{T}} \quad (2)$$

$$k_2 = K_1 - \theta\sqrt{T} \quad (3)$$

其中C就是专利权价值,V是生产专利产品投资费用,P是专利产品收益现值,T为使用期限r为无风险利率, θ 为专利产品不确定性。

五、大数据时代互联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法

大数据时代,网络域名是互联网企业最具代表性的无形资产,所以本文选取了网络域名的确认与计量,从网络域名的确认与计量展开讨论,对比分析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式与传统方式的不同。

1. 网络域名的确认

网络域名是互联网企业最具代表的无形资产,它符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也满足《企业会计准则

无形资产》规定的无形资产能够加以确认的两大条件: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成本能够可靠计量。首先,网络域名产生的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互联网企业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必须使用域名,域名就是企业的标志,良好的域名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获得消费者信任,所以网络域名具有潜在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其次,网络域名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尽管互联网企业获得网络域名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其成本都可以计量,如互联网企业注册域名要收取一定费用,买卖域名也有价可循^[10]。

2. 网络域名的计量

网络域名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目前并没有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够对其进行计量,本文借鉴商标评估方法,采用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对其进行计量。

其一,历史成本法。历史成本又称为原始成本或者实际成本,它以取得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成本作为资产的入账价值,互联网企业如果注册域名则可以把注册费用、手续费作为成本对网络域名进行计量,如果采用购买的方式获得域名,则可以把购买费用作为成本对网络域名进行计量。但是这样做有两大局限性,第一,历史成本不能代表未来收益,因此这种历史成本不能成为互联网企业管理上的有用信息;第二,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域名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而历史成本法不能反映域名价值的变化。所以本文认为历史成本法仅适用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更加适用,但是在企业发展中,有明确的凭证说明公司域名价值发生变化,也要及时进行域名价值更正。

其二,收益现值法。与历史成本法相反,现值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对无形资产的现值进行计量。互联网企业在申请域名之后,现金流入是产品或者服务销量增加带来的收益,现金流出为注册费用、广告费用等,我们对企业净现金流入与流出进行折算之后的现值就是网络域名的价值。不过收益现值法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互联网企业在使用收益现值法时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不能过高的估计未来现金流入,同时也应该选择与企业风险相匹配的折现率。所以对于不同的互联网企业收益现值法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提成收益法。这种方法适用于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出

现而出现的知识型互联网公司,比如百词斩、沪江英语等公司,其资产结构为高密度知识、智力以及这些无形资产可能带来的高附加值,其网络域名是公司生存发展的根本,因此采用提成收益法对公司域名进行计量比较简单可靠。首先要对网络域名多年带来的收益进行资本化,随后对其进行现值化,具体运算如公式(4)所示:

$$\text{网络域名价值} = \sum_{i=0}^n \frac{B_i * \text{提成率} * (1 - \text{企业所得税率})}{(1 + \text{折现率})^n} \quad (4)$$

其中, B_i 是指第*i*期的超额收益,*n*是计算期限,由此公司可以对此类互联网公司网络域名价值进行计量。第二,超额收益法。适用于间接网络公司,这些公司的域名往往很著名,众所周知,它们实现了商号、商标、网络域名的整合,三者归一,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收益是由企业整体带来的,既有有形资产也有无形资产,并且无形资产也不仅限与网络域名还有专利、客户量等,因此网络域名所占的比重就难以确定了,而使用超额收益方法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此类情况,计算公式如公式(5)所示:

$$\text{网络域名价值} = \sum_{i=0}^n \frac{B_i * (1 - \text{企业所得税率})}{(1 + \text{折现率})^n} \quad (5)$$

其中, B_i 是指第*i*期的预期超额收益,*n*是计算期限。超额收益法的运用预期超额收益率的确定是关键,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自身无域名前的收益与有域名之后的收益确定预期超额收益率,或者通过对比同类企业中无域名的企业收益率来确定。

[参考文献]

- [1]余桂统.关于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确认和计量的思考[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11):104-105.
- [2]吴虹雁,吕芳茹,顾义军.论自然资源资产的确认、计量与系列报表编制框架[J].财会月刊,2017(10):3-9.
- [3]陈争平.大数据时代与经济史计量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6):53-58.
- [4]李如友.中国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管理,2016(9):161-172.
- [5]罗彬,何帆.我国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中相关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4(24):74-78.
- [6]张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研究,2016(1):14-25.
- [7]彭进军.无形资产确认计量中的问题及改进建议[J].会计之友,2013(7):111-114.
- [8]王家华.论人力资本的确认与计量[J].财会月刊,2015(3):10-12.
- [9]蒋萍.旅游企业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浅探[J].财会通讯,2014(22):64-65.
- [10]吴虹雁,李蓉,顾义军.农业上市公司生物资产确认与计量经济后果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43-153.
- [11]金水英.新会计准则下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S1):156-157.

(责任编辑 光 翟)

培筑国民精神家园

——陈延斌教授等著《培根铸魂》简评

周 斌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2-0122-02

如何卓有实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既是国家全面战略实施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文化支撑,也是整个社会和公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并且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维护和实践的重要精神指南。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读、培育途径等问题做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近期,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等撰写的《培根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凝练与传播认同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广州出版社,2019年),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该书体现出以下五大亮点:

第一,《研究》突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鲜明主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效,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引领,这种引领作用不仅依赖于价值观教育,还必须诉诸制度规范和相关政策保障。《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制度性规范和保障。在此基础上,《研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强调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道德共识,纠正价值偏离。在作用机制方面,《研究》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必须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注于制定法律法规的全过程,夯实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进一步渗透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的制定和施行中。

第二,《研究》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述语类型基础上,努力凝练彰显国家与制度精髓、内涵深邃、融通中外、易记易循的表述方案。该书不是囿于语义分析的文字组合,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相承接的原则,通过广泛实证调查分析、征询各阶层意见,从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与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相符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表达方案,以求方便民众记诵、易于社会传播,为形成具有中国风格气派、得到国民最大共识的表述方案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三,《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对策性、实效性,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内外传播和民众广泛认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可以说,《研究》紧扣这一重大主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与传播效果的密切关系,强调只有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广度、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深度,方能为广大民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研究》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增进民众认知认同实效性为着力点,针对目前价值观传播、认同中的

[收稿日期] 2020-02-18

[作者简介] 周 斌,男,山西原平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切实可行的应用对策方案。

第四,《研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和传播认同上升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等国家战略高度。《研究》认为,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做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和传播认同在根本上体现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从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来看,由于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信仰体系,促使民众认同和支持现有制度体系,因而可以为中国道路的坚持、中国精神的弘扬、中国力量的凝聚提供思想动力、价值导向、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人们思想行为、社会精神风尚的灵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诉求。树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助于捍卫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及危害。

第五,《研究》对若干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复杂深入的论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研究领域展现了应有的学术深度。譬如,关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载体的类型与功用的研究,提出以物化载体为承载固化价值坐标、以制度载体为保障扎牢价值“藩篱”、以仪典载体为抓手强化价值认同、以传媒载体为引导弘扬价值取向等方面,把核心价值观国内传播载体研究整合为一个体现传播方案的设计、优选和调控载体的缜密体系。

此外,《研究》通过科学设计公民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指标体系,为测评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程度提供参考借鉴,从而有效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

总的来看,《研究》深刻洞悉近年来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传播与认同作为有机研究整体并呈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逻辑演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民众的道德情感和行为习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可以说是近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98 页)

名”结构。语法化是语义和句法双重作用的结果,除此之外,语法化还会引起语音的弱化,如“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后,语音弱化,声调脱落为轻声。

复数标记“们”和量词“门”都来源于“门”,还可以从其产生年代进一步论证。复数标记“们”产生于宋代,宋代有近似量词的用法,宋以后发展出量词。李艳惠、石毓智《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中指出:十一世纪左右发生的种种语法变化表明,汉语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语法格式“词汇+语尾”,其韵律特征皆为“重音+非重音”,“们”也属于这类现象之一。换句话说,那时候的语言环境比较有利于像“们”这样的语法标记的出现。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门”在宋代时就有了类似量词的用法,同时又发展出复数标记。量词系统的最终建立,一方面,制约了“们”向普通名词复数标记发展,另一方面,却促使“门”产生了量词用法。

[参考文献]

[1] 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

展的动因和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邓兴锋.元代复数形尾“每”的读音——兼论汉语复数形尾的来源及其他[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3(4):93-98.

[3] 祖生利.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5(4):49-55.

[4] 吕叔湘.释您、俺、咱、咱,附论们字[J].20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上册),2001:781-779.

[5] 徐翁宇.俄语口语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6] 钱宗武,姚振武.古汉语研究的新探索[C]//第十一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7] 耿振生.近代官话语音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

[8] 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9]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 南山)

Implic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FANG Shina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connotation,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intrinsic valu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eternal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not a single correspondence, but a combination of diverse relationship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that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reflected not only as a kind of object relationship naturally formed by man in the natural system with internal vitality, but also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and that between man and man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generated and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embodies a complex and diverse relationship system, such as the ecologic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nd ecological cul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a kind of value relationship with various value demands, and is also a historical social relationship that i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ynamic development.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keep a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trive to build an ecological and civilized society in which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Key words: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rmal Children's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Voices from Preschool Teachers and Children in an Inclusion Kindergarten

GUO Wenbin^{1,2} SU Meng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5000,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ormal children's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3 preschool teachers and 2 children in an inclusion kindergarten class was conducted and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rmal children's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are affected by direct and indirect factors. Th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composed of two aspects: normal children's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special needs children an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 the in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consist of three aspects: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teachers' acceptance degree and social resources support. In order to improve normal children's acceptance attitude towards special needs children, it is suggested that firstly, the state should increase the funds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facilities; secondly, the society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stablish a regional alliance of early inclusion education to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 thirdly, famil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methods and create a loving family atmosphere to cultivate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bility; fourthly,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adopt a variety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to guide children reasonably.

Key words: normal children; special needs children; acceptance attitude

Differences between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and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Evidence from ERP

DENG Huan LI Zhenx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echnology of ERP (event-related potential), 34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which aims to distinguish the time course differences between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and observ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LPP amplitude of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is larger than that of observing during the two time windows of 500–550ms and 550–600ms; secondl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PP amplitude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and observing; thirdly, the P3 amplitude of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This suggests that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and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may have differences in emotion evaluation, thus exerting different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s.

Key words: o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subjective affect labeling; ERP

On Transfer Gradient of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WANG Jialun HE Miaom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llabus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writing system of textbooks compil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ll reflect the trend of combi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e., it is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ading and writing.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methods" betwee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fact, 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key Chinese language competencie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text".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gradients such as sentences, paragraphs, and passa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transfer between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Key words: connection between reading and writing;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ransfer between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